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 刊

2024 年 12 月 第 4 期(总第 104 期)第 26 卷

本刊顾问

于千千 徐 彬 苏 莉 李玛琳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高 峰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岳 宁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杨春禄 谢灿坤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瑛 杨松禄 罗建生 钟瑞华

诸 芳 魏贵华

主 编:何云葵

副 主 编:杨松禄

执 行 编 辑: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4 期 第 26 卷

1999 年创刊

目 次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四重维度

——政治保证、根本遵循、发展进路、价值依归 祝小茗 (5)

新时代继续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 周朗生, 王佳佳 (12)

●统战理论与实践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贡献 何晓岳 (19)

论大数据时代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构建 孟安琪, 崔晓敏 (3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越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张凤祥, 陆平胜, 胡学菖 (38)

民族地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为例 孔 婷 (49)

●文化发展

专栏主持人: 陈友康教授

新中国诗词成就与旧体诗的现代适应性 (主持人语) 陈友康 (56)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4*2024-04]

20 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照

——《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总序 莫真宝 (58)

拉开理想之维，促进诗词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

——“新中国诗史”丛书总序 宋湘绮 (64)

书写新中国教育辉煌 展现当代诗词华彩

——《新中国诗史·教育卷》前言 陈友康 (73)

洪炉铸成新天地，豪情写就壮丽诗

——《新中国诗史·冶金卷》前言 李东昀 (89)

● 学习与思考

依赖与脆弱：1711—1871 年滇池海田开垦及相关问题研究

..... 杜京京，陈业新 (101)

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刊物高质量发展：研究述评与启示 傅 宁 (112)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年 1—4 期 (总第 101—104 期) 总目 (119)

栏目主持专家推介——陈友康教授 (封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 年重点选题与征稿启事 (封三)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4 (Sum 104) Vol.26 Dec.2024

Contents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CCPC

- The Fourfold Logic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Political Guarantee, Fundamental Compliance, Progressive Approaches and Value Orientation Zhu Xiaoming (5)
- Continuing to Leverag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China’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 Zhou Langsheng, Wang Jiajia (12)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Deng Xiaoping’s United Front Theory in the New Period and Its Contemporary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He Xiaoyue (19)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Digital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Era of Big Data
..... Meng Anqi, Cui Xiaomin (31)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 Research on the Pathways to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in the China–Vietnam Border Region: A Case Study of Wenshan Zhuang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 Zhang Fengxiang, Lu Pingsheng, Hu Xueju (38)
- A Study on the Path to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Xishuangbanna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 Kong Ting (49)

Cultural Development

- Column Host: Professor Chen Youkang
- Achievements of Poetry in New China and the Modern Adaptability of Classical–Style Poetry (Host’s Remarks) Chen Youkang (56)
- A Holistic Perspective on Chinese Poetic Forms Since the 20th Century—General Preface to “Th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New China’s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Poetry” Mo Zhenbao (58)
- Unfolding the Dimension of Ideal: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etry Creation from a Plateau to a Peak — Preface to the “New China’s Poetry History” Book Series Song Xiangqi (64)
- Depicting the Splendor of New China’s Education and Showcasing the Glory of Contemporary Poetry: Preface to *New China’s Poetry History: Education Volume* Chen Youkang (73)
- A New World Forged in the Mighty Furnace, A Magnificent Poem Written with Lofty Sentiments: Preface to *New China’s Poetry History: Metallurgy Volume* Li Dongyun (89)

Learning and Thinking

- Dependency and Vulnerability: A Study on the Reclamation of the Dianchi Lake in 1711—1781 and Related Issues Du Jingjing, Chen Yaxin (101)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Journals in Institutes of Socialism: Research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Fu Ning (112)
- General Table of Contents for Issues 1–4, 2024 (Volumes 101–104 in Total) of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119)
- Introduction to the Host of the Special Column: Professor Chen Youkang (Cover Page 2)
- Major Topics and Call for Papers of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in 2025 (Cover Page 3)

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四重维度

——政治保证、根本遵循、发展进路、价值依归

祝小茗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和行动部署。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提升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能力水平，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进路，忠诚践行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责任担当，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4-0005-07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更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科学谋划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部署，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政治保证：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①历史和现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②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关键在于它能否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党的西藏农牧民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启示研究”（24XKS020）。

作者简介：祝小茗，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问、发展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改革就有了新的方向。20世纪末，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比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领导和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国家平稳快速发展的现实直接驳斥了唱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言论，取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又一次胜利。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深刻性变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彻底摆脱绝对贫困，统筹经济发展和新冠疫情防控受到世界瞩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无数个“中国奇迹”，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成功地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因为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我们才能取得这一系列辉煌成就，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二）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过程

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触及的利益矛盾越是复杂尖锐，必然会遭遇各种阻力和障碍，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更不是一般的政治力量可以担当的。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不断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机构，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治国理政的最根本原则，围绕“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出台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推动许多领域实现系统性重塑与历史性变革，充分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把践行“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丝毫不可动摇。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理论站位、时代站位，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的“国之大者”，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深化改革的领导作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落地见效。

（三）在党的自我革命中淬炼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本领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人民性、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不可否认，曾经一段时间党的建设领域受到了有令不行、破坏规矩、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病症的困扰^①，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自我革命精神。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验，坚持自我革命依规治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为全面从严治政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提供了制度保证。当前，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9900多万党员、517万多个基层组织^②的百年大党。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组织体系的优势和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要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大力解决党内存在的“七个有之”等影响党的团结、损害党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一系列问题，抓基层、打基础、严队伍，推动全面从严治政向纵深发展，把握顶层示范与基层助力的辩证统一，形成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整体合力。要发挥领导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强化各级党员干部攻克改革中“娄山关”“腊子口”的胆魄，在化解矛盾问题、防范应对风险挑战实践中提高斗争本领，清除政治软弱“病毒”，提升干部群体免疫力。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加强年

① 刘炳香：《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7期，第31—36页。

② 数据来源于202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公布的数据。

轻干部教育选拔管理监督，引导更多年轻干部把心思用在谋实事、干实事、创实绩上，稳步推进《决定》提出的300余项重要改革举措取得实质性进展。

（四）确保在复杂形势下稳步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大变局孕育于其中，演进于其中。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世界历史中，中华文明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与入侵下，中华民族曾一度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展开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努力，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引领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不畏艰辛，不断探索，形成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风雨、破难题、化危机、开新局，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擘画蓝图。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历史性巨变，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科技和新产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格局，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要立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做好科技创新提质增速与高端产业勃兴融合的大文章，持续推进均衡发展、平衡发展、平稳发展，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积极探索与采取以新质生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策略与新行动，科学合理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和结构，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输送新动能。^①

二、根本遵循：深刻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深刻回答了强国建设中的一系列命题，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理论坚守与理论发展相结合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②，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与改造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批判主体的无产阶级及社会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把守正创新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既源于他丰富的从政阅历和长期的积淀思考，更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准确判断。“守正”之“正”是方向、道路、性质、立场之正，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次飞跃。而“创新”之“新”是以“说新话”“干新事”为特质的“新”，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和发展特点，进行理论创造，推进理论创新。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推进乡村振兴，从抗击新冠疫情到实现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再到举办精彩非凡的冬奥盛会等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埋头苦干，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伟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需要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中把稳舵盘、保持航向，在法治的轨道上深化改革，在理论求索中寻求突破，自觉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战略思维与敏锐视角把握主动、引领未来。

^① 付文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理阐释、历史进程与构建路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二）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意味着经济社会要均衡发展、整体推进，“统筹兼顾”需要在实践中评估改革发展的主要矛盾，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回顾历史，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将“系统论”与“辩证法”用于红军建设之中，提出了军队除了打仗，还要担负起教育、宣传、组织、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政治任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谋划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②的发展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工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决定》来看，不仅有“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宏观战略部署，更在多个章节提到“改革”与“强国”建设。“改革”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建等多个领域，涵盖了“科技”“教育”“贸易”“人才”等不同维度，体现了“整体与局部”“现实与未来”“宏观与微观”的系统思维。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与新的目标的提出，在不同领域我们还面临着一些风险，既包括国际地缘政治的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此，我们既要综合考量国家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一体化推进，尽快攻克高端芯片、半导体生产设备等技术瓶颈，又要坚守底线思维，重点解决好房地产、就业、养老等民生问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三）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7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困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始终秉持零和博弈思维，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充满焦虑，大搞舆论战、认知战，继“中国威胁论”后，“中国衰退论”“中国见顶论”又尘土纷嚣，试图通过唱衰中国来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③十多年来，中国无论是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和多边机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还是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促成全球善治；无论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还是在技术标准、场景应用和改善民生等方面都积累了可与世界各国分享的丰富经验并为全球疫情防控和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都传递着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道义坚守和伦理关怀。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特斯拉、大众、西门子等外资企业不断扩大在华业务，用实际行动对中国市场投出“信任票”。^④分析历史不难发现，西方的文明与民主是建立在对亚非拉人民的血腥侵略、剥削之上，直至今日依然通过各种手段对他国内政加以干涉。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正以崭新的方式打开，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全新历史阶段。中国将继续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

①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机关党建研究》2023年第3期，第2页。

② “三步走”发展战略，即“通过国民经济翻番地增长，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参见人民网：《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2019年3月7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307/c69113-30961722.html?eqid=f413e3e0019110100000006648dbf64>，2024年12月15日。

③ 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55页。

④ 张琮斯：《IMF上调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增长》，《上海证券报》2024年5月30日，第1版。

开放，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传播人类文明、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捍卫共同福祉贡献智慧和力量，担负起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国责任。

三、发展进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使得不同国家在追逐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展现出多元的时代面相。从早期对“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到如今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它不仅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新理论新范式，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引建设现代化强国

纵览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进程，邓小平在首次提出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时就曾指出中国国情的几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三是差距大，发展不均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为出发点，以“小康社会”为具象化形态，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经济发展，统揽“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接连形成“两步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新变化，综合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坚持“胸怀天下”与心怀“国之大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在不同领域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走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新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拓展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且听低谷新潮声”的现实力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二）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生的事物，没有先行“模板”借鉴，也并非是一些人提出的仿照西方模式在中国描摹出现代化的图谱。不可否认，在过去 200 多年，伴随着西方现代化道路所衍生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变革，助推人类文明在多方面实现了跨越式进步，逐步成为全球普遍发展的趋势和过程。然而，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污点及其在当今世界的延续，无法摆脱单纯追求经济、政治等单一向度的、非均衡的“在资本主导逻辑下的必然产物”^①，最终难以持续。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其政治局势呈现出稳定状态时，都迎来了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反之，则社会动荡、人心不稳。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依旧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构成的“一球两制”将长期共存，资本充斥的全球化仍然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③中国在遵循现代化建设规律上要遏制“资本至上”的逻辑，既利用资本的文明作用又防止资本导致文明异化^④，摆脱以资本扩张和“去国家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努力实现“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现代化之

① 韩庆祥、黄相怀：《历史不会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 页。

② 李武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第 20 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8 页。

④ 陈卫平：《“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史意义》，《文汇报》2024 年 8 月 25 日，第 6 版。

路,又要让物的现代化服务于人的现代化,让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 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与西方国家采取高能耗的工业产业道路,再通过“能源掠夺”与“资源垄断”等畸形发展方式相比,中国的国家建设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这是人类现代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难题。换言之,中国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人类文明新形态就不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观照实践的现实表达。与西方现代化造成人与人关系的物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鲜明特征。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从“一穷二白”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逻辑”超越“资本逻辑”,坚持劳动者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逻辑。这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路径,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话语垄断”。在下一步的改革进程中,我们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超越“资本逻辑”为显在特征,以共同富裕为价值追求,以和平发展为行动准则,构建起“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新模式的现代化道路。^①带动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推动世界格局“东升西降”大变革,重新诠释“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逻辑≠资本逻辑”的实践要义,赋能人类文明更多的实践样态。

四、价值依归:践行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②《决定》中更是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二条原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一) 在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解,绝非财富增量的单一维度,而要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维度进行考量。它既包含了收入、财产及生活水平提高等“看得见”的显性富裕,还包括机会公平、权益保障、分配正义以及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等“容易忽视”或“看不见”的隐性富裕。因此,这种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绝非先“做蛋糕”后“分蛋糕”那样简单,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决定》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首先,“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务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积极营造勤劳创新致富的人文环境,不断完善先富带后富机制。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需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优化公平竞争机制,构建基于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基于政府机制的再分配和基于社会机制的三次分配格局。消除扭曲收入分配关系的制度基础,培育壮大各类市场主体,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能力,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③其次,高质量发展建立在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基础上。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提高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逐步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目标,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二) 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民主的形式来看,有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之分。前者强调民主的目标、内容、主体与价值,重点以解决民生

^① 刘志彪、孔令池:《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主线与关键环节》,《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第40—48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3页。

^③ 曲永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光明日报》2022年2月23日,第6版。

问题为旨向；后者强调民主运行的机制、规则和程序，以“过程控制”与“程序正义”为导向。换言之，民主生存的保障既靠完备的制度程序，更需要完整的政治参与来保障民主贯穿于人民政治生活实践的全过程，贯穿于国家权力运行和国家管理的全过程，使广泛协商成为民主的一种常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人民至上的原则推动公共政策过程人本化和民主化，为公共政策的问题确认、制定执行、评估监督以及调整终结提供理念依据，保证了人民群众在各项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中享有全链条参与的权利，促使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落脚点体现在国家建设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构建畅通的话语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个能否”“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标准，我们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等法规要求，扩大人民群众、基层单位、社会组织立法参与，科学配置民主运作的诸种要素，营造民主有效运作的生态环境，促进柔性管理的价值理念在共同行动中积累社会资本，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治理实践。坚决贯彻《决定》中的“依法治国”原则，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类难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将民主与法治、人权与公平等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激发广大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三）在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指引下不断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水平

《决定》明确指出，“在发展中保障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①当前，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冗繁杂糅的局面，从全球通胀升温不止到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罕见的“负增长”，贸易大幅度下滑，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随之也面临民生问题等一系列挑战。人口老龄化、资源分配不均、医疗保障缺位等社会问题倒逼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国内外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民生改善，民生问题必须在国家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事业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予以解决。而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逻辑又在保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同时，国家通过宏观战略方向的调整，将治理重心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事业倾斜，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②有鉴于此，在宏观上，改革要以《决定》中“三个更加注重”为依托，重点是优化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机制，建立起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在微观上，要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促进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现代化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五个全覆盖”工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结束语

总的来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实现现代化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向往，更是推动强国崛起的恢宏动力。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与救国、兴国、强国，有机统一于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新征程上，改革涉及强国建设的广度、深度、力度也必将持续增强。我们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与新要求，忠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责任担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坚定不移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进。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② 杨金海：《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识》，《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4期，第4—14页。

新时代继续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

周朗生，王佳佳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方向，在我国政治制度体系中起着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作用，蕴含着“中国之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制度密码，彰显出确保党引领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国家长治久安的显著优势。为国家治理提供重要制度保障，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继续发挥中国之治制度优势，要从坚定政治方向、推动高质量立法、保障宪法法律高质量实施、做好监督工作、紧密联系群众、提高人大代表履职能力几个方面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制度力量。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度优势；“中国之治”

中图分类号：D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4-0012-07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长期奋斗的成果，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①今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70周年。回顾70年峥嵘岁月，我们深切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意味着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要继续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举旗定向、凝心聚力的作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续写“两大奇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一、人大制度蕴含“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国家政权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参议会和政府，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宣告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此，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登上时代舞台，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话语体系创新研究”（21BZZ083）。

作者简介：周朗生，博士，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边疆治理和党的建设；王佳佳，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15日，第1版。

^② 李林、陈宇博：《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法治研究》2024年第5期，第3—16页。

重召开，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了人民的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虽经历过挫折，但1978年党的拨乱反正工作圆满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回归正轨，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推动人大工作理论创造和制度创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论述的指引下，人大各方面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彰显了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和显著功效，蕴含“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铺展最广泛民主图谱

中国数千年来进行的制度探索，其本质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种满足多数人利益，消灭剥削的制度并非易事，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起覆盖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亿多人民、56个民族的民主体系”^①。全体人民都被纳入民主范畴，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绝大多数人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来自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不仅有党政机关干部代表，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代表，充分体现代表选举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此外，人大代表的履职范畴涵盖各方面公共事务，既着眼于立法、重大事项决策等宏观的大事，也关注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代表深入基层进行调研，积极推进相关政策的制定，出台一系列扶助政策，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突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和人情关怀。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最真实民主底色

首先，代表选举真实进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②人大代表来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凝聚民意、汇聚民心。选举工作严谨有序，从选举数周前的选民登记、广泛宣传、候选人介绍参选理念等工作，到选举当日选民需要持选民证，坚持匿名投票的原则有序投票，为了避免失误，多地还开设人大选举网络平台，用大数据保证科学与规范，充分保障人民表达真实意愿。其次，民主权利真实落地。“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③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实现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④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铸就最管用的民主基石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制度依托。在人大工作“输入端”环节，人民群众有机会充分了解候选人的实际情况，选出能够表达自己利益和意愿的人大代表，使个人的声音

① 蔡文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2期，第38—45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3年，第31页。

③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0月13日）》，2022年2月2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2/28/content_5676076.htm，2024年11月5日。

④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法制建设》2024年第2期，第4—9页。

得以在权力机关中反映；在民主运行的“输出端”，公民可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利用适宜手段依法表达自己的“烦难愁盼”。人大代表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基层进行走访、实地调研、开展调查，关注群众生活、学习、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侵权现象，通过议案、建议等形式反映到人大会议上，助推民生关切事项得以解决，关系民生福祉措施落实落细。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的过程中，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政治意识、法治意识和民主观念不断提高，有利于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以稳健的步伐，持续不断向前推进。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兴盛的制度依托。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安排，人大通过搭建议事平台，总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阶段性成就和根本性问题，科学制定整体规划和战略构想，把各领域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版图之中，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制度依托。

二、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一）人大制度的显著优势

70年风雨兼程、筚路蓝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扎根于中国土壤，汲取本土养分，逐渐开枝散叶，生机勃勃，呈现出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态势，体现出显著优势。

1. 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引领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全新政治制度，其从诞生之日起，就凝聚着党的宗旨和原则，贯彻着党的执政根基与执政理念，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程序化、法律化、规范化、制度化，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党组织推荐的优秀人员通过法定程序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使党的宗旨、原则、重大事项决策等贯彻落实到国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此外，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能够吸纳民意、汇聚民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进一步提升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地位，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共识。

2.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基层立法联系点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今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五周年。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发展道路也是追寻全过程人民民主之路，我们党在批判继承人类民主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我国的国体必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与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在这一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空谈，不是口号，也不是形式，而是真正把民主交给人民，真正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交在人民手中，真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划时代意义。

3. 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程序规定和运行规则使得人大会议上能够广泛包容不同的声音，溢满了无限活力，也保障一系列国家机关有效运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均由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来自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不同身份，承载着不同选民的期待与信任。人大代表每届任期五年，每隔五年就为国家权力机关注入新鲜血液。选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言人”，人大代表分别召开全体会

议、代表团会议、代表团小组会议等，积极履行自身职责，关注重大事项和民生问题，提出议案或建议，审议相关政权机关的工作报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对重大决策进行讨论分析、投票表决，推动立法工作的进行，监督“一府一委两院”，确保其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样的权力产生过程和运行过程促使国家权力机关高效有序运作，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4. 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法律能跨越不同历史时期与地域范围，展现出权威性与广泛影响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总结多年治国理政经验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制度依托。70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开门立法”的努力下，我国积极完善各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并赋予地方立法权，发挥地方积极性。以云南为例，截至2024年9月1日，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数量为400件；省级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229件；昆明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79件、其他州（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92件。^② 人大的立法工作成果显著，逐步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中一些里程碑式的法律改变了人民的生活，如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大不断深化立法工作，使得全面依法治国有法可依，推动国家法治化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此外，人大还在“良法”的基础上“善治”，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安排执法检查，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工作，避免特权事件的出现，防范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维护法律权威，实现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当今国际局势复杂，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完善的机制设计使得国家得以良好运转。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驾护航下，在政治方面，人大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激发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通过规范政治参与程序促进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不断完善，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在经济方面，人大通过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方式，促进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重大事项审批和资金投向监督等形式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社会方面，人大通过制定和完善养老、医疗卫生、就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提升社会福利水平，规范社会竞争秩序，并通过多种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文化方面，人大通过制定文化法律法规，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促进文化多样性与传承，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由此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对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非凡意义。

（二）人大制度赋能国家治理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何治理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是历史与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考题。经过百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道路，创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勇立潮头，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科学回答了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

^①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1日，第1版。

^② 瞿姝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举旗帜引领发展》，《云南日报》2024年10月9日，第1版。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①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人民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活跃的个体,“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准确回答了国家“属于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贯彻“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体现出人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价值遵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法理层面赋予人民依法进行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以高效的制度设计和科学的民主理念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推动国家治理的能动作用。

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家治理体系筑牢关键架构与核心支撑。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在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统领下,我国形成一个精巧高效的组织体系。一是科学构建人大与“一府一委两院”的关系。人大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选举、任命等方式产生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每年听取国家机关的工作报告,并通过质询、调查、备案审查等方式对其进行监督。这样的机构组织体制和运行模式有效防止国家机关之间互相扯皮,避免唱“对台戏”、效率低下等弊端。二是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职权。实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地方服从于中央,中央在资源分配、政策安排等方面为地方提供支持,地方在遵循党中央统一领导部署下,有一定的自主权,可因地制宜,促进自身发展。这样的权力安排既有利于树立中央权威,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保持中央和地方统一性、连贯性。三是形成科学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其他重要制度,构成了宪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保障。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遵循,其中,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起着核心引领作用,党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最终落脚点;依法治国是规范国家治理主体行为,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制度载体和最佳实现形式,通过人大制度,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大代表的工作也为满足人民根本利益而展开,并为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提供合法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石和制度基础,监督保障宪法、法律实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借助人大的制度载体与工作平台得以有效运转,共同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行稳致远。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15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9/15/content_5430007.htm, 2024年12月20日。

^②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01/c_1125402833.htm, 2024年12月10日。

三、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大制度

制度是国家最大的优势，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这一重要而特殊的时间节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八部分“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将“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列为该部分首个要点，强调“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①可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正确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今天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完善、定型，未来也必将在党引领下才能在新时代激流勇进、劈波斩浪。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融入人大工作的各环节、各方面，除了人民利益再无任何自身利益，充分保障利益“最大公约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进行国家治理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制度载体，人大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全过程，维护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地位。

（二）推动高质量立法，保障宪法、法律高质量实施

2024年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70周年，未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人大工作任重道远。一是人民代表大会要围绕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展开立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邀请企事业单位、法律界等专家代表参加意见座谈会，整合多方立场，对立法内容“精雕细琢”，做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鼓励地方人大研究梳理其他地方相关立法的亮点，立足本土实际学习借鉴，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法律体系。如2018年云南出台了《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推动湖泊治理和生态修复；针对少数民族方面，于2020年出台《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积极推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此外，还要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关系民生的法律制度，将社会热点、人民重大关切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刚性手段增进民生福祉，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二是要以良法促发展，保障善治，加强法律学习宣传教育，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定期开展执法检查，推动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如云南加强对非法捕猎、采集、交易珍稀动植物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护生物多样性。

（三）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

人大监督工作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要根据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工作要求开展监督，着力创新监督工作机制，利用数字化平台，整合监督资源，努力探索人大监督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融会贯通，增强监督合力，共享监督成果。通过媒体、网络平台等多种手段广泛征集监督选题，关心人民群众烦难愁盼，依法对重大民生项目、建设工程开展实地考察、专题询问、听取报告、座谈交流等，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形成责任清单，避免不想监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的问题，整顿监督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重形式轻内容、重程序轻实质等现象，推动问题解决，提升监督工作质量和水平，做到人民关切在哪里，

^① 该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7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1日，第2版。

人大监督就跟进到哪里。2022年7月,云南滇中引水工程第二长隧昆呈隧洞主洞提前18个月顺利贯通,复杂地质情况和技术困难影响工程建设进度难题的破解,离不开云南人大监督的积极助力。

(四) 发挥人大紧密联系群众的作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产生,为人民服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制度优势,就在于其凝聚着人民的共同意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心、定位、设计、运行安排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也是人大工作的最终落脚点。一是致力于解决群众“烦难愁盼”。人大代表要坚持扎根基层、深入人民、贴近群众,了解民生关切问题,通过设立服务平台、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活动站、代表“家站”等渠道和载体密切联系群众,“零距离”进行民主恳谈,吸纳民意,汇聚民智,让问题清单变幸福账单,推动难点热点焦点问题解决,促进惠民利民为民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二是推动立法触角延伸至“寻常百姓家”。增加专业人才库,开展立法征询会、讨论会,邀请群众积极参加,就法律问题征求民间意见,拓宽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让公民亲历立法现场,增强在场感,使得“寻常百姓家”的合理建议变成切实可执行的法条,在人民群众与立法机关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如上海人大工作人员走进盲童学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征询立法建议,一位教师的建议被采纳,过街提示音响试点落地,切实践行“有爱无碍”。

(五) 提高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代表着人民的共同意愿,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大代表各项职权,使其能够行使国家治理中的一系列权力,这既是荣耀,更承载着责任与担当。新的历史征程上,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大代表工作机制,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和工作质量。一是全国和地方的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委员等相关人员,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认真履职,全力以赴落实好人大工作重要事项,自觉做到提前请示、主动汇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做好表率带头作用。二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深入群众倾听人民呼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探索“人大代表+网格员”“人大代表+调解员”等模式,架好党和国家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三是国家机关要支持人大代表更好地行使职权,做好人大会议组织和保障、信息传递、代表学习培训等工作,保障代表权益,树立为代表服务的意识,落实好“两个联系”的要求,推进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如2019年,云南举办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对人大代表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的培训,提升代表依法履职的意识和能力。

四、结语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充分考虑各方利益,整合多方面资源,为“中国之治”提供制度支撑。在新时代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为“中国之治”赋能蓄势。我们坚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推动高质量立法,保障宪法、法律高质量实施,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提高人大代表履职能力,发挥人大紧密联系群众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定能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乘风破浪,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彰显出蓬勃生机与强大力量。

责任编辑:罗 雷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贡献

何晓岳

摘 要：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为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参与力量和集体行动联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纵观内外、横贯古今，根植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继承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创造性地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这一理论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境遇出发，致力于“求同”“求合”“求宽”“求效”，系统地对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范围及组织形式进行了全面思考和探索，巩固和壮大了我国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是集中与民主、原则与灵活、一致与多样、差异与整合的统一体，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环境、物质基础、思想支撑以及资源力量。

关键词：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4-0019-12

统一战线是党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凭借着多层立体的内涵、张弛有度的策略以及凝心聚力的底色，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中人心和力量的问题，构建了由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实现了在党的领导下稳定秩序与持续发展相辅相成的愿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创建了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发挥了法宝作用。2024年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重温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及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有助于深刻领悟该理论的时代性与重要性；也有助于提升落实统一战线相关战略的信心、坚定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决心；更有助于我们学会运用这一理论去解决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是在不断深耕国内与国际、历史与当代等多个维度的统一战线理论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一理论牢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科学总结了苏联解体的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和治理效能研究”（20BZZ011）。

作者简介：何晓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国家与政党治理。

验教训,借鉴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并结合改革开放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成为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 理论溯源: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昭示了统一战线的本质、价值、优势以及建立路径等问题,并在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和全人类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愈加成熟。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因此,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成为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统一战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策略。1840年恩格斯在反对宗教封建势力的斗争中首次提出“统一战线”这一概念,指明“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②。此后,“统一战线”及其相关理论频繁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实现无产阶级自身团结。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应该联合各国反抗敌人的主要力量”并明确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③的统战号召,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团结统一后形成实力强大的政治联盟的思想。其二,争取同盟军。19世纪的欧洲,政治斗争风起云涌、政治力量错综复杂,为了在此环境下解放全人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具体来说,针对小资产阶级同盟军,马克思、恩格斯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针对农民阶级同盟军,指出得到农民阶级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④;针对知识分子同盟军,多次提及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丰富的知识,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⑤。其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倡导统一战线的同时,清楚地知道“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⑥,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统一战线”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针对这一问题,他们还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⑦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更加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统一战线的相关理论。一方面,列宁说明了统一战线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之中,不建立统一战线、不进行广泛社会号召和动员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为此,列宁指出:“企图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⑧随后,列宁第一次运用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这一概念,并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⑨。另一方面,列宁提出了针对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同盟者的战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2页。

⑧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56页。

⑨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

和策略。列宁曾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党派要建立所谓的联合政府。为强烈谴责这些党派反革命联盟的性质，列宁多次讲述对待统一战线同盟者的策略，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工农联盟，又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传承者和践行者，邓小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阶层情况、社会主要矛盾、工作重心以及实际统战工作相结合，调整并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内涵，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

（二）理论经验：吸取了苏联解体的重要教训

苏联的解体，尽管原因是复杂的，但在统一战线的视角下究其内部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混乱以及弱化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深刻总结并吸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发扬人民民主、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开展多党合作。

一方面，吸取思想观念混乱的经验教训。苏共在改革初始阶段，提出所谓的“公开性”“民主化”“社会主义多元化”等“新思维”，试图从思想、理论上全面清理一切阻碍改革的旧观念，结果引发了苏联党内和社会的历史大清算。1987年，戈尔巴乔夫亲自发起了苏联官方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苏共意识形态的负责人雅科夫列夫本人就大力推崇资本主义，不仅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甚至提出“布尔什维主义具有虚伪性、两面性和欺骗性”^②的论断。苏共领导人和意识形态负责人对苏联历史的全面否定，造成了苏联社会全面的、严重的思想混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社会思潮的涌入，邓小平为避免造成思想混乱的错误，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基础确立了爱国统一战线，凝聚了广泛共识，本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③，这不仅是邓小平为新时期统一战线赋予的新内涵，而且成为感召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参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另一方面，吸取错误地排斥共产党领导的教训。苏联共产党过于集中的领导体制和自身出现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等问题是苏联改革的对象。但是，苏联在改革中出现重大失误，简单地否定共产党领导，把共产党组织排斥出改革过程，千方百计削弱甚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甚至把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归结为“党和党的个别组织在许多情况下落后于发生在社会中的生气勃勃的改革进程”^④，并试图以多党制推动改革。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导致苏共不再拥有法定的领导地位，使苏联的国家权力逐步落入趁机而起的地方分裂势力和政治反对派的手中。邓小平深刻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为避免出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改革开放后明确提出我国的民主党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⑤，并且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② [俄]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48页。

③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④ [俄]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78年，第158页。

⑤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55页。

个特点和优点”^①，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这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② 这些关于多党合作的重要论述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科学指南。

可以看出，苏联政治发展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教科书。苏共改革的多次夭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化为名改革的失败以及最终断送苏联的前程，更是成为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反面教材。

（三）理论根脉：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

任何思想的萌发和成熟都离不开特有的文化根脉。邓小平所创立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极具时代性和创新性，但在理念和方法上也离不开中国本土统战文化的孕育。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盟”理念、“大一统”与“和合”思想等，集中阐释了中国本土文化中蕴藏的统战智慧，也为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脉和文化归依。

一方面，吸收了“联盟”理念。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统一战线”这一表述出现在任何中国古典文献之中，但中国传统政治谋略常提及的“联盟”观念与统一战线不谋而合。春秋时期，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③，实际就是我们所讲的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将敌人转化为朋友，用团结代替武斗。战国时期，纵横家提出“合纵连横”的方法，“合纵”即联合、凝聚各方弱小的力量来攻打一个强大的力量，这一思维运用到六国抗击秦国之中，使秦国十多年不敢东进；“连横”即强大的力量通过拉拢敌对势力中的一些力量并与之达成联盟，瓦解众多弱小势力的联合，这一思维体现在秦国实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最后实现大一统。三国时期，诸葛亮主张与东吴孙权结盟，联合起来抗击曹操，最终以弱胜强，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使得刘备在三国鼎立中有一席之地。显而易见，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内涵凝结于“联盟”理念的规则、行为以及意识等层面之中，只是其中内涵已不再局限于“小国寡民”的农业文明思维，而是置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浪潮之中。

另一方面，吸收了“大一统”与“和合”思想。孔子很早就对“大一统”思想著书立说，在历朝历代的政权建设中这种思想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大一统”思想不是暴力征服，更不是千篇一律，而是通过国家政权容纳各族群的差异，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八方殊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④。“和合”思想则与“大一统”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崇尚“和而不同”，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差异，既相互碰撞又形成共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两种思想均强调允许多样的存在，对不同的意见、事物持宽容的态度，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也由此引申出了“求同存异”的理念。而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方法论就是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在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港澳台关系等“一和多”的问题上更是鲜明体现了对“大一统”与“和合”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统战智慧的传承，并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赋予了这种智慧新的时代内涵，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大一统”“和合”等价值观念在新的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新的体现，发挥新的现实作用，彰显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①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65页。

②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07页。

③ 方克：《中国辩证法思想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4页。

④ 张造群：《礼治之道——汉代名教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5页。

（四）理论基因：继承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初步提出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统战策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并准确研判新时期工作重心的转移和阶层关系的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配套的统一战线理论。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统一战线承担的历史任务发生着深刻改变，名称也经历了几次重大演变，但建立和巩固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同志一以贯之的思想理念。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①毛泽东关于“三个法宝”的重要论述，点明了统一战线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之间的关系，也表明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断强化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深谙统一战线对于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境遇，重提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③此外，他还赋予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符合时代特征的功能定位，有效协调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以及海内外同胞关系，不断延展统一战线的范围和领域，在我国社会阶层状况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拨开了全党全国关于统一战线的迷思。

毛泽东在确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着眼于服务现代化国家建设之道，不断继承和丰富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思路，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继承性与时代性。

二、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要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阶层状况的变化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范围以及组织形式，建立了完整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体系。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理论，成为我们党做好统战工作、完善统战格局的行动指南。

（一）统战性质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求同”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邓小平在时代巨变中阐释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④，并将“革命统一战线”命名为“爱国统一战线”。这就使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由经典马列主义的“阶级联盟”扩展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联盟”。

正如上述在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中也提及，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了“求同”的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3页。

法,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旗帜,解决共同的思想根子问题,此外的任何“异”都可以接受甚至可以充分利用并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优势。邓小平在恢复统一战线以后,科学分析了大陆范围内的政治联盟,认为其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爱国者,其中“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已经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原资本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①,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尽相同,生活习惯和信仰也大不相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更有着共同的道路走向,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他反复强调这并非统一战线的全部,还有“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②,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中,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处事原则,即拥护祖国统一;他们更有着共同的民族精神,即爱国主义。显而易见,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政治引领和内外统筹的优势,它不是毫无底线地承认利益诉求,也不是一蹴而就地消除差异,而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能够围绕大局广泛联系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以及海内外同胞,并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魂、以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为根,不断增进其政治认同,最终达成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一致性的奋斗方向。

(二) 统战任务是以团结奋斗为主线“求合”

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不断“求合”,推动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界别、各民族精诚合作,凝聚起各族各界人民以及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合力。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③在之后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补充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④。这两个任务的提出体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与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相耦合。

邓小平曾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⑤首先,想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有资金、科技、人才等作为支撑,而当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很落后,制度尚未健全。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要利用统一战线广泛性和专业性的优势,吸纳人才和资源,在联谊交友和广聚英才中形成推动新时期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合力。同时,邓小平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阶层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原资本家阶级已经消灭,由此决定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外,邓小平将实现祖国统一的根本任务和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存在两种制度的客观现实相结合,指出“现在最大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邓小平(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0—11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邓小平(中)》,第1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2页。

统一战线问题，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问题”^①，并创造性地提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②。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构想，统一战线成为解决港澳台问题的主要途径，统一战线中的成员成为实现祖国统一的主要力量。“一国两制”是针对台湾问题所提出的，但在港澳问题上先得以实践，这正是邓小平审时度势把爱国统一战线基本原理应用于祖国统一大业上的成果，而他也深信由于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一国两制”必将应用于台湾问题上，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也必将完成。邓小平还谈及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大陆与台湾的未来走向，指出“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③，还专门申明：“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④可以看出，邓小平后来补充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实质上说明了广大统战成员精诚合作的基础都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而只要这个大前提不变，人民群众就能通过统一战线既互相尊重又通力合作；既各有特色又合力精耕，最终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加快和平统一的进程，携手共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

（三）统战范围是以发展壮大为导向“求宽”

统一战线的范围具有时代性，是由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时代要求和形势发展，准确分析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以地域和政治基础为依据，提出：“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它包括两个联盟：大陆范围以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爱国者的联盟；大陆范围以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⑤第一个联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第二个联盟求爱国和祖国统一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由此，我国统一战线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从“单一范围”（阶级联盟）拓宽为“两个范围”（劳动者与爱国者联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

处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新时期，党内出现了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范围和对象应该如何变化的疑问，为拨开这一迷思，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⑥邓小平对于统战范围“宜宽不宜窄”的思想，揭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特性就是通过团结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人民幸福、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大多数，来孤立少数的敌对势力。而由于新时期统一战线范围的拓宽，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也得到相应的扩展，对此邓小平及时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方针。关于知识分子，邓小平做出了“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⑦、知识分子即便是党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⑧等重大论断，因此他号召在全党全社会形成

①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3页。

⑤ 教带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热点问题与冷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⑥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⑦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27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①的新风尚。关于少数民族，邓小平深刻反思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的教训，特别强调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治建设，保障各民族地区根据本地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进而扩大同少数民族人士的统一战线，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关于新的社会阶层，邓小平意识到新兴社会群体多数存在于体制之外，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就业者、自由择业者、“白领”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组成，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通过统战工作让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机会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利益，同时担负起服务社会、服务现代化建设的责任。邓小平“两个范围”的论述，开拓了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新领域，意味着即使他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与大陆不尽相同，但只要不搞祖国分裂、赞同“一国两制”，就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更应该团结这些大陆范围外的爱国者。邓小平曾说：“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回归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②这充分展现了邓小平在发展和壮大新时期统一战线中将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巧妙结合，使得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宽”。

（四）统战组织形式是以制度改革为抓手“求效”

进入新时期，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序推进，邓小平非常重视加强新时期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制度建设，进而“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③

新时期统战组织形式的不断完备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出席全国政协、统战部招待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宴会上发表讲话，鲜明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④可以看出，邓小平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嵌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蓝图之中，从制度上有效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和民主政治建设，也有效反击了社会上出现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主张资本主义民主以及西方多党制的声音。随之，邓小平在党对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基础上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⑤，更加突出了多党合作制的长期稳定和重要意义。1989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⑥，同时规定了参政议政的五种具体形式，这一制度化的表述确定了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勾勒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新画像。另一方面，表现在人民政协的工作更加制度化。邓小平明确了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定位及其与统一战线的关系，指出：“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⑦为了推动各级政协履行职能、开展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

②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6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⑤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50页。

⑥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0页。

⑦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2页。

和制度化,1978年邓小平主持修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并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①,1982年又将人民政协的性质、作用和工作准则载入宪法之中。而为了更加突显广大政协委员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邓小平还提出“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②,展现了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有序且有效。

三、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③,体现了改革开放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创“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强调“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④,表明经验少、底子薄、人口多仍是新时期中国的现状与国情,所以我国现代化建设还比较困难,必须依靠统一战线实现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对此,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运用刚柔并济、求同存异的策略,推动广大统战成员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之中,空前地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心和力量基础。

(一) 集中与民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稳定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不断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厘清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涉及和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党与人民、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坚持实行多党合作,广泛开展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成为人民当家作主最直接的实现形式,从而协调了各方利益关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运用集思广益、求同存异的方法,尊重和照顾同盟者利益,提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国计民生各抒己见、通力合作,这种核心一元性与结构多元性复合的统战格局,将“领导力”“协商法”“合作性”共同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避免了西方竞争性民主由于强化分歧和“赢家通吃”效应而造成的利益排斥、互相倾轧与政治动荡。邓小平始终认为实行统一战线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且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阶层分化使人民利益更具广泛性、多样性,必须有一个能够集中反映和有效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政治核心来团结、凝聚和带领人民把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因此铿锵有力地提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⑤与此同时,在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邓小平用“十六字”方针重新确立了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首次提出了“参政党”的概念,并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层面上阐明了各方统战成员表达利益诉求的有序渠道和制度平台。可以看出,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中展现出集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

与民主相统一的思维,体现了利益共同体架构和公共协商逻辑,具有民主表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功能,能够协调政党、政府、社会和个人四者的价值偏好,使多元的社会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大值”,并通过多方平等、自由的讨论、辩论和协商,保护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甚至超越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促成广大统战成员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实现,最终成为处于工业化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多发时期最有利于化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社会风险与利益冲突的行为准则。

(二) 原则与灵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物质基础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分的分殊与社会阶层的分化,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既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又灵活地增加社会活力,鼓励在现代化建设中“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①,进而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港澳台同胞与海外侨胞主动参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汇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洪流,避免了西方现代化建设中因劳动与资本、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对立而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内引外联、互利互惠的经济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既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又灵活创造了先富带后富的经济发展秩序。邓小平多次强调“原工商业者中不少人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营企业和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在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②,他还认为工商联作为党领导的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组织,具有自上而下的统战性,更具有自下而上的民间性。在此理论的指引下,工商联将党政机关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制度化的平台组织并联系起来,不仅能自上而下为这些企业和代表人士提供咨询服务和政策支持,还能自下而上收集广大成员的所急所需和意见建议,鼓舞民营企业既要创造财富又要富而思源、既要扩大生产又要增加就业。另一方面,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既坚持爱国主义这一根本原则,又灵活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③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邓小平意识到新时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资金、技术和人才不足的问题,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④因此,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统一战线,灵活处理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支持港澳台同胞和华人华侨来大陆办厂、投资、经商,为“引进来”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服务;还为大陆企业与港澳台企业以及侨资牵线搭桥,一同合作“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生产和海外并购等经济活动,助推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 一致与多样: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引领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体,绘制了大陆范围内和大陆范围外的复合型同心圆联盟,不仅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识,共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而且要求统筹兼顾多元化利益价值和差异化社会文化,具有强大的人心聚合和思想引领作用。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就一致性而言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的,就多样性而言是包含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文化形态、多种行为方式的有机融合体,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谋而合,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①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53页。

②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64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6页。

在中国民主政治场域中有了思想支撑。从大陆范围内来看，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与我国的民族和宗教领域相关联。在处理民族关系上，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引导各族群众熟知党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并形成政治、思想、情感和命运上的共识，从而激发各族儿女维护社会主义的自觉以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还正视了广泛的社会信仰问题，厘清了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适应性关系，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目标，促进其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心同德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大陆范围外来看，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着眼于港澳台侨问题。伴随着新时期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入，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更加多样多变、复杂交织，西方敌对势力甚至多次对港澳台问题进行干涉，挑起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在国际社会制造一波又一波反华浪潮，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对此，邓小平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利用同根同源的文化基调、民族复兴的共同梦想，运用“一国两制”的统战策略提升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此外，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还秉承“天下一家”“美美与共”的理念做好海外统战工作、谋求人类共同利益，利用港澳台侨内外统筹、官民并举的文明互鉴优势，在国际舞台上润物细无声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推动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制度模式的国家及其人民互联互通、互利互惠，抵御了我国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多种风险和挑战。

（四）差异与整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广泛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重新规定了我国统一战线的性质为爱国统一战线，将新时期统一战线从社会上层延伸至基层，从政治领域拓展到“社教医保、科教文卫”等多领域，从大陆范围内扩大到“两个范围”，从而组织起各种政治力量 and 不同社会阶层，大到围绕党和国家的改革方向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建睿智之言，小到围绕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和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琐事献务实之策，从共商国是到共话民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力量，厚植了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具有代表性强、包容性大、联系面广的特点，体现在广大统战成员不受性别、阶层、职业、地缘、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民族宗教和文化程度的影响，而是不断吸纳和整合这些分散且具有很大差异的社会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体表现在：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规划和指引下，广大知识分子在原子能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等诸多科研领域攻坚克难，在宣传和普及科学文化法律知识上不断开拓，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深入到自己的界别之中发挥专业特长进行履职，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方式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书写富有前瞻性、实用性的提案和建议案；民族宗教界人士在拥护党的领导、维护祖国统一、发展特色经济、弘扬传统美德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鼓舞和团结了各族群众和信教群众同舟共济实现共同富裕和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努力拼搏，掌握了先进的企业经营模式和专业的生产技术，全面塑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并积极投身于解困扶贫、抗洪救灾、慈善公益等公共领域，在助力共同富裕和强国建设上功不可没；港澳台同胞、归国侨胞不断为祖国大陆提供商机、融通资金、吸引外资，推动了中国企业制度的现代化和经营模式的“走出去”，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人才和智力资源，并促成了香港、澳门的

相继回归,推动了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一往无前。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不仅尊重广大统战成员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具体利益的差异性,并且鼓励他们运用各自的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让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政策库、思想库、资源库和专家库,从而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

四、结语

从孕育理念到健全制度,从联合时局所需力量到构建全方位统战格局,在艰辛的探索中我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与壮大。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面对国内国际风起云涌的形势变化,立足“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不仅承继了自党成立以来统一战线的战略筹划和政治原则,并且开启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历来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政党。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②同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任务更加艰巨,“硬骨头”越来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③当前,我国社会结构、阶层关系、思想观念、利益格局等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更加需要加快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一方面,立足于“两个大局”。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着眼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是主动应对变局、科学谋划体制机制变革的创新之举,必须科学认识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作用与意义。另一方面,立足统战工作的总体布局。统一战线是一个由各方面社会成员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建立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要加强统筹兼顾、协同配合,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实现统一战线资源的统一集中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征程中的强大法宝作用。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9页。

②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2页。

论大数据时代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构建

孟安琪, 崔晓敏

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 数字化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构建基层数字统战工作能够促使基层统战工作不断推陈出新, 有力推动基层治理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 提升基层统战工作的效率, 从而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在基层数字统战工作构建中, 始终遵循特定的构建原则至关重要, 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秉持大团结大联合的理念、贯彻以人为本思想、确保安全可靠以及遵循循序渐进等原则。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发展既有来自技术与政策的有力支持,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 主体的数字化应用能力滞后、相关专业人才的匮乏以及统战平台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较为突出。针对这些挑战, 应当积极探寻有效的应对策略, 要打造一支既精通统战业务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推动常态化的基层数字统战工作, 健全多元化的统战工作平台。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 数字技术; 统一战线; 基层数字统战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4) 04-0031-07

一、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建设的内在逻辑

在高度智能化、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 数字统战工作的建设意义重大。推进数字统战工作向基层延伸拓展, 是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必然要求, 也是塑强变革能力、提升统战工作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一) 时代驱动: 数字浪潮下统战工作新航向

基层统战工作的数字化转型, 不仅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必然产物, 更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其一,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传统统战工作的时空限制, 为基层统战工作开辟全新的工作空间与无限可能。通过数字化手段, 统战工作者能够更加便捷、高效地收集、分析和共享信息, 从而实现对统战对象信息的精准掌握与深度理解。这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统战政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增强了统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二, 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建设与发展, 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数字化手段, 不断强化党对基层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进一步优化统战工作流程, 提升工作效率。同时, 基层数字统战工作还促进基层治理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作者简介: 孟安琪,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基层党建; 崔晓敏,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目标导向：基层统战效能提升的新诉求

“做好一切工作的直接目标是增强政策落实能力、提升工作效能。”^①在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统战工作的效能提升成为新的目标诉求。这一诉求不仅体现对统战工作实际效果的高要求，也反映出统战工作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效能提升的核心在于精准识别统战对象的需求与诉求，通过对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统战工作能够实现对统战对象的深度画像，为制定针对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基层统战体系是复杂开放的系统，各区域、行业资源子系统蕴含独特要素与功能，传统分割式运作易陷入“孤岛效应”，折损整体效能，只有打破行政、地理与行业壁垒，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纽带搭建协同网络，契合复杂系统自组织演化趋向，激活系统涌现性，才能催生“1+1>2”的协同增效。通过数字化转型，基层统战工作将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强化政党领导力“神经末梢”，夯实党的执政社会基础，调和多元社会矛盾，以政治整合与社会凝聚效能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均衡态，为国家长治久安发挥独特且不可替代之效能。

（三）机制革新：数字赋能下统战方式的重塑

在数字技术的强力推动下，传统的统战方式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为统战工作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统战工作者能够实现对统战对象信息的全面收集、精准分析和实时更新，极大地提高统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使得统战工作能够更加科学地制定策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数据分析，统战工作者可以清晰地了解不同统战对象的需求与偏好，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和支持，增强统战工作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数字技术的引入推动统战工作流程的再造与优化。传统的统战工作流程往往繁琐复杂，涉及多个环节和部门，基层统战各主体受限于层级、地域隔阂，沟通协作迟滞，往往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则能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信息的无缝对接与共享，从而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如今数字平台搭建统一“指挥舱”，社区、工商联、民主党派等多元主体线上互联，信息共享零时差、任务派遣一键达。跨区域统战项目借远程协作系统高效推进，线上研讨凝聚各方智慧，资源调配灵活有序，激活多元主体联动活力，凝聚强大统战合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协同治理格局。

（四）政策护航：统战工作可持续的战略支撑

政策是推动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快速发展，持续加强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推动统战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和高效化转型。一是国家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将其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指出统一战线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强调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为基层数字统战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理论依据。二是推动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基层统战工作通过数字技术的全面普及与应用，可以更加精准地掌握统战对象的信息和需求，提高工作针对性与实效性，从而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构建原则

为了在多元复杂的基层环境中实现数字统战工作的有效开展，确保其准确把握统战工作的核心要求，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遵循科学合理的构建原则显得尤为关键。这些原则将从不同维度为基层数字统战工作提供方向指引、价值导向、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的规范

^① 洪向华：《干部要提高七种能力》，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3页。

与引导。

(一) 党的领导原则：数字统战工作的政治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①党的领导是数字统战工作始终保持政治正确性的坚固基石，是确保该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的核心要素。统一战线工作要为共同目标和共同事业而奋斗，就必须始终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从数字统战工作的战略规划层面观之，党的领导提供了宏观的方向指引。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数字统战工作规划了清晰的蓝图和框架，是其在复杂多变的数字环境中明确发展的总体方向。而在数字统战工作具体的执行决策环节，党的政治引领更是不可或缺。无论是统战对象信息的数字化管理策略，还是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统战工作资源分配的决策，抑或是在数字平台上开展统战活动的具体安排，党的领导衡量着每一个决策的政治正确性，确保这些决策与党的意识形态、统战目标以及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二) 大团结大联合原则：数字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②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首先，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使得统战工作能够跨越空间的阻碍，触达更广泛的群体。无论是身处偏远地区的统战对象，还是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人员等，都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被纳入统战工作的视野。其次，数字统战工作能够精准识别和细分统战对象，实现个性化的团结与联合策略。大数据技术可以对统战对象的政治态度、社会角色、利益诉求、文化背景等多方面信息进行深度分析，从而为不同类型的统战对象量身定制沟通与合作的方案。例如，对于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数字统战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专业领域、政治参与热情和研究方向，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参政议政渠道和信息资源，进一步激发他们为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建言献策的热情，强化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力度。只有深刻把握大团结大联合原则，才能在数字统战工作中凝聚起最广泛的人心，汇聚起最强大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 以人为本原则：数字统战工作的价值根基

在数字统战工作的理论架构与实践体系中，以人为本原则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统战对象构成了数字统战工作的核心关注点，这一群体的需求、期望以及利益诉求，是数字统战工作得以构建与推进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对数字统战工作的整体架构起着根本性的支撑作用。

从理论层面看，数字统战工作作为统战工作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与创新，本质是一种以统战对象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实践的数字化转型。统战对象涵盖了多元的社会群体，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每个群体乃至个体都具有独特的社会背景、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这就要求数字统战工作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深入理解和把握统战对象的多元性特征。在实践操作维度，数字统战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必须紧密围绕满足统战对象的多方面需求来展开。在信息传播方面，鉴于统战对象在知识水平、信息获取习惯、政治关注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数字统战工作需要运用多样化的数字媒介和传播策略，确保信息的精准推送与有效触达。例如，针对年轻一代的统战对象，可更多地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等新兴数字渠道，以生动、简洁且富有时代感的方式传播统战信息；而对于一些年长或对传统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1页。

^②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3页。

信息来源依赖度较高的统战对象,则要兼顾传统媒体与数字化平台的协同,确保信息传播的全面覆盖。

(四) 安全可靠原则:数字统战安全的坚实护盾

统战工作的特性决定了其涉及众多敏感信息,其中涵盖了统战对象的个人隐私、政治态度以及社会关系等要素。安全可靠原则在数字统战工作中的贯彻,要求从技术与管理两个维度进行构建。从技术手段而言,应当积极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这是确保数据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关键技术手段。从管理层面来看,建立严格的制度规范是构建数字统战安全体系的重要保障。制度规范应涵盖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包括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共享和销毁等环节的详细规定,明确规定哪些数据可以被采集、如何进行存储、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以及与哪些主体共享等。同时,明确的责任体系也是管理层面的关键要素。这一体系应明确规定在数字统战工作中各个岗位、人员在数据安全管理方面的职责,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若出现数据安全问题能够进行精准问责,从而有效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现象,确保数字统战工作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下有序开展。

(五) 循序渐进原则:契合基层实际的行动密码

循序渐进原则是基于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实际情况而确立的科学发展方式。基层数字统战工作面临着诸如资源有限、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统战对象情况复杂等诸多现实挑战。这一原则要求按照基层的实际发展水平和条件,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展数字统战工作。从初期的基础建设、信息收集整理,到逐步深入的数据分析、精准服务,再到不断拓展的工作范围和深度,在整个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每个阶段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且,每个阶段都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和优化。要根据当地资源的变化、人员素质的提升以及统战对象情况的动态发展,及时调整工作重点、方法和策略,从而稳步探索出一条与基层实际高度契合的数字统战发展路径,确保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在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发展。

三、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建构正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统战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基层数字统战工作提供政策支撑。然而,挑战也显而易见,包括基层统战主体数字化水平较低、人民群众数字化应用能力滞后、数字统战工作平台机制不健全等。

(一) 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建设的重大机遇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层统战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可以更好地了解基层群众的需求和意见,实现精确化、个性化的服务。通过智能化的社区治理手段,如智能安防系统和垃圾分类技术,可以提升社区的安全管理和环境质量,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能够加强与基层群众的互动交流,及时传递政策信息,收集群众意见,推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密联系。此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也可以保障信息安全和信任建设,为基层数字统战工作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总之,科技发展为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将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服务质量,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基层数字统战工作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撑。乡村振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赋予农村新的使命,在促进基层全面振兴、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促进全域化统战工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

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①因此，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得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发展的投入，推动了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在乡村的普及与应用。政策上的支持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还为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乡村人才振兴战略，为基层数字统战的发展带来高质量人才资源，从而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手段，为统战工作的拓展和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实现基层统战工作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发展，推动统战工作走向更加科学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助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目前，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建设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之中，做好基层数字统战工作能够为统战事业的蓬勃发展新开辟新的道路和契机，推动统战工作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建设的现实挑战

尽管基层数字统战工作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建设是一项重要且复杂的课题，面临的挑战也不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是亘古不变的辩证法则”^②。做好基层数字统战工作，需要在充分利用机遇的同时，积极应对现实挑战，确保工作稳健推进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是基层统战主体数字化水平较低。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具备数字技能的人才，而当前多数地区存在人才短缺或技能不足的问题。此外，技术基础设施的不均衡发展可能导致数字鸿沟的扩大，使得部分地区难以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特别是由于地理位置、工作待遇、发展机会等因素的限制，在一些偏远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人才的引进也存有困难，很难吸引到专业的数字技术人才投身于统战工作，这使得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在技术创新和发展方面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同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通信信号覆盖不足，再加上部分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较低，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对数字化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入，导致数字化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二是人民群众数字化应用能力滞后。这种滞后性首先体现在欠缺数字化工具和平台的基本操作能力。群众可能对计算机操作、智能手机应用、网络平台功能等缺乏足够的了解。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的群体，复杂的软件界面、多样化的操作流程以及频繁更新的数字技术往往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这就导致即使数字化统战工作搭建起各种便捷的平台和服务，这部分群体也难以顺利地使用这些资源，从而无法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机会。当人民群众无法理解和有效运用这些数字化统战工作所提供的资源时，信息的有效传达和共享便成为泡影，造成信息在特定群体内部的封闭，形成信息孤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理解能力的参差，部分群众可能对数字化统战工作的目的、内容和影响产生误解。在缺乏准确解读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误读统战工作在数字化平台上所传达的政策信息、活动内容以及社会意义等，进而导致信息传播的失真和偏差，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和不满。

三是数字统战工作平台机制不健全。数字统战工作需要应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在管理和执行上的困难。在管理方面，统战工作涉及多个层面、多种群体，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而数字化转型使得这些原本就复杂的管理对象在新的数字环境下呈现出更多元的特点。不同群体对于数字统战工作平台的使用习惯、需求以及接受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就要求管理工作要更加精细化、个性化，但目前缺

①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3页。

乏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来协调这些差异。在执行层面,数字统战工作涉及信息收集、整理、分析,以及统战工作策略制定、实施以及反馈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然而,现有的平台机制在工作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各环节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容易出现工作效率低下、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四是传统工作观念与模式的束缚。基层统战工作者长期依赖线下工作方式,习惯面对面交流、纸质文件传递存档等,在与统战对象联络时倾向实地走访、线下座谈,这种方式虽有成效但效率低,难以满足统战工作对象增多和分布范围扩大的发展趋势。同时,部分工作者对数字统战工作认识不足,未深刻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仅将数字技术看作辅助工具,甚至怀疑数字技术在统战工作中的创新应用和有效性。在工作流程方面,传统统战工作流程存在局限且再造阻力大。如文件审批涉及多部门和层级,手续繁琐耗时,无法满足数字统战工作快速响应需求、及时处理事务的要求,像对党外人士政策建议的处理可能因流程问题出现延误。而且,构建数字统战工作时再造流程面临诸多阻碍,部门内部存在路径依赖,工作人员适应新流程需重新学习耗费时间和精力,部门之间因利益、工作重点差异难以在流程再造上达成共识,导致数字统战工作难以形成高效协同的流程。

四、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 抓住关键——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①在大数据时代,确保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有效推进,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应作为工作方向的根本依据,所有数字统战工作必须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下进行。为此,必须强化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完善的数字统战工作领导机制,确保党的意图和战略方向贯穿于数字统战工作的各个环节。具体而言,应由基层乡镇党委书记牵头,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制订详细的实施方案,并通过定期汇报和反馈机制,确保党的政策和要求及时传达到基层,确保各项工作措施符合党的总体方针。在实际操作中,必须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贯穿于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的全过程,同时注重强化部门间的协同合作,明确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首要责任,进行全局性的规划和系统性部署,统筹整合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各个工作领域。通过整体谋划,确保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始终保持在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的正确轨道上,有效推动数字化管理和服务的目标实现。加强和整合基层统战力量,抓住“大统战”的“牛鼻子”和“突破口”,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②。

(二) 立足主体——打造善统战懂技术的人才队伍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叶青大厦党委视察调研时指出:“叶青大厦党委在基层的高端人才中开展统战工作,这是创新,可以继续深化。”^③为提升统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数字化统战工作离不开专业的人才队伍培养,这不仅包括培养干部的数字化思维,更需建立一支既精通统战理论又熟练运用先进数字技术的专业复合型人才团队。为此,各基层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统战人才的政策支持,不仅要通过系统化的培训和实践经验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② 陈兴国:《基层统战力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24—28页。

③ 《凝聚思想共识 践行核心价值——学习贯彻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4页。

积累，确保干部能够灵活运用先进的数字工具，提升工作效能，还要深化用人机制改革，构建起统战组织上下沟通的网络。通过明确的分工和信息化链条建设，形成指挥执行、反馈总结、创新互通的工作格局，提高基层统战队伍的协作效能、执行能力，有效应对数字化挑战。同时，要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彰显数字统战基地的政治功能，提升统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专业素养；在不脱离基层的前提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提升统战干部政治责任感，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数字统战工作，推动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

（三）关照客体——推动常态化的数字统战工作

推动常态化的数字统战工作，可以实现多元声音的有效汇集与反馈，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共识。首先，社区是基层统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应深入社区开展广泛系统的数字素养教育，通过组织培训班或研讨会，提高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的数字化技能水平，更好为人民群众服务。其次，积极宣传与推广数字化应用案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①通过媒体报道、示范项目等方式在人民群众中积极宣传和推广数字化应用，可以激发人们的兴趣和动力，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其中，推动数字统战工作融入日常。最后，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建设更加便捷和易于使用的数字化平台和应用程序，如政务服务平台、社区服务平台等，使人民群众能够方便地获取信息、办理事务、参与社会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便利，从而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工作、学习与生活。

（四）创新载体——健全数字统战工作多元化平台

基层数字统战工作载体的创新旨在健全多元化的数字统战工作平台，以应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统战对象多样化的挑战，要以大数据为数字统战工作的核心基础，集成各类统战资源 and 数据信息，为政策制定、信息分析、工作管理和宣传推广奠定数据基础。要以构建多元化数字统战工作平台为数字统战工作实施的关键路径，利用互联网思维，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该平台应实现县（区）、镇（街道）、村（社区）各级单位的有机连接，促进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推动统战资源的下沉和服务的精准，将统战对象和统战阵地纳入管理平台，更为便捷地调动各类统战资源、统战力量、统战服务进入基层。通过构建全域化数字统战工作平台，整合各类信息资源，提升统战工作的智能化水平和治理效能，可以更好地响应社会需求和群众诉求，提升基层治理的响应速度和效率，促进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和优化。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为了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必须创新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加强数字技术在统战工作中的应用。基层数字统战工作不仅是技术手段的革新，更是工作理念和方法的升级。要以数字资源整合和数据智能化推动基层统战工作现代化，以数字化推进决策智能化和施策精准化，提升工作效率，为基层统战工作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统战工作将更加高效、精准和智慧，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前景，为实现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6页。

中越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张凤祥，陆平胜，胡学苴

摘要：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承担着滇东南边疆“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重任。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体向上向好，但对照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仍然复杂多样、民族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仍然尖锐复杂、边境长治久安任务仍然艰巨等现实挑战，还需要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理念目标任务，夯实“休戚与共”的物质基础、营造“荣辱与共”的社会条件、守牢“生死与共”的思想防线、筑牢“命运与共”的安全屏障，进一步增强各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向心力。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越边境地区；文山州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4-0038-1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①这“四个与共”理念的提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实践路径。“与共”有“在一起”之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同舟共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②，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民族都是家庭成员的“大家庭论”^③。在这个“大家庭”中，家庭成员必定休戚、荣辱、生死、命运“在一

基金项目：2024年度云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课题“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云南实践研究”；2023年度全省社院（校）科研协作课题“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JDXZ202302）。

作者简介：张凤祥，文山州社会主义学院统战民族文化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陆平胜，文山州社会主义学院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胡学苴，文山州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科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② 习近平：《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同舟共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7月23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23/content_5626981.htm，2024年10月30日。

③ 王延中：《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第3页。

起”，“家和”才能“万事兴”。文山州中越边境线长438公里，有麻栗坡、马关、富宁3个边境县，14个沿边乡（镇）42个抵边行政村（社区）的汉族、壮族、苗族、瑶族、彝族等11个民族13万余人生活在边境一线。探索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需挖掘其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理念的传统基因优势，聚焦现实挑战强弱项，引导该地区各族人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始终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休戚、荣辱、生死、命运“在一起”，增进“五个认同”，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

一、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与共”这一重大理念，是立足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的科学总结，是立足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分布格局的科学总结，是立足近代以来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携手奋斗，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歌可泣新篇章的科学总结^①。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到今天呈现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四个与共”理念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刻认识“四个与共”理念的科学内涵，挖掘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理念在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的传统基因，有利于该地区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为该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支撑。这些传统基因集中体现在休戚与共的历史记忆、荣辱与共的情感基础、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命运与共的真实写照四个方面。

（一）休戚与共的历史记忆

休戚与共，就是指有幸福共同享受，有祸患共同抵挡，形容关系密切，利害相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邦畿千里，维民所止”^②。马关、麻栗坡、富宁县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马关县小坝子镇田湾村苗族同胞有“只趾男”节庆活动，其“趾男呆生”叙事中有洪水泛滥成灾、兄妹成亲、繁衍人类的情节，中原及西南地区汉族、壮族、彝族、瑶族等各民族共有伏羲女娲始祖神话中，有“伏羲兄妹、大洪水、兄妹婚、繁衍后代”^③的情节，除“趾男呆生”与“伏羲兄妹”的称呼不同外，叙事情节极为相似；田湾村“牛影马掌”文化中，靠“牛影”测时辰、节气的方式，与中国古代用日晷测日影来确定时间和节气的原理相同。这些从上古时代口口相传至今的故事、数千年播撒中华大地的农耕文明，承载着民族生生不息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精神信仰、文化认同的表达载体，表明中华民族文脉相通，反映文山边境地区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都是炎黄子孙。秦汉以来，“大一统”的国家治理理念贯穿在历朝历代的边疆治理过程中，未曾中断，马关县、麻栗坡县、富宁县自西汉时期被纳入牂牁郡辖地，开启内地加强与边疆的联系以来，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战争动乱，还是国家政权更替变迁，各族人民始终同祖国大家庭唇齿相依，一刻也没有分离，始终在“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下生存发展，始终把守护疆土作为世代相传的历史使命，如马关县罗家坪村熊光泽一家三代守边、护边的行为，彰显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上这些，就是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各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休戚与共”历史记忆的缩影。牢固树立“休戚与共”理念，有利于引导

^① 中共国家民委党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8日，第12版。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③ 汪立珍：《中华各民族共有祖先崇拜神话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6期，第91页。

该地区人民深刻认识“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①，增进对中华文化及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爱我中华”根植于心灵深处，促进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共享欢乐与幸福。

（二）荣辱与共的情感基础

荣辱与共，意指光荣与耻辱共同分享与承担，侧重于尊严体面、荣誉骄傲。中华民族曾经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我们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历史^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生活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中国人被西方列强戴上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只要是中国人没有哪个能独善其身，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来自人民、诞生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对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苦难有着最深的体悟，其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崇高使命，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有了主心骨。文山越边境地区各族人民也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开启了洗刷百年耻辱的新征程。早在1928年，党就在马关县八寨开展农民运动工作，通过建立农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1930年2月领导了八寨农民武装暴动，成为推翻封建主义压迫在文山越边境地区的生动实践；20世纪30年代初，党在麻栗坡县通过组织“读书会”“自治会”“演讲会”，在董干一带组织“兄弟会”等^③，向各族群众传播党的理想和革命主张，奠定了边境地区“荣辱与共”的群众基础；富宁是云南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境内有2600多名各族儿女积极投身革命队伍^④，壮语《国际歌》从革命年代传唱至今，照应了那些年当地各族优秀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民族解放事业共同团结奋斗的火热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中华民族找回失落百年的民族尊严，实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到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上这些，就是党和人民始终“荣辱与共”的情感基础。牢固树立“荣辱与共”理念，有利于增进文山越边境地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增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领导各族人民战胜民族复兴伟业中可能发生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三）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

“生死与共”指向“存续与衰亡”，有同生共死、相依为命之意，无论生和死都在一起、不能分离，这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保卫边疆中得以充分彰显。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19世纪末，法国为扩大殖民范围，妄图从文山州越边境武装入侵云南，在麻栗坡县扣林山一带，苗族首领项从周带领苗、瑶、壮、汉各族群众坚决抵抗，保卫领土主权，反映了边境各族群众“生死与共”大家庭意识的觉醒；在马关县趾男山一带，各族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与法国侵略者展开激烈的战斗，如今还留有的趾男山战斗遗址，时刻提醒着当地各族人民对“生死与共”的深层反思。日本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28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③ 傅圆媛、吴小梅：《文山地区早期党组织及其活动》，2023年9月23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IFBBRMI10521CM7J.html>，2024年10月30日。

④ 富宁县电子信息中心：《云南最早的革命老区就在这里：富宁！》，2024年1月12日，https://www.ynfn.gov.cn/zjfn/lswb/content_25283，2024年10月30日。

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体中华儿女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日军从越南海防登陆后，麻栗坡、马关、富宁三个边境县成为抗日战争的前沿，边境各族人民通过参军参战、为前线运送弹药、抬送伤员等支援抗战，以血肉之躯筑起边境“钢铁长城”。通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彰显了中华民族“生死与共”的伟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军民用青春、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老山精神”，仅麻栗坡县就有188个民兵连近29600多名民兵参与后勤工作^①。在这些救亡图存、保卫边疆的历程中，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形成了难以分割的血肉联系，昭示着只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和风险。牢固树立“生死与共”理念，有利于引导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深刻认识“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②，切实将“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着在一起，共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携手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四）命运与共的真实写照

命运与共，就是利益相同，命运相同，侧重于历史记忆、前途选择，意指各族人民共同主宰命运、把握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经尝试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面对“中国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李大钊、陈独秀等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华民族先进分子，主张“用社会主义救中国”，为中华民族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中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人民从此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千方百计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与全国一道实现了全面小康，圆了千年夙愿。这些年，文山州以“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为目标，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聚力将42个沿边行政村（社区）718个自然村（组）打造成为富边的样板、稳边的示范、守边的屏障，打造边境线13万人的幸福港湾，大幅提升了各族群众满意度、幸福感，涌现出以“强边有我、请党放心”“国门就是家门、家门就是国门”“出门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放牛就是放哨”等一批守边护边先进事迹^③。20世纪50年代，马关县边境田湾村群众为庆祝新生，表达翻身不忘记毛主席的感恩之情，在趾男山等地用石头垒砌了“毛主席万岁”“新中国万岁”等巨字，如今仍在青山之间赫然醒目。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田湾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2021年人均纯收入达1.2万余元，张家湾村小组为感党恩，在村口路边砌建了“共产党万岁”大字石墙，表达“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感谢共产党”的心声。为守好边防建好边疆，田湾边民每年都举行卫国守边宣誓活动，历经70载。这一切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

① 田跃：《三上老山支前，最难忘的是战士高呼“民兵万岁”》，2017年11月28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D4A4GULG05259PQ5.html>，2024年10月30日。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28日，第2版。

③ 陶红、马新焕：《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追山赶月莫停留 平芜尽处是春山》，2023年9月28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IF02H3680530TF40.html>，2024年10月30日。

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牢固树立“命运与共”理念，有利于引导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牢记“国之大者”，深化“扎根边疆、心向中央，拥护核心、心向北京”实践，筑牢边境安全屏障，以“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二、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有利于认清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内生动力，把民族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上，发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作用，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是：民族地区发展迈上新台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趋势不断增强，但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仍然复杂多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不断巩固，但民族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仍然尖锐复杂；反分裂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所谓民族问题对我国遏制打压变本加厉，边疆长治久安任务仍然十分艰巨。^② 对照这些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到的问题，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仍不同程度存在，这既是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挑战，也是民族工作的着力点。

（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

后发展和欠发达仍是文山的基本州情，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乡村振兴、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短板、弱项，特别是边境地区农村地处偏远，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加之受山高坡陡等自然条件限制，发展的基础条件薄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相对突出。从收入来源看，除了实施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的村寨通过“一村一品”产业培育，助农增产增效增收外，传统种植业与青壮年群体前往沿海、内地城市务工依然是最为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村落呈现“空心化”态势，发展活力不够强，存在返贫风险。从收入状况看，2023年马关、麻栗坡、富宁县人均GDP分别44906元、49402元、41182元，远低于全国8.936万元、全省6.411万元的人均水平；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507元、35773元、38532元，农村分别为15654元、15530元、15989元，城乡差距较大。另外，调研中发现很多边境村寨仲秋时节已收完春季作物（玉米），但大多村寨没有种植秋季作物的习惯，且少数人存在“等、靠、要”思想，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待增强。这种状况下，远离家乡外出务工易产生留守老人儿童照管、家庭感情维系等忧愁；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日常就业、工资、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民生体验与沿海、内地相比差距过大，致使部分人心理失衡，甚至出现国家认同意识淡化等问题。倘若“休戚与共”中“休”少“戚”多，必然会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仍然复杂多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28日，第2版。

② 常安：《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2022年11月1日，<https://www.nwupl.edu.cn/news/mbbd/mbgz/100892.htm>，2024年10月30日。

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①从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状况看，离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目标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第一，互嵌式发展存在障碍。文山边境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到沿海、内地城市务工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但一方面，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与流入地城市居民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或成为“你们”“我们”的区别，存在因认知、认同差异而引发矛盾的风险；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还存在一定的偏见，有的在观念中认为农村来的生活习惯差、文化素质低，甚至因极少数人存在的违法乱纪行为而以偏概全，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致使有些青壮年劳动力或因收入不理想，或因学龄子女就学等，不停往返各城市与边境农村，没有安居乐业。这些因素，致使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难，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深度不够。

第二，大汉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依然存在。封建统治下形成的民族关系影响深远，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猜忌、不信任和戒备心理，有的还留有各民族相互之间的蔑称；少数大汉族主义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爱搞包办代替、指手画脚，狭隘民族主义表现为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要以本民族的利益为主，遇事首先考虑本民族。

第三，语言交流不够通畅。因地处偏远，缺乏语言交流环境，部分年龄稍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只能听懂简单的普通话，有的村组干部国家通用语言表达能力亦不强，甚至答非所问；各民族之间语言大多不相通。这种状况下，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难以达成理解，不仅影响党的民族政策落地实施，也难以形成认同。

以上这些因素会导致民族隔阂甚至对立，伤害“荣辱与共”的情感，弱化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不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

（三）民族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仍然尖锐复杂

边疆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战略地位重要，是国家间意识形态交会、渗透和争夺的复杂区域。在世界正经历百年变局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日益频繁，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民族领域意识形态也不断面临新挑战，斗争形势仍然尖锐复杂。

第一，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交会。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有天保、都龙、田蓬3个国家级一类口岸，24个边民互市点，13条出入境通道，3个边境县13个乡镇43个村委会（社区）283个自然村与越南2省9县46个社（乡）141个村接壤^②，汉族、壮族、苗族、彝族、瑶族、傣族等民族跨境而居，而接壤的越北民族地区天主教、基督教发展速度远高于我国一侧，且有美国政治背景的“福音教”组织发展迅速^③，在中越互动交流中，边境地区成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交会的场所，境外民族主义、“美国福音路德会”等分离思潮悄然渗透，冲击着我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主导地位，影响边境各族群众思想。

第二，全媒体时代民族领域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敌对势力利用微信、微博、QQ等载体，在边境通过语言、图像渗透等方式，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等挑拨民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具有的开放性、全球性、监管难等特点，给民族领域意识形态建设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② 周芷帆，《关于边境管理·你关心的都在这》，2022年9月20日，http://news.sohu.com/a/586618997_121123734，2024年10月30日。

^③ 徐祖祥：《美国在越南宗教渗透影响中越边境政治稳定》，2014年6月19日，<http://www.wyxxwk.com/Article/guofang/2014/06/321934.html>，2024年10月30日。

带来新的难题。

第三,信仰危机波及民族领域意识形态。随着改革开放及人口大流动加速,西方价值观借势涌入边境地区侵占民众思想阵地,有的大肆宣扬西方社会优越感,导致“崇洋媚外”思想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刻意夸大我国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压迫等,妄想割裂边疆与内地的关系,有的攻击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诋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以上这些,会离间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家庭成员关系,造成思想混乱,产生“胳膊肘往外拐”问题,需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四) 边境地区长治久安任务艰巨

文山州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典型代表,具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境问题相互交织的突出特点,且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信仰相似,这种民族宗教因素聚集、地理位置特殊、文化环境复杂的地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长治久安任务艰巨。

传统安全方面,政治安全形势严峻。敌对势力瓦解、分化、阻挠、破坏我国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阴谋从未停止^①,尤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所谓民族问题对我国遏制打压变本加厉,妄图制造混乱、分裂,遏制我国发展,而边境是其“抵边刺探”的突破口,其惯用手段为:通过宗教宣扬西方价值观念,或借助文化宗教同源性散布民族分裂言论,以宗教认同挑战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认同^②;把本属于不同民族公民间的矛盾泛化为民族问题,把本属于不同信教群众之间的个体矛盾泛化为宗教问题^③。

非传统安全方面,跨境违法犯罪屡禁不绝。一是“三非”人员问题依旧存在。虽因新冠疫情建立了物理隔离带,但受边境线长且地理环境复杂、便道多及我方部分边民“偷引带”等影响,该问题时有发生。“三非”人员迫于生计极易实施盗窃、涉黄、抢劫、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扰乱社会治安。二是跨境非法婚姻存量较大。据实地调研,未办理结婚登记的越南籍“媳妇”有的因中国丈夫外出务工成为“新”留守妇女,有的婚姻家庭观念淡薄“一女多嫁”,有的动机不纯骗取礼金。在此状况下,除有收集中方情报信息、产生政治安全隐患外,直接影响群众家庭幸福、财产安全,出现边境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影响中越睦邻友好。三是跨境毒品走私犯罪严重。据公开数据,2023年以来破获1千克以上跨境贩毒案达4起,最多一起达36.6千克,直接威胁到边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外,“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随时可能因“山高皇帝远”而死灰复燃,引发矛盾和冲突。

以上这些表明,边境线上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安全发展环境堪忧,如果“命运与共”的理念受到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受到冲击,不利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三、推进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路径

针对文山州中越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现实挑战,应该在党的全面领导下,

① 郝亚明:《深刻把握“两个大局”时代背景——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2021年11月22日, <https://mzw.abazhou.gov.cn/abzmzw/c103612/202111/2a649b8e54d24d0aaa6bccbeecad5348.shtml>, 2024年10月30日。

② 王国忠:《云南沿边村寨建设与守土固边对策研究》,2019年6月17日, <https://www.ynce.gov.cn/html/190617/9986.html>, 2024年10月30日。

③ 方盛举、张增勇:《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边境安全及其治理》,《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01—102页。

通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夯实“休戚与共”的物质基础；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营造“荣辱与共”的社会条件；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守牢“生死与共”的思想防线；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筑牢“命运与共”的安全屏障，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更好履行“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职责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

（一）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夯实“休戚与共”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多办一些顺民意、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①立足文山越中边境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的实际，需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夯实“休戚与共”的物质基础。

一方面，夯实均衡发展之基。一是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加大优惠政策的倾斜力度，积极出台精准有效的差别化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优先支持民族地区，与此同时州县乡党委政府积极做好相关政策衔接准备。二是用好现有国家对民族地区差别化支持政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和帮扶机制，消除边境各族群众的后顾之忧。三是进一步推进民生建设，实施好边境一线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各族群众最关心领域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不断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夯实均衡发展之基，让边境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委政府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另一方面，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一是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弘扬“西畴精神”，破除“等、靠、要”的思想和“懒、散、慢”的心理，促使各族群众共担责任、共建美好家园。二是认清自身发展优势，找准产业发展新赛道。边境一线有马关都龙、麻栗坡天保、富宁田蓬三个国家级口岸；边境村寨既有山高坡陡的劣势，更有农业资源、民族文化富集优势，如马关边境村寨的草果、砂仁，麻栗坡沿边红色文化、百年古树茶，富宁边境村寨的石斛、重楼、八月瓜等，这些有利于立足区位、通道及资源禀赋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找准产业发展新赛道；通过“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党建+红色文化”等方式发展新业态，发力“新赛道”，为增加收入、缩小发展差距提供基础性支撑，助力乡村振兴走上快车道。三是坚持绿色发展，立足边疆、民族、山区、美丽实际，念好“山字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通过培育“一村一品”产业支撑村级经济、促农增产增收，积蓄发展新能量，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基石。

通过这些举措，夯实“休戚与共”的物质基础，不断实现边境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推进共同富裕更加“有形、有感、有效”，使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更具感召力，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引领各族人民走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创造“荣辱与共”的社会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②针对文山越中边境地区仍存在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素复杂多样的状况，

^① 任一林、闫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11）：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人民日报》2019年8月5日，第6版。

^② 习近平：《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2017年05月2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n1/2017/0609/c40531-29329154.html>，2024年10月30日。

需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创造“荣辱与共”的社会条件。

首先,正确把握民族工作的“四个关系”。“四个关系”即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①,要明晰哪些方面必须“同”,哪些方面可以“异”,共同性是根本、前提、方向,尊重差异不能固化影响民族进步的因素,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必须是“合法权益”;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深刻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既要“管肚子”,更要“管脑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强化导向作用。

其次,贯彻落实好国家民委关于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项计划。立足文山越边境的地区发展、边民就业实际,尤其要落实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优化营商环境等,一方面,支持边境各族群众到东中部地区就业创业、居住生活,帮助到内地、沿海城市的边境各族群众“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进而实现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切实组织开展好“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立足文山越边境国家级口岸通道优势,依托三七、草果、砂仁等特色资源,围绕温润气候条件、淳朴人文环境等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支持内地企业到边境一线投资兴业、开发建设,为边境注入先进理念、厚积发展资金、焕发经济活力。通过双向交流、互动、发展的方式,促进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

再次,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中小学国民教育为基础,以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为统领,以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为抓手,以开展民族节庆、节日活动为契机,以各种新媒体为载体,大力在边境一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消弭各民族间语言文字不通、信息交流不畅、文化互动不足的问题,促进各民族情感沟通、信息贯通、心灵相通、观念融通,为凝聚民族团结共识提供保障。

最后,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云南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文山既有“特磨古道”历史故事,也有《本草纲目》中文山三七被称为“金不换”的历史见证,需加强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找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山越边境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契合点,讲好边疆、边境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情感上与内地相依相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故事,引导边境各族群众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一直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凝聚成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特别是要从幼儿园娃娃抓起,让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通过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创造“荣辱与共”的社会条件,使边境各族群众之间加强了解、消除隔阂,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深化“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意识,促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凝聚起“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强大合力。

(三)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守牢“生死与共”的思想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

^① 李荟芹:《正确把握“四个关系”建设美丽幸福西藏》,2022年4月6日,<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2040403-1.htm>,2024年10月30日。

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① 因此，针对文山越边境地区民族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仍然尖锐复杂的形势，需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守牢“生死与共”的思想防线。

第一，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各级组织^②。因此，需推动全州各级党委增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敏锐，进一步压紧压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各项任务，始终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有人管、有人抓，坚决防范各种错误思潮滋生蔓延。

第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根本在人才，根本靠队伍。^③ 为此，需立足文山州“边疆”“民族”的特定属性，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好干部“四个特别”的标准要求^④，培养意识形态工作干部队伍，尤其是需培养边境一线各民族干部队伍，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发挥其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将党的政策变为各族群众的自觉行动，引导大家共同抵御各种错误思潮，捍卫生死与共的“思想防线”。

第三，推进对边境地区“网络民族舆情”的研判及监管。一方面，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网民对“民族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上决定了其在网络上为谁“站队”、为谁“说话”，需网络监管机构健全以“民族问题”为中心的舆情收集、分析、警报和处置机制，研判“网络民族舆情”传播影响力，预测可能带来的风险，及时有效处置负面舆情、回应群众诉求、正面引导舆论；另一方面，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促进党政、司法、网信等部门通力协作，依法处置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和散布谣言等行为，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余毒的影响，让文明新风浸润网络空间，使线上正能量始终充沛。

第四，加强正面宣传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引领，通过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十进”活动，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五史”教育，引导边境各族干部群众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通过这些举措，守牢“生死与共”的思想防线，推进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的精气神，增强做中国人的自豪感，坚定“四个自信”，进而使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有效防范化解新征程上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四）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筑牢“命运与共”的安全屏障

中华民族自古就懂得“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边疆稳固和长治久安，既是边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保障，也是国家和谐稳定发展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眼长治久安，高举法治旗帜，用好法律武器，提升法治化水平，筑牢稳定的法治基础。”^⑤ 为破解文山越边境地区传

① 冯虔章：《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纲领——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第23页。

②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214页。

③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219页。

④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⑤ 习近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定位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2023年8月26日，https://politics.gmw.cn/2023-08/26/content_36790214.htm，2024年10月30日。

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实现长治久安提供了行动指南。

第一,持续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围绕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部署、宪法和国家安全法等内容,开展贴近生活的法治宣传教育,引导边境各族群众增强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意识。

第二,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一方面,加强党同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用团结教育和疏导化解的方法解决矛盾纠纷,防止伤害民族感情的事发生;另一方面,依法保障边境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将是否违反法律法规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基本标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事)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边境社会秩序平稳运行。

第三,高悬法治“利剑”,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一是坚持依法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对我国进行的各类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挫败其“反中乱华”政治图谋,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二是依法严厉惩治打着民族、宗教旗号,恶意炒作涉及民族因素敏感事件、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和制造事端的不法分子,形成强大威慑力,为边境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持续整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惩处涉毒、婚托、非法宗教;加强中越司法合作,依法收审、拘押、遣返“三非人员”,守住中越睦邻友好;依法查处容留“三非人员”的单位和个人,依规取消“偷引带”者边民补贴,警示教育广大群众,遏制非法入境行为。

第四,依法推动跨境非法婚姻向合法转变。以推动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为契机,立足历史遗留跨境非法婚姻存量及增量管控难的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按照民族地区差异化政策出台的思路,努力推动从顶层设计着手,制定或完善相关涉外婚姻的法律法规,为跨境非法婚姻向合法转变提供法律依据,推进给予“越南媳妇”中国公民身份的举措,落实依法管理,使之成为增进中越睦邻友好的纽带,促进边疆边境地区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让“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成为净化制约边境长治久安“土壤”的标准,筑牢“命运与共”的安全屏障,确保边境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增进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把自身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牢牢联系在一起,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责任编辑:杨松禄

民族地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为例

孔 婷

摘 要：红色文化资源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实践表明，西双版纳州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成效显著，但仍存在资源基础较为薄弱、宣传教育力度有待加强、内在价值挖掘不够等问题和挑战。进一步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要完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保障机制，创新红色文化资源教育方式，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切实做好红色文化宣传。

关键词：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双版纳州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4-0049-07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红色文化资源是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所创造的具有显著时代特色，体现革命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成果。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挖掘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团结，保障国家统一，以及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西双版纳州全域均为革命老区，在这片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带领西双版纳州各族人民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形成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独特的红色文化。因此，以西双版纳州为例，探究红色文化资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可为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进路提供经验借鉴。

一、以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

基金项目：2023年西双版纳州统一战线服务大局实践创新课题“民族地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为例”（2023TZ012）。

作者简介：孔婷，西双版纳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传播与社会。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已深化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②红色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同胞团结奋进的故事，蕴含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密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力量，已逐步发展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引擎。具体而言，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实践中有助于全面增进“五个认同”。

（一）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可以引导各族人民共同回顾革命历史，感受先烈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通过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增强“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民族团结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等理念，^③使各族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伟大祖国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进一步加深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凝聚爱国主义情怀。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蕴含着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是一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材。例如，渡澜沧江作战纪念碑、勐海解放纪念碑等革命遗址，反映了深受封建领主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各族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和彻底解放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历史，彰显了边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投身于解放斗争的爱国情怀。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树立国家形象，培育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作用。

（二）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增进民族团结的前提。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可以向社会展示中华民族在国家危亡之时，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命运相连，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杀敌，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事迹；展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走向共同富裕的故事。例如，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召开“各族各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会议，订立《爱国公约》，组织民工待命支前，发动各族群众捐献财物、送青年积极参军支前等，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抗美援朝，各民族同胞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爱之情，共同诠释了中华儿女舍生忘死的民族风骨。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凝聚起新时代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三）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锻造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④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可以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丰富革命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凝聚而成的精神共识，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民族解放、社会繁荣发展而勇往直前、不懈奋斗，构筑起共有精神家园。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部鲜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材。例如，召存信同志对党忠诚、心系群众、维护团结、无私奉献的故事，体现了边疆各族人民坚韧不拔、勇往直前，一心向党、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这些中华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② 董国菊：《边疆治理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第33页。

③ 刘强勋、刘宇杰、卜爱丽：《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第57页。

④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1版。

文化传统智慧和民族复兴的精神追求构成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对于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四）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红色文化资源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夺取胜利、开创辉煌的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而不怕牺牲、不懈奋斗、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的历史。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精神密码，其内含的团结奋斗精神元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谓是一脉相承。^① 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可以使各族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夺取新胜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初心使命，更加自觉坚定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蕴含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勇毅前行的不竭动力，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梦教材。例如，西双版纳解放纪念碑、勐龙烈士陵园等资源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写照。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对于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行，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重要作用。

（五）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充分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红色文化资源，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解决民族问题而提出的正确方案，中华民族共享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和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强了各族群众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蕴含着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是一部鲜活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教材。例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之后，积极培养提拔民族干部，进一步加速了自治机关的民族化。重视对各民族劳动青年的培养工作，如傣族知识青年刀治国经教育培养成为自治区政府委员和勐养政府主席。自治区的成立激发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开启新生活的热情，发挥各族干部群众当家作主的主观能动性，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联动。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增强各民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具有重要作用。

二、西双版纳州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

通过挖掘红色资源，搭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平台，可以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政治教育、文化传承、思想引领等多维功能^②，进一步坚定各族群众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以西双版纳州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1. 加强红色文化教育。注重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收集，多措并举做好红色文化理论宣传工作。一方面，挖掘红色历史，开展西双版纳重大事件的收集整理编研工作。近年来编纂出版了《中国共产党西双版纳历史简明读本》《中国共产党西双版纳英模》《中国共产党西双版纳大事记》《中

^① 刘强勋、刘宇杰、卜爱丽：《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第56页。

^② 陈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实践路径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23年第6期，第166页。

国共产党西双版纳历史展》《赤胆忠心 爱民千寨——人民心中永远的“老州长”召存信纪念展》等书籍，成为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宣传的生动教材。另一方面，将红色资源与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列入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党员教育等学习体系中，组建讲师团深入基层宣讲，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通过讲好红色故事让广大党员和群众从中获取奋进力量，凝聚起继往开来的自信和担当。除此之外，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理论研究，进一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中的价值，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向精神力量转化。

2. 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基础。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通过整理、保护和研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使之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一是通过加强对遗址的保护，科学规划教育基地，对红色资源有关史料进行挖掘、研究、论证和转化运用等方式，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动教材和鲜活案例。目前西双版纳州共有44个革命遗址、12个党史党性教育基地、9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7个红色旅游景区景点、11个红色旅游乡镇、31个红色文化遗址和8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并且培养了多名讲解员，注重提升其讲解能力和服务质量，充分发挥教育基地的功能和作用。二是通过举办红色文化展，进一步丰富红色文化讲堂，使红色文化资源更加形象直观。三是通过打造红色文化基础设施，构建矩阵式宣传教育阵地。目前，共建成53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街道、广场、公园），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建美好家园的历史。其中，有10个党建文化主题公园和12个红歌小广场，使各族群众在休闲娱乐中学习和了解党史，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红色教育。五是把红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听、可感受的红色旅游产品，使红色文化资源“热起来”。结合打造“世界旅游名城”定位，开通了“西双版纳红色记忆”6条旅游线路，涵盖西双版纳主要红色革命基地，使更多人接受到革命传统教育。四是利用好干部教育培训平台，发挥党校宣传教育优势，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传承红色文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工作。依托资源优势打造现场教学基地，建立了勐海县打洛镇勐景来村、雨林古茶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教学实践点，组织各类培训班参训学员走进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

3. 红色文化作品创作助力民族团结进步。充分调动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的热情，深入挖掘、搜集、整理、创作红色文艺精品，讲活讲好红色故事，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式。一方面，通过音乐、曲艺、绘画、书法、摄影等艺术形式，讲好西双版纳故事，使各族人民在观看了艺术作品后，能够增进了解、加强团结。例如编排基诺族大型舞蹈诗《跟着阿舅走》，以展现基诺族这个跨越了千年文明发展史的直过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上安居乐业、繁荣发展的幸福生活为主题，用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基诺族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信心和决心，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所进行的实践探索。另一方面，各媒体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功能，讲好红色故事。西双版纳电视台开设了《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电视栏目和《主播讲党史》广播节目。傣语专题栏目《听傣乡》和哈尼语专题栏目《哈尼天地》都推出了党史广播剧。西双版纳报社开设了《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我为群众办实事》《童心向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推进建设‘一城两区’西双版纳》等专栏，挖掘好红色文化资源，宣传党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携手同行，共同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向前发展的做法、好经验、好成果。

（二）以西双版纳州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问题

1. 资源基础仍较为薄弱。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加强。同时，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意识不足，相关保护与支持政策缺乏，保护和利用存在不平衡的现

象。一些革命遗址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维护资金不足等原因,保护和利用状况较差。和文化旅游产业有交互性的红色文化景区配套设施不完善,产业结构较单一,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亟待进一步推进。

2. 宣传教育力度有待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文化载体建设不足,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足。红色文化资源中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价值尚未被挖掘提炼,其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较薄弱。此外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缺乏创新性、生动性和感染力。同时,宣传手段传统而单一,利用新媒体优势传播红色文化的举措较少,没有充分打响红色文化资源的知名度。群众对红色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主动走进民族地区开展各类红色教育活动方面还有差距,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智慧和力量的作用发挥不明显。

3. 内在价值挖掘不够。红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创造的精神财富,既有历史意义,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价值。但目前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所体现的内在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影响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际效果。一是教育基地运作模式趋同。教育基地特色不够鲜明,展示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甚至一个革命遗址就是一个基地,相关史料不多,缺乏别的元素来营造氛围,教育效果不佳。基层宣讲或课堂讲授中,授课教师单向灌输情况较多,缺乏互动性、体验性、针对性,使得讲授的内容枯燥,感染力弱,不能激发广大群众对红色文化的尊重和认同。二是资源整合度不够。红色文化场所分布较散,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缺乏全域性规划,各场地没有形成深度联系。收集整理方面,多以政府部门为主体进行收集,没有形成多方协作机制,整合能力较弱。除此之外,更加注重革命遗址等物质性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对民族团结故事等非物质性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精神引领层面被弱化。三是挖掘故事的深度不足。对历史经验的挖掘与拓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例如红色教育基地中简单罗列历史事件比较多,精神实质探索比较少,内容设置上缺乏与现实的对接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红色文化资源与当地民族文化结合较少。如何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各族群众生活,切实发挥凝心铸魂的作用,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思考。四是现场教学流于形式。虽然现场教学地点比较多,但活动过程形式化,实际教育效果欠佳。有的活动只满足于“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把“实地打卡”等同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而对“想一想”考虑得不多。五是红色文化产业结构单一。红色产业基本以红色旅游业为主,文创业、影视业、演出业等产业领域开发较少。

三、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议

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落实新时代民族工作方针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始终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

(一) 完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保障机制

西双版纳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要对红色文化资源做好顶层设计,分类管理,落实好保护与利用相关制度,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坚实基础,构建“红色护盾”。一方面,建立健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制定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通过摸底排查,绘制出红色文化资源清单,分级分类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确保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对革命遗址、纪念设施等进行全面普查、保护和修复,同时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以便于传播和利用。另一方面,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投入资金和人才保障。要设立红色文化资源专项保护资金,支持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工作。培养、招募一批专业讲解员、志愿者等,做好红色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阐释工作。加强

培训,注重提升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并聘请红色文化研究专家、革命老战士或英烈后代当兼职讲师,不断丰富讲解内容,推动理论联系实际。同时,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的联动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形成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合力。政府引导是重要保障,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划及标准,统筹协调各部门共同助力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企业要积极参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社会提供丰富的红色文化产品;社会组织要广泛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良好局面。

(二) 创新红色文化资源教育方式

传统的红色教育往往侧重于课堂展示和静态展示,难以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因此,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多种方式的宣传教育,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使之更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载体。一是利用科学技术整合红色资源,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建设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库,如虚拟现实、数字博物馆等,利用图片、文献、音影、VR技术等形式还原历史。通过沉浸式的体验,让参观者更加直观地了解红色文化,感受红色精神,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激发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二是充分发挥媒体宣传阵地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教育渠道,使红色文化资源更加便捷、高效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此外,还可以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制作具有当地特色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内容,在新媒体平台以短视频、微电影、音频、图文、动漫等形式传播红色文化,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途径,提高红色文化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三是积极探索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结合本地红色资源,挖掘思想内涵,在各个教育环节中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体系。例如在党校干部培训课堂中,可以设计以西双版纳开展武装斗争史为主题,以党的领导、艰苦奋斗、民族团结等不同培训模块进行交流。要因地制宜制定教育基地讲解模式,不局限于通稿讲解,而是根据不同对象、不同主题从不同角度开发出讲授类课程。同时需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场域,改变传统讲授的模式,创新开发情景剧、访谈、演讲等形式,实现理论讲授、情境体验、案例教学、现场互动等有机融合,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课程在各类教育培训中“活”起来。四是丰富红色文化多元业态。通过开发红色旅游线路、创造红色文艺作品等形式,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旅游品牌,科学规划路线,体现个性化,避免同质化。用全域旅游的思路探索红色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机结合。通过修复革命遗址、建设红色主题公园、举办红色文化艺术节等形式,让红色文化资源更好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增进人们对祖国、对家乡的认同。

(三)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是维系各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人文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①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内涵彰显时代价值,为我国民族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一是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献资料收集工作。共同加强对西双版纳红色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重要历史活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加强对相关史料的整理和开发,为编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材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合。对红色文化资源要进行总结提升,围绕“三个离不开”讲好民族团结的故事,凝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人民日报》2021年6月17日,第1版。

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共识。一方面,根据教育主题选择红色文化素材及其表现形式,从红色精神中获得共鸣。例如要体现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同艰苦奋斗主题,可以依托革命旧址,打造一系列有亮点特色的主题展馆开展体验式教学。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各族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增强教育内容的时代感和实用性。例如“老州长”召存信的故事对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除了讲好召存信“永远跟着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要爱民千寨,不要爱钱千袋”等生动历史故事,还要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融入其中,讲好新时代的故事。三是将红色文化资源与当地民族特色文化相结合。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耦合关系,将红色文化融入各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中,结合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内涵和表达形式,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激发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例如将传统节庆活动与红色文化结合,展现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形成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相结合的良好氛围,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伟力。培育红色文化品牌,创作一批红色歌舞、红色故事、红色戏剧等文艺作品,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故事,打造有针对性、有感染力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形式。寻访亲历者、见证者或其后人,进一步收集第一手资料,增强教育效果。

(四) 做好红色文化宣传

通过弘扬红色文化,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明确红色文化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意义,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二是发挥先进模范作用。注重挖掘和宣传西双版纳州发展进程中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进一步加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三是通过多种渠道宣传红色文化。通过组织学术研讨会、编写红色文化教材、开展红色文化讲座等形式,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传播,用研究成果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利用媒体进行线上线下宣传报道,拓宽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通过举办科普活动、红色文化宣讲大赛等方式,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的知晓度,营造传承红色基因的文化环境和关注红色资源的文化氛围,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红色文化传承与宣传教育中来,让红色文化资源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依托。

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红色文化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合,在本质上着重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它将会唤醒和再现不屈不挠、团结一致的红色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情感认同感,这充分体现了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高度耦合关系。^① 聚焦西双版纳州红色文化资源,探讨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和路径,分析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探究如何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将之运用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以进一步发挥出红色文化资源功效,切实增强各族群众对红色历史的认同,提升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耿俊茂、廖丽:《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路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23年第12期,第103页。

新中国诗词成就与旧体诗的现代适应性

诗词是中华文化中最精美的部分，备极灿烂，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精神标识之一。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旧体诗词一度边缘化，陷入沉寂，但它并没有消亡，始终在默默发展。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增强，诗词重新焕发生机，走向复兴。20世纪末，我发表《旧体诗词复兴论》（《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较早倡导当代诗词复兴之说。本世纪初，我在《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中说，现当代诗词研究将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现在，这些看法都已经被实践所证明。诗词创作欣欣向荣，诗词研讨热烈，成果渐丰，逐步进入当代学术体系。旧体诗词在现代社会必然走向衰亡的观念被彻底颠覆，旧体诗词与新诗的二元对立事实上已经消解，双线并行的趋势更加明显。诗词重返文学中心和生活现场，重新影响国人精神生活，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大事件。

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重视中华诗词研究，2019年3月，和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联合举办“中华诗词复兴论坛”；2020年12月，又与《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共同举办“第二届中华诗词复兴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研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诗词复兴的关系。会议认为，中华诗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中蕴含的哲学智慧、情感艺术、气度神韵，是中华文明的底色。新时代迫切需要一场“文化复兴”，诗词复兴可作先声。我们正在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在国家民族繁荣昌盛的上升时期，要用诗词来反映和见证这个时代，助推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这些观点，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中华文化学院为全国文化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开展中华诗词研究作出示范。

近些年，随着诗词创作的繁盛和当代诗词经典化的呼唤，各方面重视现当代诗词成果的总结。成果总结和经典化的重要方式就是选本，通过选本把优秀作品呈现出来，供人们品读、鉴赏和研究，积时既久，佳作就能脱颖而出，成为经典。

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中华诗词研究院是国家级诗词研究机构，为推动现当代诗词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组织编纂“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丛书，分《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和《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理论卷》，意在总结新中国诗歌的创作实绩和理论成果，为当代诗歌研究提供基础文献。丛书注重导向性、学术性、文学性和史料性，反映了新中国诗歌文化生态的多维景观及其发展历程。编纂观念新颖，体例得宜，分量厚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不懈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各行各业蓬勃发展，成就震古烁今。诗词历来有记录时代的诗史传统和颂美善政良治的“诗通政”传统。当代诗词发扬这两个传统，以文学的方式反映了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和人民的奋斗精神。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中心是当代诗词的重要研究机构，策划编选“新中国诗史”丛书，按照“诗史”观念，以诗词反映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献礼祖国。丛书按行业确定主题，分别成卷，是一套创新性强、特色鲜明、价值独到的当代诗词选本。行业诗词是根据现代社会分工特点确定的诗词类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套按行业编选的诗词选本，在诗词选本中是一个创例。

这两套丛书总结、呈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诗词成就，是规模较大的当代诗词总集，对弘扬新中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砥砺奋进新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有激励作用；对推动当代诗词经典化，撰写当代诗词史，促进中华诗词创新性发展，开创中华诗词新纪元也有积极意义。

时任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副主任莫真宝博士协助主编杨天石先生负责“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丛书项目设计和组织联络工作，他撰写的《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总序《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照》介绍了马凯同志关于中华诗词研究的讲话精神；阐述了编纂丛书的目的意义、遴选原则和内容、丛书特点、当代诗词研究状况等，视野宏阔，见解独到。文中提出“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理论，是诗学界的新观点，改变了当代诗歌往往限于新旧体诗的观念，大大拓展了诗歌视野。尤其是将流行歌曲的歌词纳入，特具卓识。我国古典诗歌本有合乐传统，促进了诗歌传播和诗教、乐教。现当代歌曲的歌词，具有很多思理美、情感美、艺术美，并借助优美的音乐旋律广为传唱，感染力和影响力极大。它们就是现当代乐府诗，将其纳入现当代诗歌研究范围，很有意义。如此整体观照，才能全面、立体、多元地把握新中国诗歌发展历程及其整体风貌，描绘出新中国诗歌的全景图，其成就和价值也才能充分呈现。这一理论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南大学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宋湘绮博士撰写的“新中国诗史”丛书总序“拉开理想之维，促进诗词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就丛书编纂宗旨、当代诗词的价值和研究、当代诗词的发展创新等进行了论述，有学理高度和深度，颇为大气，对当代诗词创作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很有启发。每卷前言概述新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行业诗词的内容、特点和价值，突出创业精神、奋斗精神和科学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展现诗道荣光，蕴含着对新中国的拳拳深情。

两篇总序、两篇前言都是用心结撰的，这里集中刊发，以呈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创新成果。之所以用“新中国诗词成就与旧体诗的现代适应性”为本专题总目，是因为否定现代诗词的人的主要理由就是旧体诗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必然走向灭亡，而这4篇论文都有总结新中国诗词成就的特征，其成就证明了这种看法的错误。特别是行业诗词书写高度现代的科学技术，反映时代精神，有新题材、新事物、新思想、新语言，“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有优秀诗人和佳篇力作，证明旧体诗完全能与现代社会兼容，具备书写现代生活的能力，与时俱进，不断续写中华诗词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诗词被纳入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战略，有力推动诗词繁荣。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诗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作为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理应承担这样的使命。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业中，诗词一定能绽放光华，作出贡献。

（主持人 陈友康教授）

20 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体式的整体观照

——《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总序

莫真宝

摘要：1949 年以来，深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新诗取得诗歌史的“正统”地位，旧体诗不仅退出了文学体制，而且为文学史和诗歌史撰述者所摒弃，但旧体诗的写作并未退出历史舞台。21 世纪，甚至出现论者所称的由“复苏走向复兴”的局面。20 世纪诗歌体式宜包括新诗、创作歌词、古近体诗、词、散曲、民歌民谣六大类，每种类型诗歌体式都可以划分不同类型或不同层级的“亚型”。评价旧体诗的创作成就，叙述当代旧体诗发展史和诗歌发展史，均应将其置于 20 世纪以来诗歌体式整体中，对其文体功能和艺术成就加以审视。《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以前述六种类型的诗歌体裁为标准分类编选诗歌作品，注重导向性、学术性、文学性和史料性，大致反映出 1949 年以来诗歌文化生态的多维景观及其发展历程，初步勾勒出新中国诗歌发展的全面图景，为新中国旧体诗史的书写和诗歌史的全景叙述提供有价值的文本参照。

关键词：新中国诗歌；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诗歌文化生态；诗歌多维景观

中图分类号：G122；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4-0058-06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方面的新文学运动取得巨大成功，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新文体代替旧文体，有力地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版图。传统戏曲、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逐渐为相应的新文学样式所取代。这种现象在诗歌领域的表现要复杂一些。一方面，早期新诗以“白话诗”“自由诗”相号召，将“打倒”包括古近体诗、词、散曲为核心体裁类型在内的“旧诗”列为其诗体革新的首要目标，并且在诗歌传播与诗歌研究领域逐渐赢得了相对优势的地位。这种现象最显著的表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文学机制与高校教学科研机制中，几乎一直由新诗唱着独角戏，同时存在的旧体诗歌几乎完全失去了生存空间，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这一现象，从 2000 年前后起，正在慢慢发生变化，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为标志，有关百年以来创作的旧体诗研究的部分项目得以立项，高校中文系研究生开始把百年旧体诗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可以说，对百年以来旧诗的研究渐渐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但学术界的兴趣依旧基本局限在 1949 年之前。从另一方面来看，与这种诗歌领域的文学管理与研究机制大相径庭的是，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步伐，旧诗写作现象并未消失，而是始终在顽强地持续发展，甚至在表现时代风云与个人情感的过程中，在与新诗及其他相关文体的渗透与交融过程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作者简介：莫真宝，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中心诗词研究部主任，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思想史和现当代诗词。

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旧诗的批判与“打压”，仅限于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层面，在“体制”层面依然被公平对待。国民政府教育部《民国三十年度（1941）申请学术奖励作品审查给奖名单》，文学类只设置、评选出三等奖作品，共四部：邵祖平的《培风楼诗续存》为旧体诗集，卢前的《中兴鼓吹》为词集，陈铨的《野玫瑰》和曹禺的《北京人》为白话剧本。^①《民国三十一年度（1942）申请学术奖励作品审查给奖名单》中，文学类也只设置、评选出三等奖作品，共三部：孙为霖的《巴山樵唱》为散曲小令集，唐玉虬的《国声集》为旧体诗集，王力的《中国语法之理论》为语言学论著。^②新中国成立以来，即使旧诗在某个时段发展有所停滞，但综合来看，这种发展势头也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十七年”间的革命领袖诗词写作与无产阶级革命家及社会名流的诗词写作，“文革”期间的“地下”诗词写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新时期以来，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韵文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的相继成立，诗词创作普及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尤其是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络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旧诗写作更是呈现出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趋势。而“旧诗”这一称谓，也隐隐然呈现出被更中性化的“中华诗词”这一称谓取而代之之势。此外，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百年歌谣的整理与采录、写作，以及创作歌词，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歌谣与歌词不仅斐然可观，而且与其他各体诗歌产生了频繁的互动，有力地促进了诗歌文化生态的发展与繁荣。

2011年9月，中央编办批准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马凯同志在成立大会上发表《努力办好中华诗词研究院》的讲话，指出要把诗词院建成“凝聚诗词人才的重要纽带”“繁荣诗词创作的重要平台”“引领诗词评论的重要窗口”“推动诗词研究的重要阵地”“收集诗词资料的重要文库”，并要求“要把组织研究放在突出位置上”^③。诗词院成立以来，即以组织当代诗词的创作、研究、评鉴和交流作为主要职责，为诗词创作者、研究者和普通诗词爱好者搭建旧体诗词创作与研究的平台，一步一步地推动着旧诗创作与研究活动。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对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曲艺杂技和历史文化纪录片、动画片、出版物等的扶持”。发展诗词被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国家工程。面对仍然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诸种诗歌体裁类型，如何看待新诗的主体地位和旧体诗词的生存处境，自然是见仁见智，各说各有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诗长期居于诗歌的主体地位，是一个必须尊重的事实。在各种文学组织里，“诗歌”一席始终由新诗占驻。在高校教学与研究领域，新诗的主体地位相当稳定，甚至成为各种新中国文学史叙述诗歌发展状况时的不二选择，成为各种新中国诗歌发展史著中“诗歌”的代名词。我们如果抛却各种争论，客观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则不难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这一时期的旧诗作为一个整体，很难在各种新中国文学史或诗歌史中找到它的哪怕模糊的身影。至于其他各种诗歌体式，就更加难以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新诗为叙述对象的“诗歌”家族，难以与新诗并置观察并获得同等叙述了。

马凯同志在讲话中谈到中华诗词研究院的研究内容时说：“研究中华诗词的发展史，既包括古代的，也包括近现代的，特别是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华诗词的发展史；研究中华诗词的音韵学；研究中华诗词与自由体诗、民歌、歌词等其他诗体的比较，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研究中华诗词的

① 二史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356《历届获奖作品及作者题名录》，第31页。转引自沈卫威：《现代学术评审制度的建立——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与学术评奖》，《长江学术》2018年第3期，第35—48页。

② 二史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356《历届获奖作品及作者题名录》，第32页。转引自沈卫威：《现代学术评审制度的建立——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与学术评奖》，《长江学术》2018年第3期，第35—48页。

③ 马凯：《努力办好中华诗词研究院》，《光明日报》2011年10月13日，第4版。

翻译理论和方法;还要研究中华诗词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这段具有指导意义的讲话,已把自由体新诗、民歌、歌谣和“中华诗词”诸种体裁置于同等地位,构建了当代诗歌研究的“生态范围”。事实上,无论是从中国诗歌史作纵向的考察,还是从当代诗歌史作横向的考察,各种体裁诗歌样式历时性产生、共时性存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诗歌文化生态,始终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诗歌存在的真实状态。我们把这种观察视角称为“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

《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正是在新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的观照之下来分类编选的,包括《作品卷(1949—1999)》《作品卷(2000—2018)》两个系列,与《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理论卷(1949—2018)》相辅而行,分别从创作与研究两个维度,勾勒出新中国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轮廓,大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歌文化生态的多维景观及其发展历程。这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新中国诗歌史参考资料,它与《二十世纪中国诗选书系》(包含1949年以前的分体作品选,以及诗歌理论选两个系列)一起^①,初步勾勒了20世纪以来我国诗歌发展的全面图景。

诗歌发展的河流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持续性存在,为什么要以2000年为分界来分别观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诗歌发展状况呢?2000年是新千年的开端,在时间纪元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年,百度成立,网易、搜狐、新浪都在纳斯达克上市,互联网逐渐影响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影响诗歌创作与传播交流的形态。互联网对新世纪诗歌发展起到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次年,即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从此逐步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我们大致以2000年为界,以前50年和最近20年为时间单位考察新中国诗歌,具有详近略远的意味。

这套丛书,以新中国时期的主要诗歌体裁类型为标准分别编选成册,每个系列分为古近体诗、词、散曲、新诗、创作歌词、歌谣等六种。其中,《作品卷(2000—2018)》,以“散文诗”代替“歌谣”,因为这段时间的歌谣不足以成卷,而散文诗的诗歌属性也值得引起文学研究者重视。我们把新中国诗歌按体裁划分为六类,加以分别观察,这是出于约定俗成的经验,同时充分考虑了各类诗歌在体式特征、传播方式、受众群体以及文化属性等领域的相对独立的特点所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每一类型诗歌体裁都可以划分不同类型或不同层级的“亚型”。如古近体诗,既包括古体诗,又包括近体诗,同时古体诗和近体诗又各有其亚型。词文体通常分为小令、中调、长调等。散曲也有小令、套数之分。新诗内部除了有不同流派类型和不同风格类型,长期以来也存在格律体和自由体的分别。20世纪初新诗出现以来,虽然有过“和诗以歌”的尝试,创作歌词也并没有完全拒绝其他类型的诗歌,但事实上,歌词与其他诗歌类型渐行渐远,无论其传唱度还是社会影响力,都是一骑绝尘,迥出于其他诗歌类型之上。近年来,零星地出现过从文化、文学,甚至从诗歌角度对歌词进行研究的成果,但“歌词”与“诗”的关系研究非常薄弱,创作歌词的“诗”的身份和属性,具备巨大的学术想象空间。创作歌词通常以题材功能或音乐类型,分为流行歌曲、社会歌曲、革命歌曲、影视插曲、校园歌曲、艺术歌曲、摇滚歌曲等类型。歌谣,指民歌民谣,既包括长期流传于全国各地,被相关机构搜集整理的民间歌谣,也包括像“信天游”“花儿”等富于地域特色的民歌品类及富于民族特色的歌谣,还包括20世纪5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新民歌运动”期间产生的大量“新民歌”。

^① 《二十世纪中国诗选书系》中的“诗歌理论选”系列,以《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丛书》为名,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21年12月30日发布的《“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

这套丛书，精选各种体裁诗歌作品，编成系列诗选，借助各种主要诗歌体式的“同台演出”，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新中国旧诗的特征，认识其文学特质和艺术价值，以便恰如其分地估量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为填补新中国诗歌史研究空白提供基础性支持。由于缺少学理性研究和有效传播方式的支撑，新中国旧诗尚未从整体上进入新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视野，甚至被个别研究者视为民俗文化现象，而不是文学现象^①，其文学文体的身份被严重遮蔽。这种令人尴尬的处境与当前旧诗创作和活动的热闹现象极不相称。从诗歌作品的文学属性着眼，将新中国古近体诗、词、曲、新诗和各体歌词等量齐观，一并纳入考察视野，有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新中国旧诗的偏见，形成共识，促进各种体裁类型诗歌的全面、健康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充分强调学习经典诗词和散文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体优秀诗歌作品，理应进入“经典”的序列，成为传承和发展优秀诗歌传统的鲜活的文本。

这套丛书，分体编选新中国诗歌总集，不仅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不同诗歌体式的文体特征与适用范围，而且有利于推动新中国各体诗歌文本经典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并出版的新诗集、旧体诗集、词集、散曲集、歌词歌曲集、歌谣集，数量极大，难以统计，但各种别集和选本质量良莠不齐，新诗之外的其他类型诗歌没有得到系统整理，更没有人将并时存在的主要诗歌体式合而观之。因此，近年来围绕诗词发展创新的“诗词普及运动”“群众诗词运动”“声韵改革运动”等主要争论，持论各方均未能充分注意到各种体裁诗歌的文体特征与适用范围的异同，未能充分理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体的产生是民间诗歌样式经由文人采用而“上升”为新的诗歌体裁的历史规律，未能充分理解不同诗歌体裁具有不同适应范围及其抒情、叙事功能的差异，甚至未能尊重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改造传统诗词，并将此种“改造”误为是“创新”。钱大昕说：“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②基于此种现实，亟须以整体宏观视野，呈现各种主要诗歌体式的美学特征及其相互关联与彼此区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代诗词领域缺乏学理性争论的局面的诗歌丛书出现。这套丛书（作品卷）包括以下各分册：

《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1949—1999）》：

《古近体诗》，江合友（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仁生（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

《词》，莫真宝（中华诗词研究院诗词研究部主任）

《散曲》，门岗（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新诗》，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歌词》，袁宗刚（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博士后）

《歌谣》，陈书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等

《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2000—2018）》：

《古近体诗》，陈友康（云南中华文化学院教授）

《词》，赵郁飞（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大勇（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散曲》，南广勋（北京散曲研究会会长）

^① 朱文华：《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2—273页。

^② 钱大昕：《弈喻》，《潜研堂文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本。

《新诗》，李少君（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

《歌词》，杨赛（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后）

《散文诗》，周庆荣（《星星》诗刊之《散文诗》名誉主编）等

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坚持“纵通”与“横通”的学术视野。所谓纵通，是从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的学术理念出发，将中国诗歌继承与创新这个命题，具体落实到文体、思想、题材、艺术风格演变等各个可能的侧面。所谓横通，是从“新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的学术理念着眼，将主要诗歌体裁古近体诗、词、散曲、新诗、歌词、歌谣等各种类型从文体角度“等量齐观”，客观地呈现新中国诗歌创作的整体学术生态，并在此学术理念观照之下，将长期游离在“文学的边缘地带”的“创作歌词”“歌谣”纳入诗歌之列，与新中国古近体诗、词、散曲等体式置于并时存在之语境，探索其文学属性及其在文学中的合适位置。这套丛书，分体选取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结集出版，为新中国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诗歌史提供基础性文本。为此，我们将导向性、学术性、文学性和史料性作为编选原则。

1. 导向性，是指通过对并时存在的各种主要诗歌体式等量齐观，拓展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为改变学术界在研究百年诗歌时片面重视某种或某类诗歌体裁的现状，推动各体诗歌研究的均衡发展提供参考，并借以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恰当的引导。具体而言，无论入选作者还是作品，均须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分析，注重其价值取向；尊重文体特征和文体发展规律，为纠正诗歌界部分有偏差的认识提供原始文本依据。

2. 学术性，是指编选作品时，注重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赋予选本一定的学术内涵。各类诗体的文体特征有各自的核心，也有其边界。同为诗歌体裁，各体诗歌为诗则一，必有其共同之处；既为不同的诗歌体裁，则为体则异，必有与其他体裁不同的内涵与外延。这套丛书注重各种体裁诗歌内部有代表性创作倾向，强调对各种体裁的分辨，突出其核心，注意揭示其边界。

3. 文学性，是指入选作品，以文质兼美为主，不仅能体现百年诗歌发展历程，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百年诗歌创作的艺术水平，所以将文学性作为重要编选原则。相对于新中国诗歌史上的海量作品，优秀文学作品所占比例甚低，能够进入选本的优秀文学作品只是极少数，进入诗歌史视野的为数更少。但古近体诗、词、散曲、新诗、创作歌词和歌谣，均不乏抒情言志、反映时代生活而又富于修辞、意境优美之作。

4. 史料性，是指我们主观上想使这套选本成为研究者进入该领域的“路标”，而并不奢望为研究者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在编选过程中，既注重各种诗歌体裁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性表现，又试图挖掘各体诗歌领域代表性作家、作品及流派，力图通过选本勾勒出具体的现代诗歌史整体版图。

在编辑体例上，《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采取“以诗存人”和“以人存诗”相结合的原则，一般要求入选者既创作出一定数量的作品，有较强的文学性，又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平，并兼顾作者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影响。对于入选作者数量，原则上各卷不作统一规定。新诗不仅是研究最为充分、经典化程度最高的诗歌体式，而且是衡量各体诗歌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最重要的标尺，其代表性诗人与代表性诗作，相对较为清晰。而古近体诗、词、散曲，以及创作歌词，由于研究匮乏，经典诗人与经典作品尚未得到公认，为稳妥起见，由编选者自行掌握。所以，有的编选者在“存人”还是“存诗”上，各有偏重，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在全书编排上，大致采取以人系诗的体例。作者简介部分不追求面面俱到，主要介绍作者生平及其诗歌方面的著述，对创作特色的评述不作统一要求。对参考文献的开列亦不作统一要求。入选作品一般标注出

处，考虑到网络时代文本存在的实际情况，有些作品的出处标注并不完全符合统一的规范。

编辑这套书，主要是想为社会各界全面、立体、多元地把握新中国诗歌发展历程及其整体风貌，提供一个全新的、独特的观察视野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有助于打开新中国诗歌史研究的新视野，打通旧体诗词的各种体裁以及创作歌词、歌谣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描述的通道，也有助于为解决伴随群众性诗歌创作热潮出现之后难以避免的非艺术化倾向和种种针锋相对，甚至互相攻讦的矛盾提供学理性思考的路径。可供诗歌教学者、诗歌研究者参考，也可以供诗歌爱好者阅读。需要说明的是，编选这样的系列诗歌选本，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尝试性和探索性。中华诗词研究院尽管在发凡起例、组织协调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但由于学术界对百年以来古近体诗、词、散曲作品的研究远不充分，对经典诗人诗作尚无法形成共识，其经典化进程尚处于初始阶段。特别是对 2000 年以来涌现出的大量优秀诗人诗作，尚缺乏应有的学理性研究，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披沙拣金，疏漏甚至失误在所难免。这是一切关于“当下”的研究难以避免的“宿命”。此外，创作歌词、歌谣乃至散文诗，始终徘徊在文学的边缘地带，从诗歌属性的角度看待当下的创作歌词、歌谣及散文诗，在一定程度上要具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勇气甚至冒险精神。因而，我们尽量邀请“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学者从事这项具有“冒险性”的学术探索工作，同时通过召开项目论证会、项目开题会、阶段性项目成果审稿会等形式，集思广益，多方汲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建议，并将部分书稿送院外专家审订，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编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和不足。同时，我们也对参与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的学术探索和学术判断予以应有的尊重。鉴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处于刚刚发生的状态或现在进行时态，对它们的艺术价值的鉴别和判断尤难把握。对入选诗人和诗作的多寡或未尽当，或许不能如实体现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入选对象与入选数量也不能完全代表我们对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意见，这本是学术研究中的自然之事，并不因此贬损这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工作的价值。“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①？使用和看待这套丛书时，亦应作如是观。

这套丛书，是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研究部于 2017、2018、2019 年连续承担的财政部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二十/二十一世纪诗词史料整理与研究”年度项目成果。中华诗词研究院杨志新同志，在项目策划、申报、实施以及成果审校、出版方面，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事必躬亲，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完成。感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杨天石先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如一的指导与关怀。项目实施过程中，除了得到参与编选的各位诗家学者的大力襄助，还得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程毅中先生、白少帆先生、赵仁珪先生，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先生，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黄霖先生，中文天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陈骥先生，《中华书画家》杂志社高师之先生等数十位诗家学者的支持，他们在年度项目开题、结题、审稿等各环节贡献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丛书的编选质量。这套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江西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建森，江西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李国强、方姝的大力支持，以及江西美术出版社书法综合编辑部主管朱丽平，和邱婧、梁雨寒等编辑的认真编校。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萧统：《文选序》，《文选》第 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 页。

拉开理想之维，促进诗词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

——“新中国诗史”丛书总序

宋湘绮

摘要：当代“诗词热”中有三点忧思：创作实践热，理论研究冷；古典诗词研究多，当代诗词研究少；诗词鉴赏多，诗词评论少。重视当代诗词研究，回应文化创新的时代命题，需要重视三个问题：一是当代诗词研究的分期分类，需要以“大当代”史观和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来审视；二是当代诗词的研究方法要从认识论走向实践存在论，探寻境界、意境创造与“人”的生命意志、人生、社会、时代的紧密关联。三是强化当代诗词是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代诗词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分内之事的理念。当代诗词研究要从现代诗词美学奠基人王国维徘徊处“再出发”。王国维境界说揭示了意境创造具有现实根基和理想之维。要进一步辨析意境和境界的区别和联系，揭示创造意境、境界的动力在于欲望—理性的动态生命机制，这种机制取决于“人”的实践存在状态，找到诗词创新的本原。要把握虚实相生的动态关系，通过精神生产促进物质生产，二者相互作用，能有效促进诗词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要从美学和历史的角建立“为进步而艺术”的诗词价值观，增强诗词创作的当代性和社会功能。

关键词：当代诗词；实践存在论；境界创造机制；当代诗词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122；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4-0064-09

中国是诗国，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维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中国文化在万有相通、互为象征的意象体系里繁衍生息，先民们把万事万物看成和自己一样有生命，发展出“比”“兴”传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气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写诗填词是中国人独有的艺术方式和审美生活方式，诗词被外国人称为中国诗形，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诗词是扶持重点。诗词传承与发展关系到中国文学命脉，关系到文化创新，关系到民族精神家园。千秋万代中国人的精神体验都在诗中，“只愿君心似我心”的祈祷、“执手相看泪眼”的深情、“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坎坷、“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难忘的人生瞬间在诗中成为永恒。春花秋月，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一叶扁舟，一行白鹭，江上青峰……含蓄蕴藉的意象中寄托着无限希望和理想。“一切景语皆情语”，肺腑之句来之不易。无论是惊涛拍岸，还是小桥流水，每首诗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瞬间。历史风云、家国情怀，从“小我”

作者简介：宋湘绮，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当代诗词研究》主编，上海大学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审美文化学。

“大我”，到“无我”，诗人们前赴后继、上下求索，这些“慢镜头”构成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一、《新中国诗史》通过诗词艺术形式展示新中国相关行业发展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诗史”一词最早由孟棻在《本事诗·高逸》中提出。“本事”一词与历史密切相关，《汉书·艺文志》载：“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①左丘明在口授《春秋》时，担心弟子“空言说经”，强调《春秋》原本的事实，撰写《左传》，将事实记录下来。可见，所谓的“本事诗”就是介绍诗歌产生时的事实。孟棻赞赏杜甫写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认为杜诗“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这是文学史上第一首被称为“诗史”的诗歌。^②诗人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载：“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世号‘诗史’。”“善陈时事”有两层含义：一是所写为当时的重大事件或与重大事件有关；二是指作品能以小见大，思想深刻，揭示的是内在必然性、规律性、普遍性，具有诗性。什么是诗性？诗性得从人性来分析，“人”总是在现实性中向往着可能性，向往着更理想的生活，人的二重性是人性重要内涵之一。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诗性是“人”突破有限，向往无限可能性的超越性本能，每个人都渴望“诗与远方”。诗意就是这种超越有限生命，所引发的无限宇宙、历史和人生感怀。孟棻认识到“触事兴咏，尤所钟情”^③，“情动于衷”离不开外在的具体事件，提出“诗史”之说，并将“诗史”置于《春秋》义理和抒情传统的论述框架之中，深远影响了唐以后“诗史”理论的发展。

新中国（1949—2019）七十年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一簇美的浪花，尤其是航空航天、冶金、交通、医学、教育等领域，日新月异，成就斐然。激情岁月点燃创作灵感，涌现出一批优秀诗词作品。“新中国诗史”丛书通过诗词艺术形式展示新中国航空航天、冶金、交通、医学、教育等行业的发展史。我们编撰“新中国诗史”丛书，一是希望以诗存史，铭记新中国奠基者，不忘初心。二是倡导守正开新，“为进步而艺术”，通过选优、推优培育高格诗词作品，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本丛书选择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发展突出的领域，以诗词艺术形式展现该领域的发展变化，重在题材内容的时代性和表现形式的艺术性，拟分为：

《新中国诗史（1949—2019）——航空航天卷》

《新中国诗史（1949—2019）——冶金卷》

《新中国诗史（1949—2019）——交通卷》

《新中国诗史（1949—2019）——医学卷》

《新中国诗史（1949—2019）——教育卷》

二、新中国诗词的生存状况和价值取向

诗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边缘化，到21世纪复苏，“新中国诗史”也是“新中国诗词史”的剪影。从1909年成立的南社、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成立的怀安诗社到21世纪蔚为壮观的网络诗词，从《抗战诗史》《天安门诗抄》到新世纪“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展现了中国民族诗形强大的生命力。百年沧桑，诗词从未远离我们。诗词的微茫之光一直在闪烁，在历史紧

^①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页。

^② 孟棻：《本事诗》，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1页。

^③ 孟棻：《本事诗》，第3页。

要关头格外明亮,为创造理想生活提供了精神灯塔。这也是诗词五四后虽然边缘化,但一直默默存在的文化根源。

2012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由中华书局发起,联合中国出版集团、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书局、中华诗词学会共同主办的“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短信参与总量达1.29亿人次。诗意栖居、人生诗化是最艺术化的民生,是最美的中国梦。诗心是原生之心、本能之心、创造之心,也是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最向往的回归之心。2014年5月20日,中宣部《党建》杂志社、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中国楹联学会、中华诗词学会联合发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把楹联写在党旗下”“诗词飞扬党旗飘”征稿活动,收到作品2.5万多首。2019年“诗词中国”大赛共收到当代人投稿的原创诗词作品41余万首,诗人自主存档作品23万余首,总计存档当代原创诗词作品60余万首。大赛投稿参与者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超过4.6万位诗人入驻“诗词中国”的线上“诗人档案”库。

五四后旧体文学被边缘化,新、旧文学分化成两个阵营。诗、词、曲等旧体文学样式在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中空地带”流浪百年,世纪之交新、旧对立的僵局开始被打破。在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召开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旧体诗歌的创作和研究者人数占比上升,达到四分之一。2020年8月《中华辞赋》归口《诗刊》社,标志着新世纪诗体多元并存的局面已形成。《中华诗词》《当代诗词》《诗词报》《长白山诗词》《岷峨诗稿》《心潮诗词》《东坡赤壁诗词》等全国公开发行的诗词类刊物,也已形成相当规模的期刊方阵。《诗铎》《诗词学》《诗词界》《诗国》《九州诗词》《中华诗词研究》《当代诗词研究》等辑刊类刊物,开始对当代诗词展开学理性研究。以内部准印证的方式印行的全国各省区市诗词刊物据初步统计达三千种之多。因为大众的积极参与,诗词领域集中显现出文化转型的困境,亟待文学批评关注。其中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创作实践热,理论研究冷;二是古典诗词研究多,当代诗词研究少;三是诗词鉴赏多,诗词文学批评少。

为此,2014年中南大学与隶属国务院参事室的中华诗词研究院发起、召开首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召集全国关注诗词传承与创新的青年学者共同聚焦当代诗词创作现场,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2017年在《光明日报》《诗刊》《文学评论》、中华诗词研究院、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社科联的支持下,诞生了全国第一个立足当代文学的当代诗词研究平台——“中南大学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中心”。我们提倡批评理论化和理论批评化,从诗词鉴赏止步的地方,继续诗词文学批评;打破新诗旧诗对峙的局面,秉持“大诗歌”观;打破古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界限,以“跨学科”的视野,促进当代诗词创作、批评和理论的共生互动,孵育精品。有学者评价当代诗词:“抒写旧内容、旧思想易工;抒写新内容、新思想难好。”这个“新内容、新思想”主要是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替代农业文明后,人类生活的大转型。今天,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巨变。诗人是时代的良心,其只有潜入生活的细部和骨缝,体味每一丝欣慰喜悦,感受每一声心灵呼唤,心疼每一个生命创伤,才能写好“新内容、新思想”。

诗词回归当代文学的脚步坚实而有力,一步一个脚印。1987年5月中华诗词学会成立,随后诗词协会、诗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积极开展各种诗词活动。2010年9月中央文史馆中华诗词研究院成立,2017年12月“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中心”在中南大学诞生,2019年5月“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在上海大学启动。2019年10月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指出“中华诗词和新诗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要互补与共建”,这是中国诗歌的“喜事”。诗人是“人类的喉舌”,新、旧是诗形演进的脚步,诗性、诗意、诗味才是诗歌永恒的追求。从民间诗词

组织到国务院直属单位成立专门的诗词研究机构，从诗词爱好者自发创作到教育部门、作协行动起来，五四后边缘化的诗词艺术正在回归健康的发展轨道。入选《新中国诗史》的作品，正是产生在这样一个古今演变、文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诗词生存语境和诗词文学价值观正在发生现代转型。明确价值取向，建立当代诗词选优、推优标准和平台十分必要。从新中国海量诗词作品中选优、推优是一件关乎诗词文学价值观、诗词传播和入史的大事，也是难事。再难的事，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解决。文学界曾就“20世纪诗词入史”问题争议了20年，最终24本教材以“行动”把诗词写入文学史。当代诗词选优也是如此，面对海量的作品，只有先集思广益，确立选编“眼光”，拿出经得起检验的作品。学术界、文学界、诗词界才能“有的放矢”，在诗词创作与批评的有效互动中，迈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我们决定编纂“新中国诗史”丛书，邀请中央文史馆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光明日报》社、《诗刊》社、《文学评论》编辑部、湖南省委宣传部等20位专家成立编委会，提出选编标准和编写思路，确定选编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①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要有审美特性，同时“伟大的历史感”也十分重要。恩格斯曾提出美学和历史统一的批评原则：“我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致斐·拉萨尔》）雨果也曾说，为艺术而艺术固然好，更好的是为进步而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诗词的“无用之大用”，给岁月增加文明。这是当代诗词创作应有的价值导向，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三、创造高格，促进诗词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

回首新中国诗词的发展历程，可谓一路艰辛一路歌。无论是“20世纪诗词入史”的微弱呼声，还是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首次颁发给古体诗词作品引发的巨大争议，抑或是2019年“诗词中国”征集当代原创诗词41万首，都以事实表明诗词创作正顺势返回当代文学现场。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诗歌形式创造史，多元并存既是历史事实，也是未来趋势。当前，“诗词热”持续升温，既有当代优秀诗词大量涌现，也有古典诗词的纷纷登场，现代学科体制下，谁来关注当代诗词的发展与创新？当代诗词属于古代文学吗？在2018年8月召开的“中国词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2018·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王兆鹏指出：“大多数学者对当下词创作不关心、不参与。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当代词体创作日益活跃，但词体批评文章大多是非专业人士所为，一味的表彰颂美，很少有学理性的批评与方向性的引导。应该自觉地把研究视野延展到当代，参与当下诗词文学的建设与批评，提出具有学理深度和时代高度的创作主张与批评标准，确立我们这个时代学者的理论地位。”^②这个问题在2019年11月下旬中南大学举办的“两岸经典吟诵传播暨当代诗词创作”高峰论坛上再度引发与会者的关注和热议。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诗词研究是新的学科生长点。目前，其为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忽视，而当代文学研究者尚未注意。经过培育，“中空地带”有望成为文学、文化创新的前沿阵地。持之以恒把它做大做强，当代诗词才能健康发展，希望学界正视现当代诗词的成就。已有学者开始研究现代文学名家

^①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② 王兆鹏：《2018无锡·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2018年8月24日，<https://mp.weixin.qq.com/s/jUJOyjLrR8vbSH9s5UYr6w>。

的诗词作品,但当代诗词依然是盲区。当代诗词创作劲健勃兴,研究薄弱的短板却未得到弥补,这是承前启后的关键。21世纪以来,诗词创作在原有基础上水平提高,数量巨大,优秀诗人和作品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果我们秉持客观公允的诗歌观和审美观,直接面对文本,就会发现当代诗词创作的激情和成就值得尊敬,也值得研究。

翻开历史会发现,今天的现实曾经都是昨天诗中的梦想,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把梦想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历史。“可能性”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是“潜在的现实性”,符合发展规律,人们创造条件可以实现它。这个“可能性”与境界有关,境界是世界的灯塔。王国维境界说已触及这个问题,但尚未阐述意境和境界的区别和联系。百年前,王国维借鉴叔本华哲学,把意境中的“意”理解成“欲”,提出“意即欲”。此“欲”不是七情六欲的“欲”,而是叔本华“生命意志论”意义上的“欲”,是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意即欲”将诗的境界与生命意志、人生、社会、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挖掘到意境的本原,拓展了中国文论对意境的阐释。王国维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①“合乎自然,邻于理想”揭示了境界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根基和理想之维,“邻于”二字生动刻画了境界逼近理想的进行时态,凸显了境界的理想性和生成性。意境是诗人用意象塑造艺术形象的境界,是作品的艺术效果、氛围,“意境”保留了诗人创造作品这一瞬间的人生“境界”;境界既有疆界、界限的意思,也有层次、高低的意思;境界和意境的含义有一定的重叠,正是这种重叠导致人们混用这两个概念;意境和境界的关系,是诗人持续精进过程中精神足迹和精神历程的关系。诗是人性密码,诗人的“现实自我”和诗中的“理想自我”分别隐喻现实人性和理想人性。境界是诗人“理想自我”(艺术形象)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张力,通过诗歌意境显现而照亮世界。诗人的生存状态,决定诗中“理想自我”的生存状态。诗歌“高峰”的诞生,一定关系着诗人“理想自我”的精神标高。日新月异的时代激发诗人的创造热情和冲动,产生了诗词的“高原”。“高峰”需要诗人持之以恒,以自我经验触发集体共鸣,将创造进行到底。当前诗词“有高原,缺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诗人忽视了境界的生成性和理想性,忽视境界的生成贯穿于“人生在世”全过程。王国维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②“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探索的就是高原和高峰的问题,意境还有深浅之别,境界使然。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只有区分意境和境界,才能从境界着手,回到生命意志这些本原性问题上,提升诗中意境,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飞跃。

抒情言志关乎生命意志。毛泽东说,意志就是指人的精神欲求的能力,首先也就是指人对于变化所怀抱的积极态度。^③生命意志是实践的动因,实践就是运动,运动就是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博弈。这些力量中最突出的是欲望和理性,这是人性的生命机制,这个运动也构成人生、社会发展的动力。诗词创作是欲望和理性较量的过程,继续探索叔本华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欲望和理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意即欲,欲即理”。欲,就是要还是不要;理,就是能要,还是不能要。创造意境的动力在于欲望—理性的动态生命机制,取决于“人”的实践存在状态,这是诗词创新的本原。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②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178页。

③ 韩毓海:《重读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把握意境和境界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精神生产促进物质生产，二者相互作用，才能促进诗词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高原、高峰”关乎每个诗人的境界，是生成的，创造的，是动态的时代画卷。诗词活动是创造理想人性、理想人生、理想社会的审美实践，王国维境界说、马克思实践观把诗与人的实践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进入生命动态，不仅找到诗词传承与发展的活水源头，也找到诗词作为精神生产推动历史进步的着力点。

四、重视当代诗词研究，回应文化创新的时代命题

当代诗词研究事关诗词发展的未来，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和文化创新的高地，也是当代文学正在隆起的新的学科生长点。扶持这一新的学科生长点需要重视三个问题：

第一，当代诗词研究的分期分类，需要以“大当代”史观和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来审视。“当代性”是当代诗词有别于传统诗词的“时代性”，合理进行分期分类才能发现“时代性”。施议对指出，大陆学界将中国1840年以来的文学界定为三个阶段，即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依据历史上三大政治事件——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此三个阶段的界定和划分实际上并无文学依据，是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严重失误^①。他说：“分期与分类，就是陆机《文赋》中所说的操斧伐柯。所谓作文之难，难在达意，关键是操斧者，能否依循一定的法则，以曲尽其妙。法则，就是斧头柄，也就是砍伐的准则。”^②因此，他30年前编撰《当代词综》时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率先提出的“大当代”诗词史观。一般意义上的“当代”，自1949年起；《当代词综》之所谓“当代”，自1862年（清同治元年）起。一般意义上的“当代”只表示时间，《当代词综》之所谓“当代”，除了时间问题，还有人和事的问题，因为《当代词综》之所谓“当代”指的是出生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之后作者所处的当代社会。其起始之年乃作者的生年，在这之后的作者，绝大多数都在一般意义上所谓当代社会中生活，其创作活动及文学建树均属于今天。《当代词综》的“大当代”史观史识，正是为突出“今天”，体现时代精神。这一立足文学活动，关注诗词时代精神的“大当代”史观史识，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现行学科体制下近代、现代、当代，这一百多年恰好是诗词边缘化、复苏、演进的重要历史瞬间。不少学者局限于某一历史瞬间，各自为政，但很难把握诗词艺术发展的整体态势。文学是文化河流中的水滴，在古今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大当代”史观史识凸显了宏观视野和诗词文学本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大当代”是当代诗词研究分期，分类上要立足诗词，而不拘泥于诗词。诗词是中国民族诗形演进的典型艺术样式，虽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以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才能发现其共性和个性所在。关照到中国古典诗歌体式的演进瞬间和全过程，重视其当代样貌，多元并存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是其现实状态和未来趋势。

第二，当代诗词的研究方法，需要从认识论转向实践存在论，与时俱进。传统诗词研究多将“文本”作为认识对象，多是认识论研究。历代诗话词话从根本上说都是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诗词发展面貌的显现，“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受当时的认识水平的局限。这意味着历代诗词理论所达到的客观真理性和知识的完整性都是相对的，有待后人随着社会和诗词的发展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传统诗词鉴赏中，缺乏清晰的诗词文学批评这一环节，况且诗词艺术本身是不断变化和成长的。认识论研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一是以二元对立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解释丰富的审美现象，必然造成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路。二是把审美的主客体从生成之

^① 施议对：《濠上偶语——施议对学术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3页。

^② 施议对：《濠上偶语——施议对学术随笔》，第253页。

流中“剥离”，切断了审美活动所处的人与世界的具体审美关系，切断了审美活动与人的实践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代认识论美学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新实践论美学、生活美学、生命美学……由此，带来了“主客一体、生成论、关系优先”等一系列研究理念。诗词研究的观念、方法和对象都在变化，把握这个发展趋势尤为艰难。如何立足当代文学，在“大当代”“整体观”的视野下，延续诗词文脉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大事。近年，罗宗强、蒋寅、康保成、戴伟华等知名学者发表重量级文章，引起了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反思热”。其中，肖鹰《意与境浑：意境论的百年演变与反思》（《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和施议对《立足文本走出误区——新世纪词学研究之我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指出学界对王国维境界说认识论研究的局限，呼吁“21世纪的中国诗学乃至中国美学研究，有一个从王国维再出发的必要课题”。比如，大量论文在追究“什么是境界”，忽视了境界、意境创造与“人”的实践存在之关联。从认识论走向实践存在论是弥补这一缺失的理论武器。诗词的实践存在论研究有三大转变：一是圆融的“一体观”，即从传统诗词研究“感性—理性”“主体——客体”二分的思路，变成“人——世界”“实践——存在”主客一体的整体观。二是动态的“生成观”，即“人”在诗词创作与接受中相互建构，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三是优先的“关系观”，即传统诗词认识论研究强调文与道和技法研究，遮蔽了人的实践存在之维，打通“诗与人”的关系，以“接地气”，把创造诗词的精神生产与创造新时代的物质生产关联起来，才能守护好民族家园。

第三，当代诗词的学科归属，应该是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按目前学科划分，当代人创作的旧体诗词与新诗同为当代诗歌的不同艺术样式，同属于当代文学。诗词艺术精神可以简练表述为“艺术精神=情意+符号一（艺术形象）+符号二（艺术形式原则）”。决定诗词艺术精神的三要素：一是情意，即诗词的生存语境——时代精神的变化，导致人的情意变化。二是艺术形象，即艺术形象随着情意变化而千变万化。三是形式原则，即诗词格律规范虽然相对稳定，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诗、词、曲演变的足迹，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诗歌发展史也是一部诗歌形式的创新史，诗庄、词媚、曲俗的说法都与其时代精神相关。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也是文化创新的前沿阵地。这里是出理论、出思想、出“诗史”的地方，把握诗词发展趋势，引导诗词参与文化创新，是当代文学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诗词研究事关文化创新这一历史使命，不仅要梳理、挖掘古典诗词的文学存量，而且要创造当代诗词理论发展的学术增量。前者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心，后者是作为当代文学组成部分的当代诗词研究的重心。当代诗词研究面临三大难题：第一，跨学科难。“大当代”诗词史观涉及近代、现代、当代文学，诗词艺术演进还牵涉哲学、诗学、词学、美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需要“打通”学科壁垒，全方位综合研究。第二，文献梳理难。五四以降，旧体诗词研究一直被忽视。“大当代”视野包含近代、当代、现代，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作品纷繁复杂，视角多元，入手不易。第三，建构文学价值观难。以当代诗词境界来构建诗词文学价值观面临众多思想观念阻力，需要守正开新。这三方面，既是当代诗词研究的难点，也是重点，需要更多有识之士关注这个薄弱环节。

孟棻认识到“触事兴咏，尤所钟情”，“情动于中”离不开外在的具体事件，才提出“诗史”之说。家国情怀是历代诗词的重心，“诗史”之所以备受推崇，因为触及“诗与情、诗与人、诗与事、诗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触及自我、自然与自由这个人文的终极问题。诗见证了人类自我探索的过程，人为什么写诗？《尚书·尧典》说“诗言志”^①，陆机《文赋》说“诗缘情”^②，孔

① 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页。

② 陆机：《陆士衡文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颖达《毛诗正义》说“诗缘政”^①。“志”“情”“政”都关乎“人”的“实践存在”。写诗本质上是一种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建构活动，行吟传统中“行和吟”不可分。“行”是物质生产，“吟”是关乎意义、价值、梦想的精神生产。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是实践的一部分，与物质生产有深刻的关联。二者共同生成人的“实践存在”。“人”不是“现成”的，是在“实践”中“存在”起来的。中国人在“行吟”中创造理想自我，在“行吟”中创造了五千年文明。“行吟”使身处其中的“人”在自我认识中创造了精神层次，即境界。境界中蕴含着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词格律规定的平仄、韵脚构成的节奏自然而然合着生命的律动，当自然物象和人的情绪、心象发生感应，就诞生了诗词意象，春江花月夜里，萌动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抒情言志作为自我认识的精神生产，在推动历史发展中有三重意义：

一是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认清“我从哪里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在情景交融的瞬间，意识到人与自然同根同源，万有相通，万物与我为一。

二是发现人的主观能动性，认清“我是谁”。在诗人笔下，自然物象变成美的意象，烟火人间变得诗情画意。这种由物及心、将心比心、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联想，就是诗性思维。诗性思维突破现实局限，发现更多美好可能性，在诗中建构理想自我、理想社会和理想世界，绘制美好蓝图，凸显“人”的伟大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仅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

三是探索人与世界何去何从，认清“我往哪里去”。诗人们“心思浩渺连广宇”，才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悲悯和超越，通过自我——自然——自由的精神探索，有限生命在皈依自然的瞬间，获得无限的精神慰藉，由此搭建了民族的精神家园。

我们梳理现实与理想、诗词意境与境界、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个体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关系，正是为了把握历史发展和诗词艺术发展的规律，提高觉悟，创造诗意生活。境界的生成性和理想性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生产”观异曲同工，诗词这样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有相同的深层结构，精神生产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和开放性，诗词精神生产的特性使它能够创造“物质生产”的整体结构。小到人生梦，大到中国梦，都离不开“精神生产”这一步。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相互作用，诗的理想之维，引领诗人和读者突破现实局限，从的生存的实然走向人的应然、自然状态。马克思认为“现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是具有历史性、整体性、开放性和过程性存在。

马克思的现实观，对我们重新把握诗词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促使我们把诗词这个“精神生产”的问题，提升到和“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层面，并且贯穿到个体的“人生在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将个体完善、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理想社会的建构系统关联起来，为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精神力量。

当前正处于价值转型期，诗词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人性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都在变化，何为新时代的高格？这是文化创新的时代命题。有两条路径有助于我们提高境界，创造高格：

第一，突破现实局限，创造“境外之境”。诗词不是叙述事情怎样发生的，而是向人们描述事情怎样更好地发生，优秀的诗人要想出常人想不到的好。简言之，诗歌与现实关系，不是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而是要从现实局限出发，拉开诗的理想之维，引领现实向更理想的状态发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自然中之物，相互关系，相互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写之于文学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

^① 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①“遗其关系”“限制处”就是一种突破现实局限、创造境界的方法。“材料必求之于自然”、构造“必从自然之法则”，都是言说“创造境界”的材料和原则。从境内材料和法则出发，虚构出境外的“理想”，这不仅给出了诗歌的目标，还给出了实现目标的方法。通过诗人的想象和创造，从“境内”走向“境外”，需要突破现实的局限。这一创造过程需要诗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创造“境外之境”，才能激发出超越有限生命的宇宙感、历史感、人生感，勇往直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凸显文艺“从高原到高峰”这个时代命题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所说的“让梦想照进现实，让行动成就未来”^②的伟大历史意义。梦想是梦境中才能实现的理想，意味着创造更美好可能性，弥补现实局限。境界正是打破、超越世界局限的美好梦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对功利现实的突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超越。突破现实局限，以境界影响世界，为进步而艺术是当代诗词的使命。

第二，人在“事”上磨，从“自我”走向“人类喉舌”。“人类喉舌”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是千千万万人的事。王阳明说：“人在事上磨，方可立得住。”诗的意义、价值、梦想都诞生在诗人做“事情”的过程中。“事”中有“情”，有“生命意志”，有“欲”。“事情”关乎实践、关乎意境之“意”。王国维境界说提出的“合乎自然，邻于理想”的两个维度，要求诗歌不仅关注人的一般本性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写出符合人的生存发展的理想性。“合乎自然”，即合乎“人性的本然”；“邻于理想”，即靠近“理想人性、理想人生、理想社会”。只有契合这两个维度，才能写出“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诗人不是一劳永逸的“职业”，“邻于理想”就要求诗人永远“在路上”，永远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诗词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之一，我们不仅通过诗歌认识自我的性情，创造更美的人性；同时，在诗歌的创作、传播、接受实践中，与他人、社会、世界相互建构，推动历史发展。“境界”以“精神生产”的力量，通过“物质生产”，间接影响“世界”；“世界”又为“境界”提供鲜活的实践沃土。如此前赴后继，推动人们攀登在“世界—境界”的金字塔上。“精神生产”不能直接改变物质世界，只有通过改变现实社会关系，才能解决现实问题。诗人在人生实践中，体味酸甜苦辣，体会人间冷暖，使“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相互作用，将境界创造进行到底。

“新中国诗史”是经典的摇篮，本丛书从题材角度，展示诗词的现代价值，探讨当代诗词的写法，以期人们更好地用诗词这种传统艺术形式来表现今天的生活。回归行吟传统，走向诗意人生，这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诗词传统中有民族心魂的种子，当代诗人守正开新，将发现种子更多的可能性。唐诗宋词这样的“高峰”是一群伟大的诗人前赴后继，所创造的时代标高。诗意是最美的创意，诗人是伟大的创意人，当代诗人的使命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当代性”，加强诗词文学批评、选优、推优正是为了创造中华诗词的“当代性”，创造属于新中国的文学审美增量。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27页。

书写新中国教育辉煌 展现当代诗词华彩

——《新中国诗史·教育卷》前言

陈友康

摘要：当代诗词书写教育的蔚为大观、内容丰富、感情充沛、思理深至、艺术出色，为新中国教育和中华诗词增添光彩。当代教育诗有四方面内容：一是反映新中国教育发展历程，颂美新中国教育事业辉煌成就；二是表达教育思想，揭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规律、教育发展规律；三是书写教育之崇高和美好，彰显作育人材之美、学术创造之美、师生和同学感情之美、校园生活之美；四是歌咏教师风范，表彰教师的人格光辉、责任担当和教育科研业绩。艺术特点亦有四：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作者多元，风格多样；诗词美学体现唐音宋调两种范型；传统与现代交织。当代教育诗有教育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教育诗对认识新中国教育发展史、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教育工作有意义，对认识当代中华诗词史、促进诗词创作繁荣也有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教育；当代教育诗词；思想光华；艺术风采；功能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4-0073-16

“新中国诗史”丛书编选的宗旨是通过诗词反映新中国某些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并借以管窥当代诗词的业绩，《教育卷》本此宗旨选诗，以写教育题材、反映教育问题的诗词作品为对象，涉及的内容有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内容、教育人物、教育事件、教育精神、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教材建设、教育国际交流、学生学习、校园景观、校园生活、教育公益等，我们把这类诗统称教育诗。

教育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关系千家万户，而教师是现当代诗词创作最重要的群体之一，高校是当代诗词活动最重要的场域之一，故当代诗词书写教育的蔚为大观，加以总结、遴选、呈现，对认识新中国教育发展史、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教育工作有意义，对认识当代中华诗词史、促进诗词创作繁荣也有意义。

一、当代教育诗的思想光华

本书入选诗词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反映新中国教育发展历程，颂美新中国教育事业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政府把教育作为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教育工作者勤勉敬业，不懈奋斗，各界鼎力支持，“华夏同心育春兰”（郭道晖《清华希望

作者简介：陈友康，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和云南文化。

小学》),教育事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成就。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①

教育诗立新意,咏新事,创新格,铸新词,记录新中国教育发展的足迹,书写各个时期的教育指导思想、方针政策、重点工作、重要人物和事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情况。教育诗反映了新中国教育取得的伟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构建起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全面发展,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受教育人群。与之相应,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如义务教育制度、高考制度、学位制度、成人教育制度、民办教育制度、自学考试制度、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奖助学制度等。并且通过教育立法保障教育,制定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教师法》《学位法》等。这些方面,诗词都有程度不同的书写。

本书诗词作者高校教师比重最大,写高等教育的诗词也最多。新中国高等教育成就卓著。1949年,全国只有高校205所,在校生仅11.7万人。2019年,全国高校达到2956所,其中本科院校1265所,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002万人。^②1999年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5%,还处于精英教育阶段;2002年超过15%,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达到51.6%,进入普及化阶段,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③高校种类多,有综合、师范、理工、农林、医药、政法、财经、艺术、民族等类型。学科和专业齐全,办学层次涵盖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能够满足社会对各专业类型和各层次人才的需求。

高校覆盖全国所有省区市,从来没有高校的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开天辟地建立了大学。吴成斌《西藏大学》说“自古农奴远杏坛”,西藏大学的建立,开创西藏教育新纪元。民族院校是富于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保障了民族同胞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其毕业生则成为建设边疆、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骨干力量,“邦国得英才,民族增厚福”(王沂暖《西北民族学院四十周年校庆致祝》)。秦中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陈友康《云南民族大学建校65周年志庆》、李东宾《沁园春·内蒙古大学60华诞感赋》、幻戎《贺新郎·送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都突出了民族大学在建设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民族院校从建立到壮大,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高考制度是国家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高考是国家抡才大典,它为青年公平公正地进入大学提供了制度保障。高考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废除,1977年,在邓小平强力推动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高考,全国约570万考生参加考试,其中27.3万人被录取。^④恢复高考,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影响国运,是当代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诗人们由衷歌唱。苏步青《赴京》记载了1977年8月出席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的喜悦心情,正是这次会议作出恢复高考的历史性决策。陈绪华《忆1977年高考》说:“高考重开四十年,神州广拔众英贤。迎来怒放千花日,结束齐暗万马天。瓦釜无由鸣学府,黄钟有路震文渊。今朝细说当年事,邓老功劳最占先。”齐人杰《历史车轮永向前——纪念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说:“历史车

① 陈宝生:《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成就与现实使命》,《人民日报》2019年9月10日,第13版。

② 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基本情况》,2020年8月31日,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008/t20200831_483697.html, 2024年11月20日。

③ 陈志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成就显著》,《中国教育报》2023年6月21日,第1版。

④ 本书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第133页。

轮永向前。邓公妙笔铸雄篇。人才匮乏当机断，国运艰危勦力旋。枯木朽株逢化雨，明山秀水唱春鹃。吾侪得沐天恩厚，情满金樽敬大贤。”尚永亮《读书忆往杂感六首》说：“从此登高抬望眼，书山一奋自由身。”写出了高考制度恢复所具有的旋乾转坤的重大意义，由衷赞美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孙德荣《忆接录取通知书》写出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轰动乡里的情形和成为大学生的狂喜，这是当时所有被录取学生的共同经历和体验，典型性很强。1977级及以后几级的大学生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格外刻苦，英杰辈出，“花团锦簇耀坤乾”（齐人杰《历史车轮永向前》），成为“一代天骄”（曾曙明《八声甘州·纪念七七年高考四十年》）。

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逐步完善，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建立。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研究生教育起步，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始招收研究生，“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1980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迅速走上正轨。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首次开会评审学位授予单位和专业、审批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这是我国研究生和学位教育史上开基创业之举。各学科的一批顶级学者被聘为评议专家参加评议。苏步青《赴京参加学科评议会》、钟敬文《京西宾馆杂咏》记载了他们参加评议的情况，高度评价研究生教育及学科评议“共为中华图振兴”的重大意义，呈现培养单位你追我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动人景象：“神州一派骋驰声”。韩国磐《临江仙·至南京参加制订硕士生培养规划》反映1980年代初研究生教育刚恢复时“群贤毕聚”、郑重其事制订研究生培养计划。吴硕贤《重进清华深造感怀》为“文化大革命”后首批研究生考入清华深造而狂喜，称美“决策英明崇知识，中兴教育补亡羊”。刘扬忠《1978年夏赴京参加研究生复试述怀》亦然。这个时期的研究生大多成为各学科承前启后的学术骨干和著名专家，缓解了十年动乱造成的高层次人才荒。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硕士、博士培养国。2019年，全国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828个，在学博士生42.4万人，在学硕士生244万人。^①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研究生院也登上历史舞台。唐圭璋《减字木兰花·祝南京大学研究生院成立》、程良峻《庆贺华工大研究生院成立十周年》、邓绍基《恭贺研究生院建院二十周年》、刘叔新《庆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成立十周年》、郑欣淼《行香子·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成立三十周年》等，留下了研究生院成长的轨迹。

成人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函授大学、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自学考试等。新中国成人教育从1951年开始举办，十年动乱中停办。动乱导致大量青年不能上大学，国家建设又亟须专业人才，为解决此问题，高考恢复后，成人教育相继恢复。1980年9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推动成人教育蓬勃发展，与全日制高等教育形成有效补充，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专业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也满足了成人自身发展需求，“向学何须立雪门，面教函授得同尊”（张震泽《祝函授大学开学》）。匡扶《赠夜大语文班同学》、何敏求《勖沈韡侄录取电大》、杨应彬《题广东业余大学》、陈飞之《金缕曲·致自学青年》、刘梦芙《庆春泽·安徽师大本科面授》等，描写了成人教育的意义和学生勤奋学习的精神。

特殊教育主要是对残疾人的教育。特殊教育的施行，体现了新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和普惠性。2019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192所，特殊教育在校生79.5万人。^②郭沫若《念奴娇·参观北京市聋哑治疗语言培训班》反映建国初特殊教育取得的成效。李锐《祝黄乃师兄七秩大寿》写

① 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基本情况》，2020年8月31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008/t20200831_483697.html，2024年11月20日。

② 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基本情况》，2020年8月31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008/t20200831_483697.html，2024年11月20日。

“中国盲文之父”黄乃研制盲文的成就及其对盲人教育的贡献。唐尚诚《再临盲校》表达“丹心一片育盲聋”的深情。张君宽《沁园春·赞盲人作家郑荣臣》写盲人自强不息精神和创造的奇迹。

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我国当代民办教育从1980年代起步,其后就与公办教育携手并进。到201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9.2万所,在校生5616.6万人;民办高等学校757所,在校生708.8万人,占全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23.4%。^①黄寿祺《游黄河大学》、周长源《庆祝东方学院开学》、邓辉《赠别肥东民办教育诸同仁》、姚泉名《个体工商户学校》等留下了民办教育发展的足印。

第二,培养了大量人才,成为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才培养是教育最基本的职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和科研院所培养的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既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行政司法、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高端人才,包括袁隆平、屠呦呦等造福人类的伟大科学家,也有大量有知识和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基本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发展发挥巨大作用,支持中国崛起,“丹心熔赤县,铁臂铸中华”(梁东《采矿五零级同学聚会于徐州》)。

本书选录校庆诗词颇多,称颂人才培养成就是校庆诗词的基本内容。王伯雄《水调歌头·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说“政界菁英领路,两弹一星捷报,桃李万千芳。百十春秋路,无尚颂荣光”,指出清华培养了领导国家前进的政治领袖,也培养了“两弹一星”元勋(共23人,清华及西南联大清华学籍毕业的11人)那样的卓越科学家,这是清华的“无上荣光”。孔汝煌《沁园春·上海交通大学105周年校庆献辞》称交大为“院士摇篮”,业绩峥嵘。陈国达《颂中南工业大学四十年校庆》盛赞中南大学在推动新中国矿业发展中的作用。杨叔子《浪淘沙·赠深圳大学》描写了深大培养出马化腾这样的“贤杰”,让QQ“形成一庞大产业系统”。曾经广泛存在的中等师范学校,培养了大量中小学教师,“作栋营千室,为舟济众流”(霍松林《天水市第一师范学校筹办校史展览室,因予曾在该校任教,故派人索诗,即题一律》),支撑基础教育发展,“桃李春风惠泽长”(王梦奎《怀念沁阳师范》)。刘国良《沁园春·为武汉水校同学进疆五十五周年而赋》写武汉水利学校毕业生为新疆水利建设作出的贡献。中小学高校输送人才,未能考入高校的毕业生则成为家乡建设者,如周啸天《满庭芳·渠县中学八十华诞》所说:“树蕙滋兰九畹,凭描绘,大好风光。”

第三,高校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发展提供了精神文化、科学技术支撑。科学研究是高校的又一重要职能。高校人才济济,科研设施完备,科研实力雄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齐全,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兼备;高校培养的人才发挥自身功能,服务国家战略,源源不断产出创新成果,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

高校拥有大批代表我国最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是我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据教育部统计,代表我国最高科学、工程技术水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40%在高校。高校教师开展基础研究,促进人类知识增长,硕果累累;开展应用研究,以技术支持各方面建设,功在千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中高校专家约占一半。国家三大科技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高校占比更高。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全国有80%以上的研究人

^① 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基本情况》,2020年8月31日,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008/t20200831_483697.html, 2024年11月20日。

员在高校，有80%以上的研究成果来自高校。^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指南和智力支持，增强了国家软实力。许多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成为重要智库，为国家治理服务。书中所选大量学者、诗人及诗词歌咏的人，很多是我国各学科开宗立派的大师和奠基人，或是继往开来的巨擘，都有原创性学术贡献和杰出的成就。

我国重大学术成就，在诗词中得到反映。1965年9月，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最先人工合成胰岛素，标志着人类在揭开生命奥秘历程中迈出了一大步，是新中国最有国际影响的科技成果之一，朱振和《欣闻我国成功合成胰岛素》记有其事。1984年12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亿次计算机，命名为“银河”，标志着我国巨型计算机技术的重大突破，开创我国计算机科学新纪元，主持研制的慈云桂挥笔抒怀，作《银河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袁隆平研究成功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造福众生，誉称“米菩萨”，为人类反贫困作出卓越贡献，歌咏的诗词很多。唐敖庆是享誉世界的量子化学家，张存浩《恭贺唐敖庆先生八十寿辰》称赞他“攀峰几度占鳌头”“前沿科技谱春秋”。马骏祥《缅怀汉字激光照排发明人王选院士》赞扬王选带来汉字印刷革命。高校专家学者辉耀我国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星空。

第四，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教育国际交流活跃。教育国际交流极其重要。一是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只有向他们学习，“师夷长技”，才能尽快缩短差距，迎头赶上，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助推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如金忠青《题荷兰相册》所说：“远游为借他山石，发奋齐攀绝顶峰。华夏腾飞同庆日，黄陵得意更葱茏。”二是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精彩，教育国际交流有利于汲取其他文化的优长，壮大自身力量；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影响，构建良好国家形象。三是教育国际交流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类型，对增进不同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促进民心相通，维护世界和平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积极意义。“宇宙大道本通贯，何分泰西与亚东！世界急需大手笔，陶铸天人理会通。”（张恒寿《赠贺麟同志》）“宇宙大道本通贯”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

20世纪50年代，教育国际交流主要面向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华立国先，凡事效苏联。我土兴教育，彼邦派俊贤”（许崇德《赠苏联专家》）。苏联派遣大批技术专家帮助中国建设，不少苏联学者在高校任教。据谢韬《寄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苏联专家》诗序，在人民大学的就有100多人。中国同时派遣学生到苏联和东欧留学、派专家任教。这种双向互动也是新中国教育、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周光召、孙家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的谷超豪、金怡濂、侯云德、王永志、钱七虎、曾庆存都是留苏学者。中国与苏东国家的教育交流，诗中留下鳞爪，如杨钟健《浪淘沙·又赠盖格尔教授》、吕振羽《访柏林洪堡大学并承邀至该校中国学院讲中国学诸问题》、陈士骅《捷列文斯科夫专家回国，作归帆图为别》、白敦仁《留别叶日·谢·格拉波夫斯基》等。十年动乱，教育、学术国际交流被视为“崇洋媚外”，基本中断。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交流有所恢复，诗词中亦有记述，如陈省身《回国》、王季思《念奴娇·答波多野太郎教授》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倡导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国门大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空前频繁。改革开放是中国崛起的关键一招，教育国际交流是教育领域开放的重要内容，是我国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进入世界前列的关键一招。留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中国60年教育改革发展成就》，2009年9月11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moe_2590/moe_2949/moe_2951/tnull_40116.html，2024年11月20日。

教育、教师跨国交流、中外合作办学等广泛开展。

一是留学教育蓬勃发展。一方面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政府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向发达国家公派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文学术和管理技术。民间自费留学也如火如荼,数量远超公费生。留学生学成归国,为国家建设特别是科学技术、教育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据教育部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回国服务,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4.46%。^①另一方面是我国招收外国留学生。2018年,来华留学人数达49.2万人,分别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成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②这方面的诗有丁大钧《赠至友尼尔森教授》、陈贻焮《赠别美国罗秉恕君》、王伯敏《题保加利亚留学生维吉尼亚山水》、钟振振《海归吟》等。

二是教师跨国交流,中外高校互派专家到对方国家讲学,开展合作研究,举办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数高校与外国高校建立了交流合作机制,双方互派教师成为常态。一流大学的学者多有到海外名校访学、讲学,以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经历。教育国际交流全方位展开,除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外,韩国、泰国、越南等也有交流合作。这方面的诗不少,如王力《送袁行霈讲学日本》、缪钺《吉川幸次郎教授自日本京都寄诗见怀,赋此奉酬》、苏渊雷《苏步青教授自日本西德讲学归来》、胡国瑞《临江仙·赠法国汉学家霍兹曼教授》、张震泽《代辽宁大学赠日本关西大学》、陈贻焮《访朱拉隆功大学》、刘叔新《访高丽大学》、李祥霆《赠剑桥大学格尔教授》、张宏生《耶鲁行奉赠康宜正果教授》等。

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是留学人员的联谊组织。余德浩《念奴娇·欧美同学会百年》总结了一个世纪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和成效:

百年盛会,聚英杰,联络美欧同学。落叶归根思祖国,不恋梁园漂泊。故土情深,丹心血热,壮志惊河岳。攀登探索,扫除华夏贫弱。

追忆创业艰辛,穷乡荒漠,先辈曾拼搏。揽月摘星功绩在,岂惧关山沟壑。后继人多,前路路远,气势何磅礴。神州腾跃,复兴天地开拓。

说留学生英才济济,他们忠于祖国,热爱故土,胸怀壮志,勤奋学习,回国后艰苦创业,拼搏于穷乡荒漠,攀登科学高峰,为“扫除华夏贫弱”发挥了巨大作用,建立不朽功勋,并将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继续龙腾虎跃,开拓奋进。

第五,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齐心协力办教育。为了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在社会各界推动下,1985年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节的设立,对促进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教师、提高教师社会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吟咏教师节的诗词极多,诗人们异口同声赞美其意义,表达立德树人的决心。黄軹球《尊师行》写暨南大学1981级学生朱川等为设立全国教师节奔走宣传,记载了一段当代教育史上珍贵的往事。

20世纪末21世纪初,教育经费不足,国家号召社会捐资助学,各界热烈响应,出钱出力,“乐育人才滋化雨,义捐膏火励青云”(谢宠《美“希望工程”》),兴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助学热潮。一是实施“希望工程”,通过社会捐助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博爱兼及村子弟”(蒋志《光炽希望小学》)。二是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2020年12月14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 2024年11月20日。

^② 钟曜平:《铸就辉煌的教育道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2019年9月29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8/201909/t20190929_401539.html, 2024年11月20日。

许多教育家、科学家、学者及其家属、学生捐薪金、奖金、稿酬、存款等设立教育基金，奖励教学、学术研究和优秀学生，资助贫寒学生。又有许多学校、学会设立了以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命名的学术或教育奖助项目。此类项目全国成千上万。获奖者终生与宗师巨匠的英名联系在一起，十分荣耀，激励效果极好。不少社会贤达和企业亦捐资助学。三是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侨中的一些企业家、慈善家捐资支持内地教育，“丹心似火爱中华”（赵焱森《参观立珊中学怀念慈善家彭立珊先生》）。其中，香港巨商邵逸夫、李嘉诚、包玉刚、田家炳、彭立珊等对内地教育捐款总额均以数十亿元乃至百亿元计。这方面的诗词不少，热情赞美了捐助者的仁爱之心、义薄云天及其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捐资助学是美德，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得到弘扬并大放异彩。

（二）表达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包括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教育者个人的教育理念。诗词表现的主要是后者，前者往往蕴含于后者之中。教育诗中包含的教育思想颇为丰富，一些诗对教育的基本问题表达了看法，如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教育目的和人才培养目标、教师与教育的关系、教师品格与责任、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及创新人才培养、中外教育和学术交流的意义、家教家风等。还有一些诗总结教育经验，介绍治学方法、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启人心智。许多观点揭示了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规律、教育发展的规律，是必须遵循的。

关于教育的功能、价值和地位，诗人们认为教育关乎国运、关乎文明进步，是国家、民族和文明发展的根基，教育强则国强。教育筑本固基，锻骨铸魂，传承文明，建构国民精神世界，养成良好社会风尚，决定国民素质，引导国家发展方向；培育掌握各种技能的建设人才，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复兴，故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立国教居首”（胡守仁《上海市尊师重教碑落成》）。匡扶《建国三十五周年赋赠中小学教师诸同学》说“作育人才关国运”，王力《赠诸生》说“英才辈出能匡国，振我中华赖汝贤”，羊春秋《书感》说“弦歌谱出文明乐，桃李栽成廊庙材”，张益禄《庆祝河北大学建校100周年》说“锻骨铸魂图强教，筑本固基助兴邦”“薪火相传千秋耀，文明承续万代长”，了凡《师者》说“百年基业从头起，千古文明得此存”，均阐明教育与国家和民族前途、文明发展的密切关系，发人深省。

关于教师与教育的关系，诗人们认为，教师是教育的主体，决定着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甚至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三尺坛非小，千斤担不轻”（周文彰《教师》）。因此，一方面国家和社会要尊师重教，发挥好教师的作用。白廷弼《人梯歌》说“百业农为首，千行师第一”，刘征《祝首届教师节》说“兴邦端赖人才盛，敷化须当斯道尊”，刘梦芙《庆祝首届教师节》说“作育英才宜重教，振兴华夏共尊师”，指出教师在教育中的地位 and 尊师重教的重要性。霍松林《教师节书怀》说：“绛帐弦歌美，杏坛雨露新。树人师乃贵，强国教堪珍。桃李芳菲遍，神州处处春。”这首诗意为社会尊师重教，教师尽心育才，则人才辈出，强国可期，国家蓬蓬勃勃，春光无限。

另外，教师要有人格光辉和责任担当，自爱自重，自励自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德才双馨，不负使命。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指出，学者是“人类的教师”，学者的使命是提高人类道德风尚，增进人类福祉。他说：“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①教师特别是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属于学者群体，理所当然要有更高的道德自律和责任担当。许多诗表达了这样的观念。王秉钧《述怀》说“职本育人任不轻，兴华继进

① [德]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4页。

仗群英。阐扬真理须求是，传授知能首美行”，胡守仁《上海市尊师重教碑落成》说“教师审自处，陈力毋负负。先事正其身，加之学殖厚”，周文彰《教师》说“亘古重师表，凡言当力行”，均是对教师的要求和策励。

书中选了不少谈论治学和读书、赠送弟子、迎送新生和毕业生的诗词，以及记载师训师言的诗词，属于论学诗和励志诗。此类诗勉励师生心志高洁，目标远大，勤奋钻研，戒骄戒躁，建功立业；鼓励学生青出于蓝，化龙腾飞，推动事业踵事增华；总结治学经验，阐述具体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提供学习方法和治学门径，思想性、哲理性和实用性强。叶圣陶《自力二十二韵》表达其“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吴玉如《付馨山》阐明文字与国魂之关系，劝告学生珍惜、用好民族文字，振聋发聩。华罗庚《治学》“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是许多青年学子的座右铭。饶宗颐《偶作示诸生》告诫学生“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脍炙人口。钟敬文《赠与会诸中青年同志》期望中青年学者“共建中华真学术，莫忘前辈大胸襟”，眼光绝高，格局绝大。顾兆勋《水调歌头·赠送陈江红同学赴藏》鼓励学生“贵有雄心壮志，更具当今技术，艰苦若冰融。奋斗高原上，赢得藏江红”，语言激昂慷慨。陈贻焮《答问学，示张明非、葛晓音二生》、钱志熙《再和“繁”字韵述学示诸生》指示研究生治学门径。林家英《世风叹赠研究生二首》针对当时高校从商热和社会高消费风气，勉励研究生要甘于寂寞和清贫：“修业守穷潜学海，男儿七尺意堂堂”，长人志气。

家庭教育是孩子的第一课堂，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教诗训海家人特别是晚辈明大义，严操守，知是非，辨善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追求真善美，反映良好家风。如吴玉如《乙未夏勉申儿》、陈毅《示丹淮，并告吴苏、小鲁、小珊》、徐澄宇《归家示儿曹》、王志均《家风》、于乃义《沁园春·复希武家书》、赵天然《金缕曲·送儿之沪求学》等，言之谆谆，给人教益。

（三）书写教育之美

学校是人类创造的最美好的事物之一。教育塑造人的灵魂，是精神性工作，它润泽生命，完善德性，促进幸福，推动发展，高尚而美好，“师表人伦万世业，文章道德千秋名”（萧印唐《次韵寄答效侃教授》）。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大乐，西方有“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之说，都肯定了教育之崇高和美好。教育诗充分彰显了教育之美。

其一是作育人材之美。教育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把人类长期积累的思想智慧、美德懿范和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让公共性知识转化为个体性智慧，为个体价值之实现赋能，激发其潜力，完善其天性，规训其动物性，提升其思想境界和素质能力，把人变成精神高贵，品德高尚，趣味高雅，厚德载物，可亲可敬的人；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力出众，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人；真实真诚，正大光明，从容潇洒，快乐幸福的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和社会的栋梁。这样的人既让个体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又以健全的思想、出色的作为美化社会、促进人类进步。天下美事，莫过于此。

育才之美还有三个特点：一是连绵不绝且不断更新，美美相继。教师迎来新生、送走毕业生，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接续，“言传身教两相成，济济英才次第增”（匡扶《建国三十五周年赋赠中小学教师诸同学》），教师的成就感、自豪感、幸福感随之继长增高。二是教师始终与天真可爱的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青年在一起，自己也童心长在，“青春永伴育花人”（刘自芳《校园抒怀》）。这是任何职业都无法比拟的幸福，甚至当帝王都不能比：“南面称孤不以易，遍人间只此春常驻”（叶柏村《贺新郎·自贺任教四十周年》）。三是教学相长，师生相互照亮、相互滋养、相互成就，共生共荣，在生命相遇、心灵共契的精神家园中感受幸福、传递幸福、创造幸福。故

叶柏村《浣溪沙·为毕业生通讯录题词》说“广栽兰蕙骨能香。人间百业此康庄”，吴孟复《九一年教师节，教院茶话会上》说“乐事从来惟教学”，陶道恕《赠八二级中文系毕业同学》说“得教英才诚至乐”，尹贤《乌市晤“文革”前高中学生沈民耀等，感而作歌》说“今见桃李结硕果，更慰园丁百年心。此生无怨也无悔，来世仍做育花人”，这些是真正体会到育人之美、教师之乐肺腑之言。萧印唐《自育育人示诸子女》以一家数代当教师而自豪。

王恒鼎《雨天放学即景》：

撑开彩伞雨沙沙，一个人成一朵花。

涌出校门花似海，遍分春色到千家。

通过描写放学场景，写出小学生之可爱。“春色”既是形容孩子们美丽如春花，也象征教育让孩子健康成长，等于把春天美丽景色、美好未来送进千家万户。兴象宛然，感情温润，把育才之美表现得极其精到。读此类诗，谁能不欣然陶然？

其二是学术创造之美。学校是育才中心，也是学术中心，是科学殿堂、文明渊薮。教育是创造性活动，特别是学术创造，产出新的成果，促进人类知识增长和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设良好精神生态，提高国家软实力，善莫大焉。优秀的科研成果本身是美，创造成果的人和学校也美。本书选了许多歌咏著名自然科学家、人文社科学家、教育家的诗词，其中一个基本内容就是表彰他们的学术成就。张飏《科海追星》、杨玲玲《满江红·赞百位中国著名科学家》、周正俊《中国现代科学家诗赋》均以组诗形式写具有开创性成就的科学泰斗，其中很多是高校教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导师。

其三是师生、同学感情之美。师生关系是由知识传授形成的特殊关系，师生情是非功利的，单纯、真诚、深厚、久长，是人间最美的感情之一，双方都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灵愉悦和精神享受。诗词表现师生情的很多，从幼儿园到博士都有，弟子写老师的诗词几乎离不开感念师恩的内容。这类诗往往写得一往情深，沁人心脾，如曹凤岐《师生情》、了凡《永遇乐·赠启蒙恩师丁夏娟女士》、刘泽宇《喝火令·课间与学生游戏》《一剪梅·寒假学生离校》、周铭耿《教师节上课有得》等。同学情也是纯洁、忠实、甜蜜、稳定、持久的，同学在学习中互促共进，在生活中相互关爱，最好的同学亲如手足，终生不渝。林家英《母校复旦大学校园旧踪四首》之《淞庄宿舍》写同宿舍学友关系融洽，欢歌笑语，互相切磋学问，你追我赶争上游。王鹏飞《同窗情》说：“惟有同窗情，相忆永不磨。”赵维江《金缕曲·青春梦》说：“一生缘，白首终牵系。”诗人在学校结交了兄弟般的同学，“炎凉世路不孤单”（寓真《浣溪沙·中学忆》）。

刘泽宇《南歌子·清晨同学生校园赏花》：

踱步花坛畔，晨风洒嫩凉。忽然笑语旋身旁，一伙小鬼满面带春光。

秀色分深浅，微馨合抑扬。一时齐嚷看丁香，含苞数朵别是动人肠。

校园景色之美、孩子们之调皮快乐、老师乐学生之乐，生动传出，的确“别是动人肠”。

其四是校园生活之美。青少年在学校学习、生活、成长，交往交流，自由自在，鸢飞鱼跃，生机勃勃，“似火情怀犹浪漫，如诗梦想最清纯”（张金英《致青春》）。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学术讲座、运动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社团活动、军事训练、大中专学生的烂漫爱情等，多姿多彩，成为校园生活的美好记忆。这方面的诗词如王世夏《密云水库毕业设计完成后留别战友》、张之翔《忆清华母校》、冯泽《看大学新生军训》、王充闾《题大学生辩论比赛》、孙德荣《大学生活掠影》、刘泽宇《念奴娇·为渭南高新中学“初夏之夜”文艺晚会作》、龚敏《念奴娇·四年寄籍》、金中《校园约会》、赵作胤《定风波·学校夏季运动会万米赛场》等。校园环境优美，花木扶疏，窗明几净，文化氛围浓厚，生活其间，身心愉悦。许多校园都有标志性景观，如北京大

学未名湖、博雅塔及王国维纪念碑、蔡元培塑像，清华大学荷塘及朱自清塑像，东南大学（原中央大学旧址）六朝松，南开大学马蹄湖，武汉大学樱花等，名扬天下，均有诗咏之。

因此，学校给人们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母校最关游子意，天涯万里我牵肠”（赵维江《返母校河北师大戏作》），“旦复旦兮魂梦绕，光华岁月如诗”（彭玉平《临江仙·题漂阳光华中》）。人们对母校总是满怀感恩之心。写母校的诗，如叶元章《颂母校镇海中学》“前路风霜常凛凛，故园花木总温温”，“寸草难忘化育恩”；谷超豪《寄母校温州中学》“幸得桑梓教，终身为动容”，孙俊人《校庆》“生平苦乐知多少，回忆源泉水最甜”，均满蕴温情，写出天下学子的共同感受。

（四）歌咏教师风范

教育诗中，歌咏教师的层出不穷，本书也选得最多。歌咏对象包括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导师等。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总写教师群体的，如赵朴初《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张昌言《师颂》、郑颐寿《教学即事》、孙谦《浣溪沙·献给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周文彰《伟哉，老师》《教师》等。此类是泛写，不指向具体人物。第二类是怀念、纪念、祝寿恩师和教育家、学术名家、教育同仁的，指向特定人物，此类数量最多。第三类是写教育界先进模范人物的。这三类诗均表现教师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体现教育家精神，灿然生辉。

一是教师之忠诚和风骨。教育工作者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忠诚于教师的职责使命，赤心爱国，竭诚为民，风骨凛然。如钟树梁《烛影摇红·教师节祝老中青教师三首》说：“满园桃李正芳菲，心血长浇灌。肩上乐挑重担。任苦辛、忠诚不变。”赵仁珪《纪念励耘老人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颂美陈垣“爱国情怀流史笔，兴邦热血铸师魂”。郑福田《金缕曲·咏马叙伦》写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为国为民为社稷，成就人才泽藪。尽献出、襟怀锦绣”，尹文英《遥贺先师伍献文院士百年寿诞》称赞伍献文“报国沥尽丹心血，培育英才数百千”，程良骏《拜读叔子校长和诗，对镜中白发，纸上功名，一笑再赋》说“岂为功名添白发，但凭肝胆答苍生”，均表明他们竭诚为国为民育才的心志，掷地有声。非常年代，许多教师遭受肉体虐待和精神凌辱，但他们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动摇，为祖国和人民教书育人、开展学术研究的炽烈之情始终不衰减，“世局动荡信念在”（谷超豪《和苏师》），“历尽人间无量劫，依然默默自耕耘”（楚图南《题熊秉明雕塑老牛》）。

二是教师之大爱和奉献精神。绝大多数老师安贫乐教，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拼将心血育名花”（吴孟复《教学》）。张昌言《师颂》写师业、师心、师魂，凸显教师的高尚品格：“执教谆谆献赤诚，呕心沥血海诸生。殷勤若就亲儿意，缱绻还如慈母情”；“奔走钻营皆大耻，安邦报国效精忠”。傅义《细溜凝成巨栋梁》说：“为欲灵魂皆照亮，便甘珍髓尽输将。”李桂梓《欠薪自慰》说“且抛一己名和利，好发全身热与光。”把教师比为春蚕、蜡炬的诗词比比皆是，喻指其吐出精华，温暖学生；燃烧自己，照亮学生。又比为孺子牛，喻其埋头耕耘、负重前行。王学仲《牛三首》说“只重耕耘不重酬，毕生辛苦但埋头”，“为育莘莘众孺子，黄牛风格遍教坛”，确为教师群体写照。黄济《自述》说“许身孺子甘为牛，学海指航巧作舟。愿化春蚕丝吐尽，织成锦绣饰神州”，将孺牛之喻和春蚕之喻结合，表达培养人才建设祖国的情怀。“平淡的生活与高远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实中外学人应有之风致”，^①多数教师确实有这样的“风致”。

^① 贺麟：《诸葛亮与道家》，《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8页。

教育界有些先进模范以非常之举凸显崇高人格，感人至深。李勤生《最美教师张丽莉》写张丽莉把生死置之度外，挺身保护学生，导致高位截肢，留下终身残疾，“最美芳标展风采，崇高品格见忠诚。爱播大地化春雨，德耀苍穹照宇明”。杨叔子《读胡锦涛同志复孟菲信有感》写孟二冬以名专家从北京大学到石河子大学支教，鞠躬尽瘁。布凤华《感动中国人物——胡忠、谢晓君》写“菩萨老师”胡、谢夫妇托起高原孩子的希望。王改正《歌吟时代楷模李保国》、杨文友《礼赞“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高玉梅《悼布衣院士卢永根》、赵迎华《水调歌头·黄大年》等写出模范教师的高尚品质和卓著业绩。他们真正做到了“人到无私品自崇”（郑文《自励》），是名副其实的最美教师。

有些老师把生命献给学生，“血写园丁不朽爱之歌”（张学理《相见欢·身护五生杜正香老师》），“生命谱成歌一曲，满腔热血壮忠魂”（武正国《抗震救灾群英颂·吴忠红》）。谢宠《悼念人民教师蒋焦影》写甘肃榆中五中教师蒋焦影“立足乡村志自崇”，“全倾心血化蒙童”，倒在讲台上，死时“粉笔依然在握中”。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小学和幼儿园老师不顾自身安危，挺身护雏鹰，涌现一个教师英雄群体。张学理《霜天晓角·向倩老师为救学生献身》《相见欢·身护五生杜正香老师》、石理俊《踏莎行·老师》、武正国组诗《抗震救灾群英颂》，均以真实的事迹和感人的细节写出汶川地震中教师之大爱，“死生之际呈高尚”（石理俊《踏莎行·老师》），惊天地而泣鬼神。

三是教师之专业水平和科学精神。教师要完成自己的教育使命，要有高尚的师德、严正的操守，学高身正，表率人伦，还要有渊博的学识、精湛的专业素养、高超的教学艺术。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统一的教学才是最佳的教学。尤其是大学教育，除传授已有知识外，还有知识创新使命，具体表现为学术创造，优秀的大学教师，都应该是所在领域的专家，以自身的创造性成果注入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若无思想上之创造，其所传授必枯燥而寡味”（熊庆来）。本书所选大学教师诗人，几乎是所在学科的专家名家；大量吟咏各学科领域杰出人物的诗词，一个突出内容就是表彰他们的学术成就。这两类人物，品格足以不朽，学术亦彪炳史册，道德文章双美。

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导师为了提高专业水平，实现科技创新和学术进步，淡泊名利，意志如钢，刻苦钻研，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具有纯洁的专业操守和崇高的科学精神。自然科学家埋头实验室，开展野外调查，发现科学规律，发明新技术。地质学家、工程专家和农林专家等投身山川荒漠、农田草原，勘探资源，建设工程，发展农林草业。人文科学家博考文献，结合现实，慎思明辨，写出新著，传承文化，润泽心灵，保育精神，让社会保持正确的价值方向，向善向上向美提升。社会科学家探寻社会发展规律，为国家治理献计献策。叶圣陶赞扬教师说：“堪钦心志卓越，科研无止歇，殚精窥奥。”（《齐天乐·题民进会员先进事迹选辑》）这种专业操守和科学精神是专家学者言志抒情诗词、吟咏各学科领域杰出人物诗词表现的重要内容。王绶琯《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三十周年集会赋并呈冯克嘉先生》说：“恂恂唯策勤精进，汲汲非关禄利名。”顾兆勋《咏我校召开执教满40周年教师表彰大会》说：“登山入馆勤研讨，秉烛闻鸡不肯眠。”曾庆存《答友人》说：“科学钻研心静寂，苍生忧乐血沸腾。”刘承钊《最后的野外采集》、张香桐《第一千次实验纪念》、李连捷《答友人》等诗作中亦有此类表达。裘维蕃《祝贺俞大绂院士八六华诞》说“钻研日孜孜，硕果世蜚声。精力常充沛，敬业一至诚”，写的是俞大绂，实际上也是所有优秀科学家、教育家的写照。

赵朴初《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是咏教师的名篇，把教师的大忠、大爱、大用、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不用天边觅。论英雄，教师队伍里，眼前便是。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无怨无尤吞折齿，捧丹心、默向红旗祭。忠与爱，无伦比。

幼苗茁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计。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光和热，无穷际。

二、当代教育诗的艺术风采

本书所选教育诗有其艺术特点，总体观察，约略言之，有如下数端。

第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诗史”表层的含义是记录时事，反映历史过程。^①当然，诗词是个人性最强的文体，它记录时事、反映历史有自身方式，往往通过诗人的个人经历、见闻和感受，以及一些具体人物、事件、细节，反映历史的某些面向和特征，与史学书写历史更侧重宏大叙事不同。本书诗词作者绝大多数是普通教师和学者，无缘“预闻国政”，不参与教育决策，所以直接从宏观层面写体现教育发展历程、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有限，只有柳斌、纪宝成等直接参与教育决策的教育部官员写过相关作品，大多是写自身经历和身边人、身边事，是个人化、具体化书写，但一粒沙里见世界，殊相可窥共相，也能从侧面反映当代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工作的重点和特点、得失成败和经验教训，揭示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的规律。而通过艺术化的书写，“诗”所反映之“史”，更具感人力量。

第二，作者多元，风格多样。诗词作者既有教育中人，也有社会各界人士。教师占比最高，有大学和科研院所专家，也有中小学和中专老师。专家中又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医学家、建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教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等。党政官员也不少。他们经历不同，学科有异，艺术取向和艺术造诣不同，关注的重点有别，遂使诗作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人文学者特别是古典文学专家、专业诗人浸淫古典诗词，诗律诗法烂熟于心，诗艺稳称，保持传统韵味。其中一些诗词名家又各具殊彩。21世纪以来的新锐诗人，锐意创新，在遵守诗词文体特征的前提下，追求语言、技法、意象、意境、气韵的现代性，别具风姿。

有些诗人诗词艺术造诣高，精心炼字造句，善用比兴手法、陌生化修辞和典故，格律合度，所作诗词韵调和谐，情景交融，兴象宛然，意境优美，情韵悠长。优秀的文史学者自不待言，胡先骕、汪胡桢、苏步青、顾毓琇、石声汉、顾兆勋、李国平、王绶琯、彭桓武、朱夏、程良峻、唐稚松、杨叔子、余德浩、潘云鹤、王玉明、吴硕贤等科学家的诗词都本色当行，不减行家高处。

也有一些科学泰斗、教育名家，如翁文灏、沈其震、童第周、张香桐、华罗庚、陈国达、钱三强、裘维蕃、王大珩、卢嘉锡、谢家麟、刘光鼎、曾庆存等爱诗吟诗，业余以诗言志抒怀、写人纪事，砥砺品格，激发精神，既不以诗人自命，便放笔直书，不拘格律，不假雕饰，语言浅白，意旨显豁，虽非标准之“诗家语”，但都是因真情实感驱使而作，“为情而造文”，言之有物，心志卓越，真情灌注，真力弥满，“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足以感荡心灵。并且他们是学术史、教育史的创造者，每个人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诗，所作自带诗意和史意。诗以人重，其价值就不能仅以文士舞文弄墨、“为文而造情”的标准衡量，不宜作艺术上的求全之讥。宋刘攽《中山诗话》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这些科学家、教育家的诗虽不能称“奇作”，但“义高”，高人志而长人气，值得珍视。

^① 诗学界对“诗史”的界定，均强调“诗史”忠实记录历史事实的特性。如孟棨《本事诗·高逸》：“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文艺上·杜甫传赞》：“甫善陈时事，律切精细，至于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第三，诗词美学体现唐音宋调两种范型。古典诗词的美学特征，主要是唐音宋调两大范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①“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②当代教育诗的美学风格也主要是这两种范型。有些诗重意象、意境，含蓄蕴藉，耐人寻味，接近唐诗风范，“以丰神情韵擅长”，“美在情辞”。有些诗重义理，且不妨直白道出“以议论为诗”，其意旨一望便知，走的是宋诗一路。因为教育诗写作者多意在抒发心志、表达教育理念、表彰前贤、教诲学生，以理服人，故宋型诗更普遍，这类诗“以筋骨思理见胜”，“美在气骨”。如同属劝学诗、励志诗，公木《爬山谣——赠吉林大学中文系八一级新同学》、唐稚松《登山》、厉无畏《登山》全用象喻，意在言外，唐诗色彩很浓。华罗庚《治学》、启功《共勉一首致新同学》则现身说法，直接明理开示，讲得“透辟”，是典型的宋型诗。

又如颂美老师的诗词，也呈现唐音宋调两种范型。多数写老师的诗，虽不无局部比兴，但整体上直陈其意，点明老师的高尚品格和显著业绩，突出训谕功能，偏于宋调。也有些兴象宛然，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近于唐音。如苏惠民《感动》写“身处穷乡，却怀揣理想；薪酬菲薄，却矢志不渝。为圆无数孩子的梦，他们默默地在穷乡僻壤耕耘”的老师，全用比兴象喻，优美醇厚，是典型的唐音：

僻壤育花人，荷锄百圃耘。汗滴滋嫩叶，山野俏争春。

指路云天外，启蒙溪水滨。每圆学子梦，欢笑傍柴门。

第四，传统与现代交织。诗词经过长期发展，积淀了一套成熟的话语系统和意象系统；教育也有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如称学生为桃李、嘉木、兰蕙，称杰出的人为鲲鹏、栋梁，称学校为庠序、黉宫，教师施教称振铎、春风化雨、绛帐春风，学校教学活动称弦诵，喻教师为春蚕、蜡炬，以松竹梅兰喻高尚节操，以挥鞭（祖生鞭）表示奋斗等。这些词汇和意象，诗中层层叠出，初予人以“陈词滥调”之感，但它们身上凝结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流淌着传统的精神血脉，且人人耳熟能详，表达能力很强，是其他词汇和意象难以替代的，故反复使用，亦有其必然性和正当性。

另外，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与古人相比，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教育涉及大量现代科学、现代观念，自然会反映到诗中，所以教育诗中有不少新理念、新词汇、新意象，出现一些完全口语化、白话化的诗词，清新可喜。特别是网络诗词兴起后，网络诗人穷力追新，此一特征更为突出。如徐中秋《山村女教师》：

涉流携幼过溪东，遍地山花映面红。

拜拜一声人去也，凝眸犹自看顽童。

这是当代脍炙人口的教育诗佳作，把师生的美丽、孩子的活泼、老师的慈爱写得生动传神，令人爱赏不置。“拜拜”入诗，透露强烈时代气息，顿生鲜活。

用韵上，有严守平水韵者，也有使用新韵者。用平水韵作的诗古雅庄重，用新韵作的诗清新流畅，各有其美。

当代诗词“求正容变”之趋向在教育诗中是体现得较为充分的，从而使其在葆有诗词美学特质的同时，更具活力和现代适应性。

① 缪钺：《论宋诗》，《缪钺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②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

三、当代教育诗的功能和价值

教育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生活和个人成长中具有重大功能和价值,这决定了教育诗也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诗的功能和价值,孔子兴观群怨之说最为全面,教育诗亦不例外。兴是激发情志,振奋精神;观是考见优劣得失,总结经验;群是交流感情观点,固结群力;怨是揭示和批评差错失误,惩前毖后,以图健康前行。本书所选教育诗,言志、抒情、叙事、明理之作均有,内容丰富,这四种功能和价值都具备。兹从教育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三方面论之。

(一) 教育价值:感发生命,升华精神

教育价值是指教育诗的引导、涵化、激励、规范作用,特别是对教师和教育学生的教育作用。“诗教”在我国历史悠久,它以诗温润心灵、涵养美德、启迪智慧,是我国国民意识教育、人格教育、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教育界是施行诗教的最重要场域。当代,除古代经典诗词教育、润泽师生外,还要以新创作的鲜活作品拓展诗教空间,丰富诗教内容。本书汇集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代表性的教育诗,时代特点鲜明,贴近现代生活,有独到的感发力和教育效果。叶嘉莹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歌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诗歌可以从作者到读者之间,不断传达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①“凡是真正具有感发之生命,而且在感发之本质上具有真正优美之品质的作品,便都有着足以引发读者心灵中某种美好之意念及联想的力量。”“有着对读者可以激励感发起来一种正面伦理价值的力量。”^②教育诗的训导性使之具有丰富的“正面伦理价值”和感发“美好之意念”的力量,它让读者从诗人所写的一诗一词、一人一事中,获得深广的生命体验,拓展辽阔的心灵世界,激发高远的伦理追求,从而升华精神境界并付诸实践。

阐发教育意义、教师风范和职业操守的诗词,激发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职业荣誉感。吟咏教育界名家和优秀教师、先进模范的诗词,彰显师德、师魂、师业,歌颂科学家精神和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见贤思齐,做德业俱佳的老师;感发学生效法师长,做学高身正、有为有守、光明正大的人,不做蝇营狗苟之辈。如黄天骥《金缕曲·追怀黄海章老师》说:“最难忘,谆谆嘱我,莫随俗媚。道德文章千古事,需养浩然之气。一寸丹,耘桃育李。若得余香留晚节,把名缰利锁都抛弃,言在耳,终身记。”论学诗、劝学诗和励志诗教育学生志存高远、砥砺德行,指点学习门径,对学生的成长进步更有重要作用。歌吟教育之美的诗词,让校园中人更加珍惜校园生活,构建和谐美好的师生关系,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精神生态,培育优良教风、学风、校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师生心系人民、献身祖国,不计个人得失奋斗的精神更有感发力量。特别是那些不怕艰苦,奋战在祖国建设前沿,或奔赴边疆、建设边疆,“沙场奔驰无南北,祖国需要任西东”(李连捷《闻退休有感》)的师生,精神更是熠熠生辉。“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其他参与工作的科学家为了铸造护国重器,数十年默默无闻奋战在艰苦的环境中,终于取得成功,大扬国威,“惊天动地千秋业,隐姓埋名几代人”(余德浩《读总书记讲话赞院士》)。杨玲玲《满江红·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郭永怀》写郭永怀为研制“两弹一星”献身。朱夏《柴达木杂记》写他参加寻找石油,踏遍高山荒漠,夸父逐日,“人间不信有天涯”。许士杰《赞李国桥》写广东中医学院教授李国桥为了研制抗疟疾药物,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摸索治疗方法,“为使人间登乐土,愿将

^① 叶嘉莹:《唐诗应该这样读前言》,《唐诗应该这样读》,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页。

^② 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生命化天桥”。徐凤翔年届半百，自动请缨援藏，扎根西藏 18 年，培育西藏林学人才，创立高原森林生态学，赢得藏族同胞爱戴、全国人民尊敬，她的《赴藏临别凤翔自咏》等诗表现了高远精神追求。吴成斌《赴藏吟》写他从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毕业，带头响应国家号召，志愿到西藏工作：“展翅高原边塞去，微躯七尺献邦家。”此类诗，荡涤心灵，足以廉顽立懦，启导后学追求崇高。

教育诗蕴含丰富的教育经验，对办好各级各类学校有借鉴意义。本书所选诗词，多是一流教育专家和学者的心血结晶；吟咏教育家和学者的诗词，也涉及他们的育才理念和做法。他们的教育理念和经验，对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找到科学的办学路径、提高办学水平及育人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大有裨益的。

（二）历史价值：读史明智，鉴往知来

历史价值指教育诗保存新中国教育史文献、认识新中国教育发展史、提供历史镜鉴、汲取历史智慧的价值。英国文化学家安诺德说：“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①教育诗多由新中国教育的实践者、参与者、见证者精心结撰而成，真实性强，涉及面广，为认知当代教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材料。“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教育诗反映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经历的曲折和失误。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给我们继续勇毅前行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力量。曲折失误，给我们留下沉痛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汲取教训，免蹈覆辙，抛弃愚蒙，增益智慧，我们的教育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不断迈向更高境界。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波澜壮阔，是新中国教育的奠基和开拓时期，教育界满腔赤诚、斗志昂扬地投身教育，筚路蓝缕，开基创业，步步登高。新中国成立初，在经费和物资匮乏、设施设备简陋、师资短缺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这种艰苦创业精神是不朽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如田汉《访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和研究站》、吕振羽《喜大连大学物理电机等系响应号召自制教学实验实习仪器》、陈懋章《忆江南·教室》，分别写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初建时之艰辛和简陋，任继周《饥寒无惧伴熊狼》写甘肃农业大学师生 1956 年在天祝县马营沟建立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的艰苦情况，都有真实、具体的历史内容，反映了创业之不易，体现创业者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学生发奋学习、立志成才的报国精神。施议对《沁园春·忆课读生涯》则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时的寒酸，但培养出了众多人才。此类诗词，既有存史价值，又有教育意义。

此外，许多诗人和歌咏对象，是各个领域的泰山北斗和国家科学脊梁，“百年巨匠”“百年国士”，他们是当代教育史、科技史、学术史、文化史，乃至国史的组成部分，诗词是研究他们生平、思想、情感和成就的宝贵资料。诗词是个人心灵史，通过他们的诗词，更能窥见其隐微的内心世界，呈现活生生的人。撰写他们的传记，诗词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三）文学价值：接续传统，再攀高峰

文学价值指教育诗对诗词自身的作用和意义，具体是：为认识、评判当代诗词的成就、价值、地位、命运提供依据，为诗词创作和诗词事业发展提供启迪和借鉴，为诗词鉴赏和评论、诗人研究提供资料，助推当代诗词经典化。

教育诗在古代诗词中源远流长，也是当代诗词的重要类型。新诗兴起，旧体诗词一度边缘化之际，仍在诗词领域坚守、作品品质较高的主要是以学校教师、科研院所专家为主的学者群体。

^① 缪钺：《论宋诗》，《缪钺全集》（第 2 卷），第 165 页。

本书所选诗词言志、抒情、明理、写景、叙事，兴观群怨，内容丰富，功能齐全，不少作品艺术水准较高，既在教育诗中别开生面，又为当代诗词贡献了重要成果。

教育诗为正确认识旧体诗词的当代命运和创作成就、撰写当代中华诗词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新文化运动以后，旧体诗词被判了死刑，长期受轻视，导致现当代诗词一度边缘化，一些人认为当代诗词无多可观，价值不高，前途暗淡。教育诗从一个侧面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对旧体诗的偏见应该彻底纠正。通过本书可以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初到当下，旧体诗的创作虽有起伏，但历史从未中断，诗人数众多，作品数量庞大，成就卓著，为中国诗歌增添光彩，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新的精神成果。实践证明，旧体诗完全能与现代社会兼容，并与时俱进，不断续写中华诗词新篇章。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诗人群体中，自然科学家占了很大比重。书中选入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含外籍院士，不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就有60人，而这只是写诗的两院院士的一小部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的吴征镒、谢家麟、谷超豪、张存浩、曾庆存、李德仁，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苏步青、华罗庚、陈省身、杨振宁、丘成桐等，雅好诗词并写作，有的还写得相当出色。医学院校的一些医学泰斗如岳美中、裘沛然、张灿理、李鼎等的诗词亦灿然可观。这说明诗词具有强大生命力，现代人写旧体诗并非“骸骨的迷恋”，而是因为它确有独到的表达能力和难以抗拒的艺术魅力。

教育诗给当代诗词创作特别是教育诗词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诗词家倡导诗教，“欲唤吟魂起国魂”（许永璋《题北窗陋室诗存》），中华诗词学会推动校园诗教，学校诗社林立，高校开设诗词写作课或诗词写作培训班，诗词造诣高的老师指导学生写诗，大学生诗词竞赛不断举行，校园诗词传统已逐渐恢复并走向茁壮。孔汝煌《贺全国高校诗教工作暨当代诗教理论研讨会在武汉江汉大学召开》、尚永亮《珞珈山樱花诗赛二首》、姚泉名《菩萨蛮·贺中国地质大学大地行吟诗社成立次韵罗辉先生》等反映了校园诗词教育和创作情况。本书所选教育诗，从选材、立意、取径、写作技巧、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可为校园诗词创作提供启发，从而创作出新的教育诗，为当代诗词增色。

现当代诗词发展史证明，学校是诗词创作传承最有效的场所。民国至今，大学都是诗词创作中心，师生递相传授，绵绵不息。当代诗词复兴，高校砥柱中流。在旧体诗词长期受排斥的情况下，“中土灵气未绝”（章太炎《题培风楼诗》），其命不死，大学功不可没。高校应继承优良传统，积极开展诗词教育和创作，赓续历史文脉，推动中华诗词创新性发展，为开创中华诗词新时代发挥作用。

现当代诗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经典化不足，导致人们对其成就和价值认知薄弱。选本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一些精品通过不同选本反复呈示、彰显，供人们诵读、鉴赏、研究阐释，就逐渐积淀为经典。诗人的地位也要通过选本来体现。因此，本书在当代诗词经典化方面亦有一定作用。

叶嘉莹先生2019年《为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题诗》说：“中华诗教播瀛寰，李杜高峰许再攀。已见旧邦新气象，要挥彩笔写江山！”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中华诗词一定能彩笔写江山、写时代，再攀高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念兴昌

洪炉铸成新天地，豪情写就壮丽诗

——《新中国诗史·冶金卷》前言

李东昀

摘要：冶金业是现代工业之根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冶金业取得卓越成就，使中国从贫弱跨上世界第一钢铁大国，有力推动了国家现代化。新中国冶金诗作者辈出，佳制迭现，构成当代诗词的重要类型。冶金诗承雅颂之遗音，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扬时代精神并重，彰工业之大观，记创业之历史，颂奋斗之精神，展现了恢宏壮丽的时代风华。艺术上有恢宏壮丽的工业意象、刚柔相济的审美风格、丰富多彩的诗体形式和语言美。在推动传统诗词书写现代事物和表现时代精神，拓展诗词的创作资源和表现范围，促进诗词熔铸古今而又自新自强等方面，均有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冶金诗；时代风华；审美风格；工业诗词；诗境开拓

中图分类号：G122；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4-0089-12

金属冶炼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冶金术的发明，是文明的巨大飞跃，大大提高了人类生产力，从而改变了社会的面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生铁的国家之一，在青铜、钢铁等冶炼和铸造等传统冶金业的主要项目上，我国古代先民的技艺长期领先世界，体现了中华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古代诗词中已有冶金题材的书写，李白《秋浦歌》第十四首——“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脍炙人口。

冶金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衡量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现代冶金行业按照产品类型大体分为钢铁业、有色金属业、机械铸造业、五金加工业和其他相关的冶金矿业和加工业。新中国成功改变了中国近代传统冶金业的落后、凋敝局面，在现代冶金业上实现了全面繁荣，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挺起了民族复兴的“钢铁脊梁”。

我国历来诗道昌盛，诗之功用广大精微，承载历史，体察得失，润色鸿业，褒赞成功，是《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歌诗合为时为事而作，吴宓先生说：“凡百年文学，皆循进化变迁之轨辙。即诗之一道，欲其工切，必与其时代之国势民情，诸方呼应乃可。”^①新中国冶金诗词就紧贴“国势民情”，书写新中国冶金一步一步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激动人心的人和事，取得不容忽视的成就，足以在当代诗词中出一头地。

一、新中国冶金诗的思想内容

新中国的冶金事业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且以成绩为主。我国冶金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作者简介：李东昀，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学和当代诗词。

^①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8页。

冶金工业、冶金技术、冶金教育、冶金人才等方面的全面进步和繁荣兴盛。新中国冶金诗的主要内容是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冶金行业的振兴历程，以及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和社会状况；颂美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回顾往昔，展望未来，激励奋进。

（一）揭示冶金业与国运的关系

冶金业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国家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工业、农业、商业、军事等都需要钢铁和其他金属材料制造机器，生产物品，否则寸步难行。冶金业对于保卫国家、发展生产、服务民生都有重要意义，因而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与民众生活密不可分。汪东《菩萨蛮·老农相遇田间立》说“欲求机械化，钢铁先称霸”，朱延辉《参观上海第三钢铁厂》说“铸犁还制剑，卫国复兴工”，饶惠熙《工业颂》说“中华崛起五洲东，工业先论第一功”“今日全球应刮目，江山如铁气如虹”，均强调了冶金业及工业在保卫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万方多难，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侵略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坚船利炮”就是建立在先进的冶金业之上的，“敌夸上万吨，肆虐及两洋”（龙榆生《炼钢》），“鸦片战争盈血泪”“历史创伤叫国魂”（叶平林《宝山即兴》）。这是国人的惨痛记忆，“无工业，不大国。无钢铁，不强国”成为共同的观念。我国迫切需要在冶金上取得进步，以改变积贫积弱的困顿局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全国从上到下的广泛共识。中枢精心筹划，将钢铁工业作为新中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民间亦对振兴钢铁工业寄予厚望，大力支持。刘梦芙《南歌子·炼钢业》说“昆仑铸剑树丰功，看我中华大业日兴隆”，反映了国人的共同心声。

翁文灏《鞍钢感怀》说：

铁钢创建自香涛，残件迁川尚足豪。

太息后继无人起，遂令邻国自鸣高。

鞍山此日规模壮，华裔于今基础牢。

带砺山河初步定，辉煌国力途程遥。

“香涛”是清末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的别号，他长期担任湖广总督，于1890年兴办汉阳铁厂，这是我国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开启了我国钢铁工业的近代化。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寇准备溯江西犯武汉，汉阳铁厂西迁入川，以供军需之用。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参与西迁工程，此即“残件迁川”本事。此诗追忆张之洞办汉阳铁厂的事迹，同时感叹后继无人，于是让日本的钢铁工业自鸣得意，并变成侵略中国的利器。如今鞍钢规模宏壮，远超汉阳铁厂，为我国钢铁工业铸牢基础，也为新中国江山永固初步奠定基础。相信经过长期奋斗，中国国力一定能臻于辉煌。

郑晓沧《今日一炉铁》说“今日一炉铁，明朝万柄犁。深耕兼易耨，廪满浙东西”，“今日一炉铁，他年万锭机。机声长不断，四季足裳衣”，认为炼出钢铁，能够制造耕犁和织布机，让民众丰衣足食，反映了发展冶金业的重要意义和美好愿景。

著名词人龙榆生《炼钢》云：

钢为百工本，由以致富强。敌夸上万吨，肆虐及两洋。

中邦苦穷白，奋起力耕桑。急务工业化，筹画最周详。

唤醒六亿人，大任共担当。高炉遍处处，锤声响琅琅。

深宵北窗外，射眼散星芒。长钳夹顽铁，炎炎闪红光。

几辈弓其腰，炼人非炼钢。

这首词开头即揭示了钢铁工业在工业发展、国家富强中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新中国为改变“穷白”面貌，以发展钢铁工业为急务，中枢“筹画最周详”；全国人民热情拥护，“大任共担当”，于是钢铁工业蓬勃发展，并在炼钢中锤炼红心。

（二）书写冶金建设的时代风华

中国文学历来就有非虚构的传统，诗可以证经补史，可以“宣元郁之思，光神妙之化”^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冶金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构成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青史应书伟业迢”（刘余嘉《钢城赋》），歌颂新中国冶金业辉煌成就的诗词很多。

首先，热情歌颂新中国冶金业的巨大成就。我国的钢铁生产不仅在产量上较旧时代有新的高度，而且生产方式和开矿、冶炼、铸造工艺均实现了质的飞跃。1953年，唐山钢铁公司8号高炉作为中国第一座大型自动化高炉建成投产。高炉吐出的霞光绮彩，闪耀当空，象征着万众团结一心建设新中国的满腔赤忱和汹涌热情。1954年，中央重工业部对华中钢铁公司进行改组，中国一冶作为新中国最早、最大的冶金施工企业诞生。这些事迹说明我国冶金已经正式步入正轨，迈入了新纪元。一座座新的钢城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拔地而起，旋乾转坤，国家命运彻底改变。“烟囱成林，高炉齐山。钢铁之都，巍巍桓桓！百花争妍，亿民争贤。造化在手，乾坤旋转。”（赵朴初《黄鹤来谣·为武汉大桥作》）

1959年1月，郭沫若参观武钢之后，写下七律《访武钢》：

飞来楚尾自吴头，浩荡长江日夜流。
连镇二桥通万里，高炉一号足千秋。
停看白浪奔雷电，俯瞰银河耀斗牛。
人定信然凌造化，四方匝地涌高楼。

此诗堪称大手笔，气象不凡。颈联写武汉钢铁厂炼钢高炉和灯火群星璀璨，如北斗星、牵牛星闪耀于银河，动宕有力，挽弓万钧，而又传神写照，绘出了江城铁水钢花的壮丽景致。

叶圣陶1961年9月18日参观包头，随即填词《三姝媚·访包钢》以记录见闻，感叹钢城建设的辉煌业绩：

大青山作障，耸高炉、轰轰宛然雷响。火候臻时，乍壁开吐焦，满车红亮。吊架移来，盈巨桶、铁浆犹烫。注入平炉，再炼重熔，钢龙腾浪。

乘兴凭高环望，看眼底包钢，一何雄壮。石拐乌金，白云佳铁，返连双矿。建设输劳，诸族共、热情奔放。伟业成唯今代，临风久想。

这首词通过对冶金场面的直接描写，动态呈现炼钢的实景，进而由小见大、由近及远，感叹地域得天独厚，矿产资源丰富，颂美各民族众志成城振兴中国冶金业的精诚壮志和冶金城市的雄壮繁荣，颂美创造“伟业”的时代。气魄雄壮，声调铿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我国冶金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同年12月23日，上海宝山钢铁厂兴建工程正式动工，作为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冶金工程项目，预设计年产钢、铁各600万吨。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视察宝钢并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② 宝钢工程师李贡禹目睹宝钢的兴起和一路高歌猛进的发展，写下《宝钢高炉十韵》：

北倚长江口，东临大海隅。曩时农桑地，今日起高炉。
炉高数十仞，崩劣何雄乎！炉容四千级，国中前所无。
吞吐数万吨，昼夜不停输。风嘴三十六，盘龙绕炉躯。
高温千百度，大旱滴金珠。宝钢之瑰宝，赖此柱中枢。

^① 徐祯卿：《谈艺录》，明万历金陵荆山书林刊本，卷一。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技术臻先进，管理匹美苏。生产称巨擘，四化作先驱。

1996年，我国钢铁产量超过亿吨，国民为之欢腾。宝钢建设者方宗远挥毫作《我国产钢超过亿吨》，记下这一历史性时刻：

亿吨佳音遍地传，月儿几度缺和圆。

严寒岂惧冰封井，酷暑何妨火灼天。

跃马未虚挑日落，登峰始得拨星旋。

鼎新革故孜孜路，一夕真同二十年。

2005年，我国净进口钢的状况成为历史；2007年，我国钢铁产品出口量跃居世界首位。“铁水奔流浇四化，螺纹钢胜美和英”（杨第甫《贺涟源钢铁公司成立30周年》），数代冶金人前赴后继，一座座高炉矗立于浩瀚苍穹，一个个厂区分布在广袤大地，一派蒸蒸日上的现代工业气象，远眺矿车川流，烈焰奔腾，近观钢花怒放，铁水欢歌。而冶金的成功不只有炼钢，我国在有色冶金、稀有金属冶炼方面也处于世界前列，铝、钼、钛、稀土、钨等资源在全球资源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

壮志既酬，宏图毕展，低碳高效、绿色可持续、信息化的众多理念正在一一贯彻实现，我国冶金必将长久造福国民，光照世界，而众多诗作正是见证冶金发展的人们诚挚的献礼和衷心的祝愿！

其次，颂美冶金城市建设和地区发展。随着冶金业的发展，我国崛起座座钢城，锡都、铜都、镍都等应运而生。因冶金而兴的城市有鞍山、包头、马鞍山、攀枝花、铜仁、金昌、招远、德兴、大余等等。这些城市输送其冶金产品服务国家和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些云蒸霞蔚、光辉灿烂的冶金城市，以其美貌和功绩为诗家所重，书写冶金城市游历所见所闻的作品层出不穷。这类诗作多用赋笔，直书所见，也借钢花铁水，善为譬喻，得风人比兴之旨。这种以冶金工业作为城市书写主要内容的诗篇，有别于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靡靡之声，天生就是一种既安且乐的治世之音。

1965年，我国在川滇交界处、金沙江畔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一座崭新的钢城迅速崛起。1966年郭沫若参观攀钢后，大为赞赏，作《水调歌头·晨自庐山发》：

晨自庐山发，飞驰峡道中。忽见霸王鞭者，耸立一丛丛。车辆穿梭织锦，尘轂轻扬上树，公路宛如龙。仿佛琼州岛，赤日照当空。

蕉叶茂，桉树密，挺深棕。甸沙关上，漫饮清茶沐凯风。欲往攀枝花去，只为迟来一月，不见木棉红。别有奇花放，钢都基建雄。

此词俊逸潇洒，有轩举翻腾之势，写出了蜀中钢城攀枝花的美丽风景。蔡淑萍《采桑子·攀枝花行吟》亦写钢城之美——“木棉枝上花如炬，楼在芳丛，车走芳丛，十里钢城花里逢。碑书人字云天里，辽远晴空，屏立诸峰，一线金沙入望中”，并说攀枝花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丰碑，高耸云天。

又赵越《嘉峪关城楼望酒钢》：

新城崛起耸长空，嘉峪关前气象雄。

傍晚登楼闲眺望，钢花铁水映天红。

在诗人的书写中，西北边塞与酒钢相得益彰，嘉峪关前不复黄埃散漫的萧条气象，因为有新中国新时代的炼钢事业而熠熠生辉。朱光的《广州好》则在羊城的万千风华中截取了属于钢厂的一种承平气象：“广州好，钢厂烁红霞，烟突嵯峨穿翠幕，铁流腾沸出丹葩，不见日西斜。”凡此种种，言之不尽。这些因为冶金而兴盛活泼的城市，其发展建设茁壮成长中的冶金功绩，定然会史笔流芳，成为这片大地永久的记忆。

再次，颂美新中国冶金科学技术和教育成就。冶金业是技术性产业，需要科研和专业人才支撑，“腾飞华夏赖科研”（吴亚卿《参观宝山钢铁总厂》）。新中国建立了冶金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和上海冶金研究所；建立了一批冶金院校，如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

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武汉钢铁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西安冶金学院（今归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鞍山钢铁学院（今辽宁科技大学）、沈阳黄金学院（今东北大学黄金学院）、江西冶金学院（今江西理工大学）、山东冶金学院（今青岛理工大学）、马鞍山钢铁工业学校（今安徽工业大学）等。东北工学院（今东北大学）、昆明工学院（今昆明理工大学）等也以冶金见长。一些高校有冶金院系，全国各地科研部门和企业也从事冶金研究和人才培养。冶金研究院所和院校肩负起历史重任，研制出许多先进技术和设备，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使我国的冶金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冶金科研和冶金教育点燃新中国冶金业的熊熊烈火，光芒四射，照耀寰宇，“看科学、百年成就，万方辉耀”（杨玲玲《满江红·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

冶金诗关注冶金教育与科研，见证了各地冶金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开枝散叶，一代又一代冶金人的恢宏壮志和前赴后继，薪火不绝。中南大学自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时代就形成了浓郁深厚的冶金传统，绵延不绝，“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校训一以贯之。中南大学师生攻坚克难，助力新中国各个阶段冶金事业的发展，在这一行业内形成持久不息的影响力。中南矿冶学院副院长陈国达院士1992年11月作《颂中南工业大学四十年校庆》三首，追忆了中南工大的发展历程，颂美它培育的英才遍布全国，科研成果丰硕，为“神州矿业盛”作出突出贡献：

光辉熠熠四十年，育就俊才遍岭川。
共庆神州矿业盛，称扬济济众英贤。
当年岳麓建学园，筚路蓝缕奋向前。
今日珍仪盈玉宇，一流争取可着先。
师弟同心争领先，教科齐上果逾千。
众擎易举成骠马，还得加鞭莫惰延！

最后，新中国冶金诗词也不拘一格书写日常生活中关于冶金的细小片段。这一类诗妙趣横生，真切自然。日常生活相对于宏大叙事，能够更为清晰地呈现社会历史中的个体状况。日常生活虽然充满了千千万万平凡重复的事件，但也总有真实而富有艺术性的一面。冶金诗中的日常生活因而比起那些直接书写大事件大变化的作品，更见平易近人并充满生趣，如汪东《菩萨蛮·老农相遇田间立》：

老农相遇田间立。不通名姓情偏热。
问汝市中来，炉群今几堆。
欲求机械化，钢铁先称霸。
明日待耕犁，隆隆拖拉机。

这是书写乡村生活，一位城里人和一位老农在田间偶然相遇，于是有了一段对话，虽然二人素不相识，但一谈起炼钢炼铁的事业就倾盖如故，在老农那絮絮叨叨的家常语言中，侧面写出了普通农民对于炼钢和机械化的乐观态度。与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不同，这些书写细腻而别具意蕴，所反映的往往是瞬间的、片段的感受和状况，但正因此而别具特色，能够烛幽显微、以小见大。

以上数端聊以举隅，但显然新中国冶金诗的内容不限于此。新中国冶金诗所涉足的很多题材是传统诗家开垦未广或者“未曾梦见”的新领域，新事物新题材激发出作者们如宋诗“白战体”般的创作勇气和锐气。正因空诸依傍，才不得不迎难而上，困难见才。因此，就内容来说，新中国冶金诗是应时代而生的，它也有金属一样的延展性，以及不屈不挠的韧性。这种延展性和韧性很轻易地就超越了传统冶金诗的范畴，迈向了一片对于诗歌创作来说俯拾即是的丰饶园地。

（三）表彰冶金工作者的山河伟业

人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新中国冶金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到改革开放后的跨越式发展，再到当下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每一步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冶金人的智慧与汗水。冶金诗中有大量书写冶金工作者的诗词，歌颂他们赤诚报国的情怀、

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奋斗精神、卓越的科技成就、辛勤的劳动等。

一是歌颂冶金科学家和工程师。众多冶金科研工作者和一线工程技术人员输肝剖胆，竭尽心力奉献毕生，冶金诗予以热情讴歌。如朱夏院士1978年的诗作《追悼谢季骅（家荣）先生》：

遗稿重腾百丈芒，新天日月放幽光。

带水潜丘劳记述，礁滩蚀壳费思量。

驱车远塞沙风劲，问字新篇墨渥香。

指点煤山与油海，更谁椽笔著文章。

谢家荣院士不辞辛苦，跋山涉水，开展大量实地勘探，成为中国发现矿床最多的地质学家。无论是远海还是大漠，这些人迹罕至的禁区绝地，均有他勘探考察的足迹，这是老一辈地质科学家勤恳踏实、一心报国的真实写照。

杨玲玲《满江红·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

革命红船，从浙里、启航时刻。看科学、百年成就，万方辉熠。筛选精英求称职，分离稀土非凡术。萃取箱、数据把关严，频升级。

担大任，凭胆魄。工计算，谙规律。更德彰饱学，厚藏深积。荣获国家科技奖，光环世界声威立。最高处、贡献尽人知，留功绩。

徐光宪院士是稀土材料化学家，发明了稀土分离技术，将我国稀土提取水平推向国际前沿，树立“世界声威”，为把我国建成稀土大国作出贡献，2009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此词写出了徐光宪在科学研究、技术升级、培育人才等方面的突出业绩，彰显其美德懿范。

又如张存浩《勋业——贺师老八秩寿辰》：

材料倡前沿，合金天下先。宏观举韬略，科技撰鸿篇。

淡泊犹宁静，丹心荐轩辕。再寿八十载，率众鼓新帆。

“师老”是有“中国高温合金之父”“中国材料学之父”美誉的师昌绪院士，他长期致力于材料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是中国高温合金研究的奠基人、材料腐蚀领域的开拓者，是国家战略科学家。此诗高度赞扬师昌绪院士的品格和勋业，他丹心报国、淡泊名利，宏观把握材料科学发展方向，提出雄韬伟略，并实现高温合金技术创新，为天下先。

二是聚焦冶金劳动者，刻绘其光荣的劳动形象。“炼钢铁，兴工业；炼钢铁，兴家国，工人功须载史册。”（田翠竹《短歌行·湘潭钢铁厂》）故歌咏冶金劳动者的诗颇多，如欧阳觉吾《寿星明·锰都吟》、蔡学标《赞炼钢工人》、周砥中《锰矿炉工吟》、单人耘《采矿工》、王延绵《满江红·鞍钢五百罗汉》、胡吉祥《念奴娇·矿井抒情》、高立元《炼钢工》、齐晓阳《思孟泰》等。这类作品中以对工人的书写为中心，展现那千千万万推动时代进步的劳动者形象。写冶金人物的诗大多能够传神写照，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工笔与写意妙合无垠。如吴金水《支边老人吟》：

响应号召去支边，长车万里到酒泉。

酒泉当时苦寒地，创业哪顾生活艰。

狂沙夜吼居延海，积雪朝浮祁连山。

风锤药炮开青嶂，炉火钢花乱紫烟。

这是一首长诗，此处节选的是其中关于冶金的片段，虽创业千难万险，远疆之绝境风光恢宏大气，令人慨然神往。此诗写支边老人的一生之回顾，由一人遭遇沉浮而展现历史之巨细妍媸，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既无愧诗史，也每见精思健笔，词近旨远，波澜万丈，堪称杰作。其中老人在西北边疆苦寒之地奋斗的场面写得荡气回肠、波澜壮阔，可见老一辈建设国家的艰辛和不易。

欧阳觉吾《寿星明·锰都吟》：

九月金秋，一路黄花，十里锰都。且登临鹤岭，工区鸟瞰；纵横龙脉，宝藏岩储。钢藉其成，

人因此战，七十余年仗锄鋤。艰难甚，有男儿多少，终老山隅！

嗟嗟诚世师模，及目击辛劳更可书。已重重坑道，风机犹吼；铮铮铁汉，襟抱方舒。身在井间，胸怀天下，富贵浮云耻步趋。叹今日，尚争名逐利，谁与之俱？！

湘潭鹤岭镇有“中国锰都”之誉，此诗赞美锰矿开采工人胸怀天下、铁骨铮铮，视富贵如浮云，是热血男儿，堪为世人楷模。

黄棣华《湘潭锰矿采风抒感》说：“四季谁知日夜分，阳光不照洞中人。凭君一路开山斧，劈得荒山处处春。”构思巧妙，写采矿工人长期在矿洞工作，不见阳光，难分四季，但他们的劳作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春天。

三是书写冶金工作者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and 突出的社会贡献。王延绵《满江红·鞍钢五百罗汉》：

回眼烽烟，几多载、神州喋血。起赤帜、搅翻江海，荡夷妖孽。力拔三山凭义勇，气横千古彪忠烈。又颁令、五百聚精强，擒钢铁。

惊雷滚，顽石裂。炎飙举，长龙越。领辽东独秀，八方隆崛。江汉洪炉惊老子，乌蒙炽焰羞明月。钢脊梁、更挺大中华，乾坤阔！

1948年至1954年，550名干部响应中央号召，背井离乡驰援鞍山钢铁厂，领导和帮助鞍钢生产建设，鞍山钢铁工业因此成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一个光荣的起点。此词就记录了这一段真实的历史，歌颂钢铁工人的义勇和豪情。先写“鞍钢五百罗汉”参加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然后转战钢铁工业，再立新功。颂扬新中国钢铁新兴时期功不可没的一群冶金志士，他们的奋斗让“大中华”挺起“钢脊梁”，迈向广阔天地。

张飙《鹧鸪天·致敬缅怀材料学家颜鸣皋院士》：

征战空天料最珍，领衔首铸钛合金。银鹰纹裂除千患，超塑晶层扛万钧。

追真宰，报国恩。慧思润后壮新军。终身一事从无悔，鸣鹤九皋唱赤心。

颜鸣皋院士是冶金材料科学家，建立中国航空用钛合金系列，在微观结构分析、合金强化机理、金属超塑性理论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造性成果。他择一事，终一生，先后研制出十多种钛合金，成功地用于歼七、歼八、运七、运八、强五等飞机，“银鹰纹裂除千患，超塑晶层扛万钧”，就是指颜鸣皋为战机抗纹裂作出的贡献，读之令人钦敬。

（四）记录和反思冶金工作的教训

自古以来，诗不仅褒赞成功，也承载经验教训，有教化讽谏之功。诗之讽喻教化，即古人所说“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①。诗与历史的不同处在于诗不仅将各种社会事件视为历史材料，而且有感受，有反思，还有规谏；正视历史不是破坏和谐，而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明天。新中国的冶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以发展进步为主基调的历史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工作上的失误，诗中有记录和反思。

诗歌反映的冶金事业的教训主要涉及的是“大炼钢铁”这一历史事件。1958年，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国跃进”的方针，确定了钢产量的任务指标，号召1958年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民炼钢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一与“大跃进”并行的运动不可避免地沾染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不良风气。一些地方在工作中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到处设置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类生活生产用具拆下炼钢；大肆砍伐树木，无序开挖矿产，造成环境破坏；青壮年全部投入炼钢，农业生产被忽视。因此，“全民炼钢”不仅没有达到增加钢铁产量的预期目标，反而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影响群众生活，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大炼钢铁”涉及的面较广，很多人亲身经历过，所以在这方面形成了

^① 毛亨注、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义：《毛诗注疏》，明嘉靖李元阳刊本，卷一。

一定的诗词创作数量。

欧初是老革命家，其《八十回眸》组诗中有关于“大炼钢铁”时期的记忆：

万斤亩产“卫星”冲，揽大贪功共产风。

公社天堂殊万里，旌旗云彩隔千重。

指标实绩风牛马，后院高炉假大空。

每忆此时同百戏，阉阉扉锁铁窗熔。

此诗写为了放粮食和钢铁高产“卫星”，片面追求高指标，即使砸下门锁、铁窗熔化，也实现不了指标，就弄虚作假。到处炼钢，不过是儿戏。人民公社给人们许下的是天堂，实际情形是国敝民困，理想与现实相差万里，作者扼腕叹息。这段经历显然是需要铭记的教训，以至于作者80岁之际还是不能忘怀。

冯泽《下放之歌并序》十首组诗记录了他自己在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的往事，其中《大炼钢铁》云：

男女青年去炼钢，漫山遍野架营房。

可怜老幼无辜树，烈火丹心枉自戕。

这首诗记录全民炼钢的情况，漫山遍野架起炼钢炉，古木小树都砍伐烧掉，即便满腔热情，也炼不出钢铁。全国不少地区就是因为大炼钢铁时乱砍滥伐，导致植被破坏，造成生态失衡，作者对此深感痛心。

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违背科学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客观效果很差。“大跃进”工作中的问题我们党有清醒的认识，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跃进”“以钢为纲”的错误得到纠正，冶金业逐渐重回正轨。记取教训，才能免蹈覆辙。

二、新中国冶金诗的艺术特色

新中国冶金诗书写已经突过古人，是中国诗歌境界的开拓。冶金诗数量之繁富、体裁之广泛、意境之新异、思想之高尚，可谓谢华启秀，青出于蓝。冶金诗的艺术特色可以从如下方面评判。

（一）恢宏壮丽的工业意象

工业意象入旧体诗词对于我国的传统诗歌形式来说很有必要。如果追求语言的某种纯洁、纯粹，像历史上有的文艺思想那样限定诗歌的表达内容和表现范围，仅在熟悉的、经典的领域里打转的话，是无以成其大的。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很多诗歌真正有创新的地方，正在于既能够集前人所成，又能不踵故步，突破窠臼。冶金古已有之，但现代化的冶金业古人难以想象，它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宏大的钢城钢厂、高耸的高炉烟囱、喷溅的钢花、火红的钢板等，是新事物，写入诗中，就成为全新的意象，恢宏壮丽。

新中国冶金诗中现代工业文明的各种意象纷至沓来，形成了以冶金事物为中心的意象群，并且与各种传统和现代的自然、人文意象融洽组合在一起。黄炎清《东风第一枝·钢花》：

四季常开，三春不败，百花王国独步。淡烟轻笼芳姿，丹蕊晓承甘露。殷勤结出，累累果，圃畦呵护。挂枝头，新月银镰，笑倚碧云深处。

长寂寞，故山久住。愁蹇浅，漫言前路。只因混沌珍藏，反被峭寒频误。春雷呼唤，披风起，巨龙高翥。到炉前，炫目明霞，看取灿然千树。

“钢花”是炼钢厂常见景象之一，也是特色鲜明的现代工业意象。此词以咏物和拟人手法描写钢花，写其特征惟妙惟肖。矿石久藏深山，而钢花一旦在高炉中开放，就霞光灿烂，炫人眼目。说钢花为百花之首——“百花王国独步”，是对工业文明的崇高礼赞。“钢花”意象倾注了作者的浓郁情感，因而让似与诗词格格不入的工业物品分外动人。陈一凡《宝钢炼钢车间即景》也誉称

钢花“此是人间第一花”。钢花的恢宏壮丽，确乎是传统诗词中的花难以比拟的，是全新意象。

在运用现代工业意象的时候，一些冶金诗做到了言外深旨的追求，避免全盘堆砌现代词汇，其意象与情感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冶金诗不只是工业建设的说明书或者功劳簿，还有深厚的情感、真挚的寄托。正如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所说：“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覆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① 如曾少立《风入松·绞车曳井黑风寒》：

绞车曳井黑风寒。地腹倒三班。钻头轰突摧岩壁，矿灯下、面色苍然。大碗客家烧酒，黄昏倒在乡关。

某天春暖燕飞翻。老母坐门端。娶妻修屋催还囑，笑声里、花满群山。一纸肺尘新疹，一人衣底深瞒。

这首词突出的是它的叙事，矿工生活的各种场景，有序进入读者视野。词中的工业意象不是一一列举式地出现，而是彼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个温情而又悲凉的故事，有一唱三叹之致。

新中国冶金诗在意象运用上能够化生为熟，将各种现代意象纳入古体诗歌的形式中而不觉突兀，从而成为一种根柢深厚也兼具新鲜气息的诗歌。如严北溟作于1988年的《新采风颂》：“织女机丝迎夜月，高炉火焰照云霄。”这一联接近杜甫的“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而严诗中的“织女”已经不是传统农耕的个体妇女，而是现代纺织厂的工人；“高炉”自然也是写的现代钢铁之类冶金厂，这一首诗纯然是现代社会的风貌。霍松林《南泉书怀示主佑》“便铸精钢作机器，即栽香稻作荆榛”一联，分写工农，展现劳动愿景，此诗自铸伟辞而不觉突兀。

（二）刚柔相济的审美风格

新中国冶金诗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合正、变于一身，收放自如，既有力能扛鼎之壮，也有轻灵婉转之致。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新中国冶金诗有刚柔相济的美感特征。

刚劲健拔、酣畅饱满之美在新中国冶金诗中俯拾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冶金事业实现了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因而书写这些内容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有一种豪迈高亢、扬眉吐气的状态，豪放之作为数甚夥。如庞俊《烽烟四首》之三：“炼钢战士不兜鍪，余勇还堪霸九州。炉火熊熊齐努力，铸成国势比金瓯。”写出了炼钢战士勇冠三军豪情万丈的气魄。丁芒《参观铜陵疏铁露天矿》：“巨臂挥刀割紫云，笔山十里战群英。誓将大地滔滔血，铸我神州铁万钧。”力能扛鼎，豪气干云。

柔情婉转、要眇宜修的美感也是新中国冶金诗所具备的。中华地大物博，风土各异，因而江山钟灵毓秀，也不乏得阴柔韧瘦之美者。而韧瘦诗风的出彩处就在于它的优美韵致和微妙思理。如吴研因《重游西湖杂写》：“一变朝颦夕捧风，也来增产学农工。栽成粮秫连山碧，锻出钢花映水红。”此诗三四句工整绵丽，风情动人。王艺光《赠一位炼钢退休工人》：“为钢一战卅春秋，鬓白犹常悔退休。村外流萤迷醉眼，总疑钢火绽炉头。”三四句转结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写炼钢工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以流萤为比兴，惹动炼钢往事。写的是家常平凡事，而工人的英雄气概和奉献精神已经活灵活现了。

新中国冶金诗既有铿锵激昂的黄钟大吕，震动天地，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激荡豪迈之中有轻快柔和、妍丽缠绵之处，二者并不互斥，而是能够兼善。正如清人徐增所说：“诗须到家，所谓到家者，于古人诗中，路路都有。若止得一路两路，则非到家。试看衲子沿门持钵募粮，不知历过多少人家，方满得者个钵子，到得煮熟时，气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才为到家也。”^② 所以

① 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3页。

② 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0页。

诗家须取精用宏,兼收并蓄,包容众美,海纳百川才能成其大。新中国冶金诗词刚健与婀娜相结合,诗歌得以变化多端摇曳生姿,比单一的审美理念显得更为深厚。

(三) 丰富多彩的诗体形式和语言美

新中国冶金诗的体裁涵盖了传统诗词的主流体裁,各体均有出色的作品。一个时代的作品,体裁的丰富程度与其内容的丰富有一定的正相关。检点新中国冶金诗,无论是古体的四言、五言、七言,近体的五、七言律绝,以及词、曲等体裁都有,量凿正枘,在体裁上恰如其分。

首先是诗作形成了一定规模,长短相宜的体裁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信息。新中国冶金诗中较多的诗人在处理丰富的信息时选择了长诗或组诗形式。长诗如吴金水《支边老人吟》、魏向炎《新余行》等。组诗情况更为普遍,小至三四首、大至数十上百首为一组。这些长诗、组诗具有深厚的信息承载量,因而能够广泛反映冶金业及相关社会内容,从而如巨幕一般展现丰富的时代影像。长篇大作叙事细致,积健为雄。绝句律诗等短章小制,只言片语,出于精巧之思,含蓄隽永,言简义丰,气韵生动。

其次是遣词造句富于美感,合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为一体。新中国冶金诗形式上沿用古典诗歌,能够吸收古人长处,在很多地方真正做到了好诗如弹丸流转一般娴熟和浑成。例如,汪东的倚声填词,音节谐婉,流利动宕,令人爱赏;郭沫若的近体七律,功夫扎实,有沉雄瑰丽之观,皆可谓在他们擅长的体裁上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以上二家仅为代表,冶金诗中行家众多,能人辈出,佳篇杰作,在在而是,形式上是无愧前人的。

最后是语言形式和谐多样,古语今语熔铸一炉。冶金诗在语言的诗化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新中国冶金诗不是复古的桃梗土偶,而能够使用现今的词汇,古语今语交织在一起,体现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因而没有太多的生硬和呆板之处。如童庆启《满江红·赞湖北长江南岸武、冶、鄂三钢厂》:

石破天惊,升华处,彤云幂幂。天帝问:老聃归后,高炉谁立?南国钢城扬北火,东方工艺虚西席。是今人,举臂震寰中,称梁脊。

人中杰,炉前液,为四化,开新绩。握尖端在手,赶超不息。钢帅先行膺重任,神州众望归公益。满江红,红遍大江东,豪情溢。

全诗用语审慎考究,既有典故古语,也有白话今语,而皆归于雅驯自然、浑然一体,不损其诗味。

在肯定新中国冶金诗艺术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如颂美型诗词,有的流于概念化、口号化、公式化,欠缺比兴,兴象枯窘,无一唱三叹之致;有的近体诗和词,格律不够严谨。这是当代诗词的通病,固不必深责,但是今后的创作,应力求避免,提高艺术水平。

三、新中国冶金诗的意义

冶金诗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阅读这一类型的诗作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史实记载、审美体验和价值导向,这就说明新中国冶金诗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建立在它真实的历史书写、新颖擢拔的文学创作、积极崇高的思想境界之上。这三者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一) 历史意义:存开拓奋进之史,昭拳拳报国之心

新中国冶金诗有存史功能,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新中国冶金建设的伟大历程,反映了冶金业的丰功伟绩。对1949年以来我国冶金业的战略布局、装备水平、专业队伍均有细致而真实的反映;对冶金产品的琳琅满目有千形万状的表现;对冶金业的大利天下有诗意的书写,足称诗史。自《诗经》以来诗皆有“颂”声,诗人以“颂”畅写太平盛世。我们也需要这些“颂”歌,因为我们对冶金领域的烜赫功绩由衷赞叹和钦佩。

新中国冶金诗既可作为不同时期冶金业的历史材料,也可以补充正史所不载的真情实感,照

见冶金人纷纭万端的美妙心灵，昭示冶金建设者的拳拳报国之心和磅礴恢宏的壮志豪情，俾览者认识到这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情感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激励冶金人继往开来，让冶金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二）思想意义：歌咏劳动和创造，熔铸中华民族魂

思想性是诗歌创作必不可少的本质属性。古人论诗讲究格调，认为好的作品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可以知得失、正人心、淳风俗。现在有一些诗学思想仅将诗作为纯然的审美产物，而忽视其有益社会人心的地方，这不符合我国诗学传统，也使诗的功能变得狭窄了。好的作品应该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新中国冶金诗在思想性上是清晰而高尚的，其思想境界在于坚定人民立场、积极拼搏的进取精神、经世致用的人生信念。

新中国冶金诗在思想上突破了个人小我的主观趣味，是人民之诗、劳动之诗，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如“不夜钢城不夜人，红流铁水见精神”“高炉一炬冲天火，恰是中华民族魂”（沙永松《武钢月夜二绝》）。冶金诗的创作者，有心系民情、胸怀天下的国家领导，有兢兢业业、求真务实的科研人员，有奋斗一线、力行争先的工人群众，有筚路蓝缕、跋山涉水的勘探队员，也有人文情怀深厚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热情讴歌冶金业对共和国的贡献，颂美冶金工作者的高尚精神和卓越功勋，赞扬为冶金事业而牺牲奉献的英雄人物。支边的建设者们找矿开矿是“狂沙夜吼居延海，积雪朝浮祁连山。风锤药炮开青嶂，炉火钢花乱紫烟”（吴金水《支边老人吟》）；冶金工人积极生产时“钢帅威风孰可当，高炉日夜吐霞光”（霍松林《回乡偶书三首其二》）；金属加工工人的“灼目青春钢面具，焊火喧飞风雨”（曾箬润《清平乐·涇河底盘总装线》），无处不凝结着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反映出新中国建设者们的光辉品质和高尚灵魂。

新中国冶金诗不是单纯的案头文学，而是讲究经世致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冶金，展现不同时代奋斗者的风貌：贫困俭朴的开拓、兢兢业业的经营、孜孜以求的创新。“融融嘉话，此夜偏长。是心花红、钢花灿、稻花香。”（朱庸斋《行香子·一九六四年迎春娱乐会即席》）现在这一切佳景，俱是过往辛勤耕耘的收获。冶金诗中充满了对社会实际事务的关注，对社会发展进境的反映。冶金业为国民冶出的不怕火炼的真金，是实实在在的国泰民安。

新中国冶金诗对于理想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社会有无私奉献的信念，对于未来有真挚殷切的希望，既可以表时代奋飞之旨，也足张文学创作之军，激励后人踔厉奋进，建设现代化国家。

（三）文学意义：书写工业文明，开拓诗词疆域

评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在整个文学史的视野中考察其独特性、开拓性，其有别于既有文本的地方。从这一方面来看，新中国冶金诗的文学价值在于踵事增华不在抱残守缺，推陈出新，力破余地，它在内容体裁和思想情感上较传统的冶金诗大为开阔。

新中国冶金诗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冶金事业的真实反映。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金属材料生产国之一。冶金工业的成长，为共和国一步一步走向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而这一壮丽的征程，也满富诗意。许多领袖、诗人、学者，乃至工人、群众，见证着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壮举，纷纷为祖国的冶金事业献上衷心赞颂，也为其中经历的教训和伤痛怀着殷切的关切。可以说，人们冶炼金属，也冶炼着中华民族的诗情与诗艺，越开拓，就越深沉；越钻研，就越精湛。

新中国冶金诗是中国传统诗歌现代演进、转型的重要表现。冶金诗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传统文化对现代事物的书写，代表着传统诗歌的艺术之花趋时更新而生出的现代果实。新中国冶金诗，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有极为深刻的创作。诗家们既对现代冶金科学技术有深刻感悟，也在诗词创作上纯熟而审慎，正是以见识、学问之深醇为基础，因而性情态度自然吐露，天机卓然。新中国冶金诗词有立意高远，思想正大、形象生动，趣味盎然等特点，“状难写之景，如在目

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①。品味鉴赏冶金诗词，就是聆听岁月的嘹亮金声，观赏生活的绚烂火花，激扬豪迈的锻炼之志，涵育浪漫的人文诗心！

旧体诗能否适应现代社会、书写现代生活是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新中国冶金诗证明，旧体诗完全能够得心应手地书写作为现代社会鲜明表征的工业文明，其适应性和生命力是顽强的。它为旧体诗开拓新领域、书写新事物新生活、表达新思想新理念提供了经验，这是冶金诗的重要文学价值之一。

工业文明是现代社会的象征、文明进步的标志，旧体诗不能仅满足于农业文明形成的传统，流连于风花雪月、小桥流水，必须大胆书写工业文明，表现其力与美。“桃源生活真原始，现代文明乐如何？”（胡迎建《江钢行》）1997年，当代著名诗人丁芒在《抑扬声里醉钢花——序方宗远〈钢声铁韵〉》中指出，工业时代，“工业诗应该提倡”，方宗远诗词集中大量的炼钢诗词“就创作思路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开拓；就创作实践来说，是一次有益的探索”。这是很有见识力的看法。诗人如果对现代工业改造世界、哺育文明、造福人类、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勋业视而不见，只满足于既有诗词题材，故步自封，这样的创作注定无法广泛、深入地联系我们的时代。旧体诗要追攀古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创作理念和境界，直面我们时代繁荣的工业，努力开拓表现领域，增强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让工业诗词“金声振大千”（周士一赞《工业诗》）。

从世界文学和诗学的角度来说，冶金诗也是极具开拓空间、大有可为的一片创作园地。西方传统社会里也有炼金术，其既与星象、占卜、魔法等神秘活动相关，其物质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金属冶炼相关。西方诗人从炼金术的神秘属性中抽出永恒的诗意，在词语的各种组合中产生张力。他们试图通过充满积极创造力而且富有神秘气息的操作，使语言获得生命力而产生出无限可能。可见，无论是我国古代的炼丹还是西方的炼金术，冶金都超出了它行为本身而被赋予各种想象，进而从物质世界中建构出一个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冶金这一活动天生是受到文学眷顾的，尤其与诗歌的神秘隽永有极高的适配性。古今中外，冶金的生产、生活经验就是一片诗歌创作耕耘的沃土。

诗含国史，承载着历史，寄寓着希望，期望借此选本能够将这样的诗情与大家共享。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欧阳修：《六一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9页。

依赖与脆弱：1711—1871 年滇池海田开垦及相关问题研究

杜京京，陈业新

摘要：海田是历史时期人类开发和利用滇池沿湖低地的重要方式。清代，由于岁修制度，滇池水位趋于稳定，但在年际和年内仍存在涨落变化。当地民众将滇池水位下降时湖岸涸出土地开垦为新田，并称之为“海田”。海田的耕种与维持极其依赖湖泊的水位状态。受自然条件影响和人为技术限制，这种稳定的状态常被打破，海田也遭到破坏。海田的依赖性与脆弱性，迫使百姓和政府在耕种和管理方式中不断做出调整，并对当地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海田开垦及其相关问题，既有助于理解清代滇池地区的人地互动史，同时也为当下滇池环境的管理与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清代；农业开发；滇池；海田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4-0101-11

滇池，古称滇南泽，是中国的第六大淡水湖，被誉为云贵高原的“高原明珠”，^①同时也是云南省水域面积最大的高原淡水湖泊。从地理环境来说，滇池西临西山，东、南、北部为河流冲积和湖积平原。^②全湖流向呈心状，唯一一个出海口为西南部的海口河，又名螳螂川。滇池内有一条天然沙堤为海埂，滇池由此分为南北两部分。流域内有二十余条河流汇入滇池，河流与滇池水供应着周边州县生产生活用水，同时对周边的气候与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对滇池周边土地和农业生产的研究，从新中国前就已经开始。时值内地战乱频繁，高校迁入昆明，多就地开展学术工作，因此涌现了许多滇池周边地理情况的调查报告。^③这些作品以考察和记录现实状况为主，是研究滇池沿岸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滇池沿岸农业起源较早，发展程度较为成熟，学者着重围绕农业和人地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涉及“涸水谋田”、开垦湖边淤地等特殊的土地开垦形式，但多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粗略提及，并未将

作者简介：杜京京，上海交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灾害史；陈业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灾害史。

① 西山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西山区水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② 昆明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昆明市水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7页。

③ 这部分研究成果详见程潞、宋铭奎、陈述彭、黄秉成：《云南滇池区域之土地利用》，《地理学报》1947年第2期。王云亭：《昆明南郊湖滨地理》，《地理学报》1941年。鲍觉民、张景哲：《云南省呈贡县落龙河区土地利用初步调查报告》，《地理学报》1944年。史立常：《滇池之水运与渔业》，《地理》1943年第1期。

其专门作为研究对象。^①近年,云南大学的耿金围绕滇池沿岸低田展开研究,弥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他认为低田与滇池季节性变化的水位相关,为适应土地条件,人工选择“水涨谷”作为种植作物。^②耿金的研究覆盖16世纪至20世纪,着重讨论了低田开垦的过程和条件,但因其选择时间跨度较大,对清代一朝的低田开垦情况研究尚有欠缺。由于清代人口压力的增大,政府和百姓向滇池索取土地的意向愈发强烈,加之岁修制度稳固,滇池水位趋于稳定,因此清代沿湖田地开垦呈现繁盛之势,低田正是本文讨论海田的一种。

海田,即滇池水位下降涸出的湖底土地,“昆水水渐减杀,涸出田壤,倍极膏腴,村民谓之海田”,^③其开垦与种植和滇池的水位有密切关系。除了自然气候对滇池水位有影响外,依靠人力疏通滇池的出海口螳螂川以增大排泄水量,也是控制滇池水位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开垦环境和条件具有特殊性,滇池海田的耕种方式与运行机制也和一般田亩不同,但对滇池沿岸州县来说,海田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史料记载的限制,有关海田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清代康、雍、乾、道四代。咸丰至同治年间,由于云南战乱频起,^④滇池沿岸水利工程失修,湖泊水位不断上涨,湖滨沧田多化作海。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时间段设定为康熙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起,至同治时滇池周边杜文秀军队被平定为止,即1711年至1871年共160年内。

一、清代滇池水位变化与海田分布区域

滇池流域内的降水受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两种季风的影响,降水主要集中在5—10月,因此滇池水位存在明显的干枯期变化。^⑤此外,滇池水位也存在年际上的差别,根据1988—2015年的测量数据,滇池年际平均水位的极差可达1.49米,^⑥在古代科技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滇池水位年际变化必然会更大。滇池水位不断变化,涸出的土地面积亦有不同。由于海田邻近湖界,因此可以通过滇池水位与沿岸海拔高度推断海田可能分布的区域。

虽然许多学者都指出清代滇池水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受史料记载的限制,无法分析滇池水位变化的详细数据。方国瑜先生认为,由于明末滇池水涨时可淹没潘家湾、棕树营、六合村、刘家营一带,因此推测滇池水涨时水位高于1886.7米;^⑦苏国有通过研究滇池周边地名,推测明

① 这部分研究成果详见董学荣:《滇池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农业考古》2013年第6期。周琼:《高其倬治滇农业思想初探》,《思想战线》2001年第5期。陈曦:《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的处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王锦涛:《清前中期滇池区域农业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秦树才:《清代前期云南农业发展原因初探》,《昆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唐国莉:《清代滇池东南缘人口、聚落与土地利用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周琼、李梅:《清代中后期云南山区农业生态探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李月声:《清代中前期云南赋役制度变化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② 耿金:《16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滇池沿岸的低田与深水稻种植》,《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23页。

③ (民国)李群杰等修,彭嘉霖纂:民国《昆阳县志》卷20《农林》,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稿本。

④ 咸丰六年(1856年),由于地方吏治腐败,云南省内爆发了大规模战事,主要有两支军队:一支由马如龙和马复初带领,手下将领杨振鹏占据滇池海口,一支是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其势力迅速扩张,同治六年(1867年)调集20万军队东征昆明,但因内部矛盾和保守的战争战略,东征以失败告终,军队势力大削。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廷平定战事。这一期间,滇池沿岸州县始终处于战火中,缺少一个长期有效的管理主体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⑤ 昆明市水利志编写小组编纂:《滇池水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⑥ 贺克雕、高伟、段昌群等:《滇池、抚仙湖、阳宗海长期水位变化(1988—2015年)及驱动因子》,《湖泊科学》2019年第5期,第1383页。

⑦ 方国瑜:《滇池水域的变迁》,《思想战线》1979年第1期,第37页。

代、清初、清后期适宜建村的海拔分别为 1888 米、1887 米、1886 米，^① 滇池水位应在此之下。方国瑜和苏国有皆是从沿湖地标和村落的海拔高度推断滇池水位，崔乾、杨煜达等也提出，除非修建阻水堤坝，沿湖聚落通常修建在雨季盛水期的湖面高程之上，因此可以通过聚落定位确定历史时期湖岸线的高程，进一步勾勒出湖泊的水域空间。^② 这一方法使复原清代滇池水位变化成为可能。

通过查阅清代滇池沿湖四州县的地方志，笔者发现晋宁州村落变化是复原滇池水位的最好选择。从现在可见的地方志来说，昆明仅余 1 本（道光），昆阳余 2 本（康熙、道光），呈贡余 3 本（康熙、雍正、光绪），晋宁余 3 本（康熙、乾隆、道光），其中，雍正、光绪两版呈贡县志记载县境内村落数额与名称完全一致，无法用来分析村落和湖域变化，而晋宁的三本地方志记载的村落数量和名称各有变化，因此将晋宁州的村落状况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兼以其他三个州县作补充说明，是最合理的选择。除了地方志外，参考 1943 年的《云南省五万分一地形图》和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建设的“天地图”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网站（<https://map.tianditu.gov.cn/>）的相关信息，确定村落现在名称与位置，再结合图文资料和《昆明市地名志》《云南省晋宁县地名志》等文献，确定三个时期沿湖村落的海拔高度。若村落现已拆为多个，则以各村落的平均海拔为原村落的海拔值。若以上材料皆未存在明确的海拔数据，则根据临近村落的海拔高度、所处地区平均海拔高度以及谷歌地球在线地图（<https://earth.google.com/web/search>）的现代测绘数据进行推测，将周边已确定的村落的海拔高度与谷歌地球在线地图的测绘数字进行比较，在一致性较高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该村落的谷歌地图检测数据也具有参考性。因此使用谷歌地图海拔数据，如果一致性较差，则用所处地区的平均海拔高度作为参照。通过复原不同时期滇池水位的海拔高度，得到海田可能分布的区域和最大面积。

康熙版《晋宁州志》共记载村落 25 个，有 6 个村落的命名与明清军事和交通制度有关，少部分村落以自身的经济功能或农业种植特征命名，多数村落名称源于周围自然地理特征。根据前文所提方法，得到 25 个村落的海拔高度（见表 1）。

表 1 康熙年间晋宁州村落名称及海拔古今对照表

村落名称	当前位置	海拔（米）	村落名称	当前位置	海拔（米）
河东村	乾隆时无	—	宝兴村	宝兴村	1909
河西村	乾隆时无	—	向桥村	蒜村	1907
大西村	大西	1889	段奇村	段七	1916
黄土坡	福安村	1890	大堡	乾隆时无	—
团山村	团山	1888	上营	大营	1950
天城门	天城门村	1897	中营	中营	1994
西合村	道光时无	—	下营	东下营、西下营	1972.5
河泊所	河泊所（上蒜）	1888	土坯村	现无	—
金沙村	金砂村	1890	竹园村	竹园村	1909
黑麻村	下石美	1890	菜村	上菜园、下菜园	1924
牛恋乡	牛恋（乡）村	1887	五里铺	五里铺	1925
三夫塘	三多	1950	十里铺	十里铺	1913
观音山	观音山	1915			

数据来源：《晋宁州志》（康熙）；《昆明市地名志》（1987）；《云南省晋宁县地名志》（1987）；《云南省五万分一地形图》（1943）；“天地图”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网站（<https://map.tianditu.gov.cn/>）。

① 崔乾、杨煜达：《历史时期高原浅水湖泊变迁的复原方法研究——以明清以来嘉丽泽演变为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第 73 页

② 苏国有：《昆明密码：滇池区域地名探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86 页。

由表 1 可见，康熙时期晋宁州境内海拔较低的村落集中在 1887—1890 米之间，其中以牛恋村为最低。《徐霞客游记》有言：“（石鱼山）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丛丛，为牛恋石，涯上村与乡俱以牛恋名。”^① 隆庆《云南通志》亦载：“相传有异人牧牛滇池滨，牛夜入水，恋草，鸡忽报晓，牛尽化石，至今水中，石俨若牛形，呼为牛恋乡。”^② 康熙版《云南通志》开始提到牛恋山金线洞出产金线鱼，强调洞中之水与滇池不相混，推测康熙时期滇池水位与明代后期变化不大，即丰水期水位不超过 1887 米，这也符合方国瑜先生的结论。

乾隆版《晋宁州志》在乾隆元年（1736 年）出版，主要记载的是雍正时期的状况，较康熙时新录入村落 95 个，多分布在柴河两岸，从名称和位置来看，沙堤村、海埂、小渔村、小海庄、安乐村等 5 村落与滇池相关，其海拔集中在 1886—1888 米之间，故推测此时滇池水面高度较康熙时期下降了 1 米（见表 2）。史料中亦有例证，乾隆版《云南通志》中提及滇池东南岸金沙草湖时言“自牛恋乡至河泊所水中有石路，为滇池分界”，^③ 这是此前文献未记载的内容，在《云南省五万分一地形图》中可以看到牛恋乡与河泊所之间向金沙寺（即金沙山金沙村一带）方向尚残余一小片湖泊（见图 1），因此推测雍正和乾隆年间由于滇池水位下降，河泊所与牛恋乡之间的湖底浮出水面，逐渐形成了一条石路，金沙草湖与滇池就以此为界，当时金沙草湖面积广阔，湖岸可达金沙村，由于出湖打鱼便利，逐渐在石路上形成聚落，即小渔村。



图 1 《云南省五万分一地形图》（局部）

来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藏《云南省五万分一地形图》（https://gis.sinica.edu.tw/showwmts/index.php?s=ccts&l=China_50K_YunnanJHJ）

表 2 乾隆年间晋宁州沿湖村落名称古今对照表

村落名称	当前位置	海拔（米）
沙堤村	沙堤	1887
海埂	上海埂、下海埂	1887.5
小渔村	小鱼村	1886
小海庄	道光时无	—
安乐村	安乐村	1887

数据来源：《晋宁州志》（乾隆）；《昆明市地名志》（1987）；《云南省晋宁县地名志》（1987）；《云南省五万分一地形图》（1943）；“天地图”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网站（<https://map.tianditu.gov.cn/>）。

道光年间，晋宁州共有 136 个村落，新增村落 42 个。道光版《晋宁州志》中详细记载了各村落的地理位置，因此摘选出临近湖滨的 7 个村落，梳理如下表：

① （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卷 7 上，四库全书本，第 7 页。
② （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隆庆《云南通志》卷 2《地理志》，明隆庆六年（1572 年）刻本，第 15 页。
③ （清）鄂尔泰修：乾隆《云南通志》卷 3《山川》，清乾隆元年（1736 年）刻本，第 7 页。

表3 道光年间晋宁州沿湖村落名称古今对照表

村落名	当前位置	海拔（米）
余家沟	余家沟上村	1887
黄家地	沙堤	1887
江渡	小江渡	1888
佛墩	今无	—
西瓜嘴	大海晏	1888
花椒嘴	花椒嘴	1887
吴家堆	今无	—

数据来源：《晋宁州志》（道光）；《昆明市地名志》（1987）；《云南省晋宁县地名志》（1987）；《云南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1943）；“天地图”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网站（<https://map.tianditu.gov.cn/>）。

从表3可以看出，道光年间晋宁州沿湖新增村落皆在1887—1888米之间，据此推测此时滇池最高水位提高到了1887米，伊里布主持大规模疏浚海口的工程亦可印证滇池水位上升，这导致州境内海拔最低的村落小渔村（道光时更名为渔村）在乾隆时期还位处石路，道光年间已“四周皆水”，^① 光绪版《呈贡县志》中也提到“（江尾村）为县中河之尾，在道光年间，海水涌淘，荡坏良田数顷，河尾亦混而为海”，说明这一时期滇池水位上涨淹没了洛龙河尾处的江尾村，因此推断道光时期滇池水位应和康熙时相近。

从聚落变化状况来看，康熙、乾隆、道光三代滇池最高水位的海拔高度呈现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分别为1887米、1886米、1887米。根据民国时期的测量统计数据，滇池年内水位平均差约为1.9米，^② 也就是说，水位线下1.9米的湖底土地都有可能涸出，继而被开垦成海田。现依dem高程和相关数据，绘制出清代滇池沿岸海田的分布集中区（见图2）。从图2来看，滇池东北岸、东南岸和西南岸皆有大片区域适合改造成海田，这与地方志记载海田涸出区域相符。之所以集中在这三个区域，是因为沿岸皆有河流搬运着大量泥沙在入湖处沉积，形成了大面积的平原和沼泽。由于滇池东北岸有海源河、盘龙江、金汁河、宝象河等多条河流同时汇入，这些河流又在下游分叉，但由于子河与本流的距离和开引角度不同，各条河道的流量与含沙量亦有不同，致使河尾泥沙堆积速率不同，因此河尾三角洲发展速率不同，继而将滇池湖水分割成一条长长的海沟。^③ 由于滇池湖岸网络错综复杂，海田绕海沟分布，也呈现出零散的特征。民国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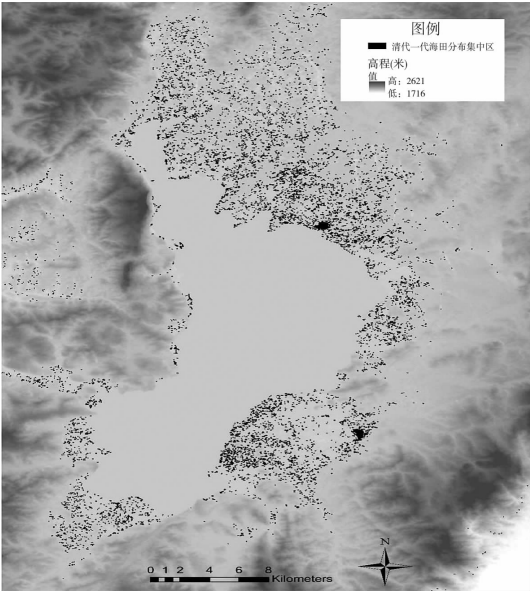


图2 清代三代海田分布集中区示意图

底图来源：AS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V003 高程数据。

① （清）朱庆椿修：道光《晋宁州志》卷3《地理志》，民国十五年（1926年）铅印本，第14页。
② 方国瑜：《滇池水域的变迁》，《思想战线》1979年第1期，第33页。
③ 王云亭：《昆明南郊湖滨地理》，《地理学报》1941年，第34页。

期,滇池海田主要分布在昆明苏家村、西坝河、积善村、言家村,呈贡彩龙村,晋宁团山村等地,^① 这些村落的位置与图2海田集中分布区也相当重合。

根据统计,康熙、道光时滇池湖滨可改造成海田的区域面积有13.06平方公里,乾隆时为13.54平方公里,这是理想状态下滇池开垦海田的最大面积。实际上,愿意并有能力承垦海田的只是少部分人,因此海田开垦面积极为有限。至民国时,随着工程技术发展和水涨谷的普遍种植,以及滇池水位较道光时再度下降1米有余,沿湖海田面积也增加到35.5平方公里。^②

二、海田开垦与课税管理制度

元代赛典赤疏浚海口河后,滇池湖滨涸出田亩数万顷。这些田亩距湖较远,不易被水淹没,虽然也是因滇池水位下降而产生的,但与海田的耕作方式存在较大差别。明代几次疏浚工程后亦有土地涸出,朝廷皆及时按照普通田亩的标准课税,说明与前文田亩相同,皆处于长期涸出的状态,因此税收较为稳定。

海田被纳入朝廷课税管理,是从康熙年间开始的,而且由地方官员主导。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时任云南府游击的周士元上奏朝廷,请求为滇池湖滨原本用于喂养官府马匹的草地招民垦种,收其赋税,用于赡养当地退役无子的老兵,这种田地被称为“老丁田”。云南养马,多以泉地美草之地为宜,明代时为了稳固边防,大量军队和家属被迁至云南,在此屯田驻军,因此至今滇池区域内仍保留着大量带“营”的地名,如大树营、棕树营、吴家营等。水草茂盛的滇池湖滨是获取草料的最好选择,朝廷专门在此设立草户饲马,如宝象河下游的龙马村,就是明代马军郭、孟二军户屯田牧马而得名的,^③ 此地海拔为1888米,与明代滇池水位高度非常接近,说明该聚落当时处于宝象河与滇池的交界处,湖滨沼泽草地是饲马的天然场所。清代时,受滇池水位下降的影响,这些草地逐渐“葑根蟠结,沙漾成田”,在枯水期涸出大片土地,被附近军营官员或佛寺占有。由于丰水期时田地坐落水中,因此朝廷只能用绳圈估定亩数,承垦民众的课税压力也较轻。

雍正时,为了增加财政赋税,朝廷对海田的管理进一步加强。雍正二年(1724年),鄂尔泰将滇池湖区内的老丁田彻底归公,而且专选滇池枯水期时重新测量田亩面积,“遇水涸地现,委丈之员不论高低肥硇,概行丈增”,^④ 导致老丁田的田亩数量翻了数倍,“昔日之绳牵一亩,而今为弓行十亩者有矣”,^⑤ 最终测得纳税田亩两千四百余亩,课税也增加了正赋和应公的部分,致使“田地尽数报增,并无宽余可赖,而课税又属过重,输将实属维艰”,百姓生活苦不堪言。^⑥ 此外,各州县村民也开始报垦海田,雍正八年(1730年),昆明县高峣村村民李清臣等报垦大龙沟尾淤地,包括已成熟田四十五亩,并“淤地、草地二块,尚难栽插”,^⑦ 等到有收成时补充昆明县义学用度,大龙沟现已不存,但高峣村位于西山山脚,临近滇池,因此大龙沟很有可能是起自西山的一条河沟,在高峣村边汇入滇池,从在河尾入湖处逐渐形成海田。同年,昆明州增加兴旺村海莲

① 程潞、陈述、宋铭奎、黄秉成:《云南滇池区域之土地利用》,《地理学报》1947年第2期,第25页。

② 程潞、陈述、宋铭奎、黄秉成:《云南滇池区域之土地利用》,《地理学报》1947年第2期,第19页。

③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地名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出版,1988年,第88页。

④ (清)陈宏谋编:《请免老丁田粮复详》,《清代诗文汇编》文徽卷4《滇藩》,清乾隆刻本,第50页。

⑤ (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67页。

⑥ (清)陈宏谋撰:《请免老丁田粮复详》,《清代诗文汇编》文徽卷4《滇藩》,清乾隆刻本,第50页。

⑦ (民国)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34《学制考四》,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印刷本,第17页。

庵馆义学田数量，本村村民“公报于景宋陈洪四姓田尾海淤地内垦田三十七亩八分，免其升科”。^① 兴旺村地处东大河河尾，新涸出的海田应该就位于此。雍正十二年（1734 年）呈贡知县曾应兆查出海边涸地八十四亩，乾隆五十年（1785 年）李榕复丈得田一百三十六亩，皆坐落在呈贡县新村门首，招佃耕种，收租供应县境内四学馆的经费，新村正位于捞鱼河入湖处。雍正十三年（1735 年），晋宁州增加了西乡河泊所义学田，“买秧田一百亩，坐落淤，又河泊所田边向有泊口下尾田一路，一并送入义学，俟水淤出可垦收”，^② 河泊所位于白鱼河末端，因此海田应在白鱼河与滇池间交界地带。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开垦海田有两个特点：一是多位于河流与湖泊交界处，由于滇池流域的河流上游多经山区，携带了大量泥沙淤积在入湖处，日积月累形成湖口浅滩湿地，湖底泥沙在枯水期水位下降后涸出水面，可供开垦成田，雍正至乾隆年间水位下降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二是朝廷加强了对海田的管理，雍正四年（1726 年），朝廷下令使云贵一带地方官招民开垦升科，“将垦熟田地归于开垦佃户，于次年起科；民间自垦者，按照年限起科”，^③ 之所以村民愿意捐海田给地方义学，不只为了提高声望，更有可能是水患和严苛的课税致使海田获利有限，风险较大。

乾隆时期，海田课税趋向宽松。乾隆七年（1742 年），云南总督张允随上奏称：“水滨河尾，尚可挑培成田，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例，六年后，以下则升科。若零星地土，低洼处所，淹涸不常，难必有收者，仍长免升科。仍令该地方官给照开挖，以杜争占。”^④ 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进一步重申和放开：“嗣后滇省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著听民耕种，概免升科。”^⑤ 在这种政策之下，海田的课税压力也得以减小。乾隆二年（1737 年），豁免老丁田课税中归公部分，“此额租数目，乃照丰收之年科定者，而地处海滨土壤硗瘠，若遇水大歉收之时，则小民完纳甚艰，可为轸念……著该督抚查明，永行豁免，俾租额减轻，民力宽裕，即从乾隆二年为始”，^⑥ 将老丁田赋税降至四成。与此同时，各地开垦海田面积不断增加。乾隆三年（1738 年），团山村人王伟等将本村门首迎海淤地一段挑培成田，送至本村义学学田，招佃耕种，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呈贡知县王以宽提到本县海晏、安江、梅子、斗南等沿海村落居民，常“以其海边淤出圪土报垦升科，名海淤田，此旧规也”。^⑦ 嘉庆前期，海田开垦上报仍是常事：嘉庆三年（1798 年），晋宁州、鲁甸厅共开垦田九十八亩有奇；嘉庆五年（1800 年），昆明县、晋宁州等七州县共开垦地六顷四十三亩有奇；嘉庆六年（1801 年），昆明县、昆阳州等六州县共开垦民田二顷四十六亩、夷田一十八段，海田应是这些田地的来源之一。为了补贴地方所需，地方官还会专门到滇池沿岸勘测涸出海田，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为供昆明六河闸丁工食，“将昆明、晋宁、昆阳、呈贡等四州县查有沿海涸出荒淤勘丈，收租作为工食等”，^⑧ 但因海田受水患威胁较大，被指定承垦

① （清）朱庆椿纂修：道光《昆阳州志》卷9《学校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3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② （清）毛整修、朱阳修：乾隆《晋宁州志》卷7《学校》，康熙五十五年（1716）抄本，第47页。

③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

④ 《高宗实录》卷165，第22页，转引自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4，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⑤ 《高宗实录》卷764，第9—10页，转引自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4，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18页。

⑥ 《清实录》第9册《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6页。

⑦ （清）王以宽：《海堤碑记》，（清）朱若功原本，李明续修，李蔚文等续纂：光绪《呈贡县志》卷7《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3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

⑧ 《永远碑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设，现立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牛恋村三教寺旁。

海田的百姓往往不愿领种,此时海田已然变成了地方政府获取额外收入的一种途径。

道光之后,海田相关的记载减少。这一时期相较乾隆年间滇池水位上涨,不利于海田的涸出与开垦。咸丰同治年间,昆阳海口陷入起义军和清军的战火之中,战争一度扩散到滇池沿岸四县,致使“云南一切钱粮赋税,尽归兵练把持,暴敛横征,民无控告”。^① 朝廷无暇顾及水利修筑,海口河疏浚制度完全荒废,^② 滇池沿岸州县失去了稳定生产的社会环境,“咸丰丙丁以后,昆明祸患频,仍沿河堤堰闸坝,折毁居多,水利会荒,农田失业,国民额赋亦无从征收”。^③ 如呈贡县沿湖田亩,“自丁巳变后,连年水涝,田变为海”,^④ 迫使承垦民众向政府请求,取消被淹田亩的升科。咸丰年间大涝,堤坝被摧毁,斗南村、安江村两村“旧耕之田变为沧海”,虽“就其淘止之处,督令兴工,再筑新堤,植树保护”,但“自是堤外没之田永难开垦,堤内淹余之田得以种禾”。^⑤

总的来看,海田开垦受自然和人为两方面的影响。自然因素体现在滇池水位上,康熙、雍正和乾隆、道光三个阶段的滇池水位呈现“高一低一高”的变化趋势。因此雍正和乾隆年间沿湖涸出了更多土地,海田得到广泛开垦,道光年间滇池水位上升,已垦田地被淹没,更毋论开垦新田,可见滇池水位是制约海田开垦的重要因素。人为因素表现在赋税政策上,起初开垦海田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康熙年间,朝廷注意到海田带来的收益,将其纳入税收体系中,雍正时为增加国家税收,海田的课税压力加大,民众苦不堪言,乾隆时海田管理再度宽松,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也会招人承垦海田。道光后,由于战乱,海田开垦彻底趋于停滞。

三、海田耕种方式与生态影响

由于海田临近滇池,容易受到水患灾害,因此收成极其不稳定,根据雍正年间鄂尔泰的奏折,滇池海田“向因雨泽沾足,海水即多涨漫,以半收为十成”,水位平稳时收成却能达到“一年足抵三熟”的成效。^⑥ 但是无论自然条件如何,朝廷科赋照旧收取,尤其是在雍正年间科赋再度提高,对承垦民众来说,海田赋税无疑是巨大压力,以致连年拖欠朝廷课税,“民逃官累,将安所底止”?^⑦ 为了糊口,沿海村落借助临近滇池和海沟的天然优势,在种植海田的同时开展捕捞,因此有海田的村落常以“渔”为名。

由于海田易遭破坏,因此有余力主动开垦海田的多为当地的士绅大族,甚至“有墾田数工扩充至数十亩者”。^⑧ 《六河歌》描述道:“群亩逞黠拥为利,乘春筑坝夯还碓。要遮新涨使横散,去清留浊谁禁诃”,^⑨ 地方乡绅为保护海田免受淹没,常在沿海地带修建小规模堤坝,以致河尾堵塞,这些堤坝的主要用料是水草腐烂沉积形成的草煤,在夏决时易被冲垮,堤坝年修年冲,愈发加重了河尾泥沙的淤塞。此外,为了增加海田肥力,承垦者还常将苦草、海草等植物锄入地内,“沿海

① 《穆宗实录》卷24,第25—26页,转引自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2页。

② (清)朱若功原本,李明续修,李蔚文等续纂:光绪《呈贡县志》卷6《续修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3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③ (清)崔尊彝撰并正书:《重修松华坝闸开河建桥碑》,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拓片,清光绪七年(1881年)。

④ (清)朱若功原本,李明续修,李蔚文等续纂:光绪《呈贡县志》卷7《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3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⑤ (清)朱若功原本,李明续修,李蔚文等续纂:光绪《呈贡县志》卷1《续修疆域》,《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3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⑥ (清)鄂尔泰撰:《鄂尔泰奏稿》,清抄本。

⑦ (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76页。

⑧ (民国)李群杰等修,彭嘉霖纂:民国《昆阳县志》卷20《农林》,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稿本。

⑨ (清)钱沅:《钱南园先生遗集》卷2《诗》,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浙江书局刻本,第24页。

各村多植苦草，以为肥料，资以在播种前散布秧田，或插秧前倾入水田”，“散（海）草于田，或犁或锄，俾混入土中，以资培壅”，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① 苦草和海草皆是滇池湖滨常见的沉水和挺水植物。云南纬度低，全年温度暖和，光照充足，沿湖水浅，光照透明度强，因此湖滨水生植物茂盛，水生植物在水流运动中有增阻拦沙作用，^② 促使泥沙淤积，加快了海田的涸出速度。

就海田的种植作物来说，根据耿金研究，适应海田季节涨幅特性的水涨谷至清代初期尚未完全广泛种植。^③ 《六河歌》提到“初蒔萑稗终登禾”，^④ “萑”即“稗”，是一种类似稷但比稷更小的植物，“稗”即稗子。据研究，清代滇中地区有山稗、糯稗、鹅掌稗、水稗四种，滇池沿岸常见的是水稗，这种稗子形状似稻，是稻田中常见害草。^⑤ 稗子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高度在 25—150 厘米不等，花果期集中在夏秋二季，无须人工种植，就常生在云南境内的稻田、沼泽、水边等地。^⑥ 早在隆庆版《云南通志》中，萑、稗两种作物就已经被记在滇省常见稻类作物之中，可见其生长相当普遍，很有可能是海田开垦之前就自发生长的作物，经过人类开垦后方种植稻谷，并经过长期选择，最终选择了与滇池水位变化相适应的水涨谷。

海田种植周期也迎合滇池季节性水位变化的规律，“惟是水之迟早、大小以为兆也”。^⑦ 根据 1943 年时调查报告，海田全年仅有上发（即春种秋收）一季作物，^⑧ 云南的雨季是 5—10 月，湖泊水位对湖流量的响应具有滞后性，一般在雨季结束前后才达到一年中的峰值，秋冬二季恰好是滇池全年水位最高的时候，因此海田无法种垦。农历四月初，滇池湖滨田家开始“翻泥放水，行将栽插”，^⑨ 五月时滇池处于全年最低水位，涸出大片海田，民众趁机插秧。随着雨季到来，六月起滇池水位逐渐提高，到八月底稻谷成熟时，湖水已经处于较高水位，因此海田种植呈现“车水种秧，撑船割谷”的规律。有些地区还将海田作为秧苗田使用，秧苗培育多在农历五月插秧前，海田正处于涸出状态，待水位上涨之时，秧苗已然可以移栽到母田，晋宁《永远碑记》记载：“附近海滨仅可播种秧苗，六七元（应作“年”）间雨水时行，海水涨发，仍被淹没不能栽种”，^⑩ 乾隆年间呈贡县令王以宽的《海堤碑记》中也提到，“斗南西隅有海岸一条……堤内一带多民闲秧母，田地一垦，则堤宜溃，而秧母随之”，^⑪ 可见将海田作秧母田是常态。

开垦海田是人类利用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的具体表现，海田的收益和特性对当地社会生活起了一定影响。海田捐作义学田，补充了地方教育事业的经费。清代初期，州县义学的修建和维持都是官员捐俸，或者地方乡绅送田捐钱，地方官员很少拨出公田给义学作资金。康熙以来，乡绅开始捐赠海田，或由官方拨出官田属性的海田，招佃收租以作义学经费，并且海田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滇池沿岸四州县皆有海田供应本县义学，尤其是呈贡县，县境内义学八馆皆依靠海田为生，

① （民国）李群杰等修，彭嘉霖纂：《昆阳县志》卷 20《农林》，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稿本。

② 拾兵、曹叔尤著：《植物治沙动力学》，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6 页。

③ 耿金：《16 世纪至 20 世纪 60 年代滇池沿岸的低田与深水稻种植》，《历史地理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20 页。

④ （清）钱泮：《钱南园先生遗集》卷 2《诗》，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浙江书局刻本，第 25 页。

⑤ 王锦涛：《清前中期滇池区域农业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64 页。

⑥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植物志·第九卷（种子植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16—517 页。

⑦ （清）倪蜕辑，李挺校点：《滇云历年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367 页。

⑧ 冯绳武：《滇池西北岸平原区之人地景》，《地理》1943 年 1/2 期，第 29—30 页。

⑨ （清）鄂尔泰撰：《鄂尔泰奏稿》，清抄本。

⑩ 《永远碑记》，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设，现立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牛恋村三教寺旁。

⑪ （清）王以宽：《海堤碑记》，（清）朱若功原本，李明续修，李蔚文等续纂：光绪《呈贡县志》卷 7《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 3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年，第 206 页。

以致咸丰七年(1857年)后由于海水连年涨漫,“此田全化为海”,全县义学皆停滞,昆阳州全州义学也在同一时段因兵乱全部废止,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得以重建。老丁田的处境与义学田类似。海田与地方社会紧密关联,因此一遇灾年,地方公共事业陷入停滞,更使承垦民众苦不堪言,而地方政府常忽视海田脆弱性,一味追求更多赋税。咸丰年间后,由于滇池湖泊水位上涨,呈贡县海田“连年水涝,田变为海”,百姓不得不“迭次到县呈诉赔累难堪,再求减免”,尽管地方政府“沿海踏勘,深知水中之田赔纳可悯,不再详请升科”,但民众在失去田亩的情况下,仍需背负着原有的赋税负担,生活极其困苦。^①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由于入湖河流携带泥沙和生物残骸不断沉积,湖盆逐渐淤浅,或随着沿岸水生植物发展逐渐变成沼泽,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人类活动干扰其中,使湖泊的演变加速或者变缓。^②海田是泥沙在湖滨淤积的结果,人类开垦海田,将水草耕入改造土壤,并且广泛种植作物,使得湖滨水流速度减缓,加速了泥沙沉积的速度,推动了水体沼泽化和成陆过程,如潘家湾一带明末时尚是洼泽,经过清代逐渐形成固定的陆地,^③人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从生态带角度来说,海田属于湖滨带,是陆地生态系统与湖泊水域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过渡带,^④带内的水生作物不仅为各类生物提供营养和生活空间,还能减小洪涝灾害对人的影响,种垦海田破坏了湖滨带原本的生态系统,修筑的堤坝更是直接隔断了水陆之间的生态联系,加重了洪涝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十字架使横过上,葫芦口遂成积疴。盘龙肠癖此噎膈,安得良医机与陀。可怜偶值岁多雨,上游辄疑天荐瘡。……可堪两度频婴此,四邻老幼同滂沱”。^⑤

结语

综上所述,海田是民众结合滇池水位变化规律在河尾湖滨开垦土地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滇池沿岸四州县普遍存在。当地民众和政府及时调整垦殖和管理方式,以应对海田依赖滇池水位、易受破坏的特点,从而达成向水索地的目的,因此海田也对当地社会与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以往滇池历史研究中,学界探讨人向滇池索要土地的主要方式时,常常提到“涸水谋田”。由于滇池州县常年受洪水威胁,自元代以来,地方官员实行了一套上游建坝闸蓄水,中游开河分洪、下游大力疏挖海口河以泄滇池水的治理方案,使得滇池水位下降,涸出湖底土地,这种获取田亩的方式就被称为“涸水谋田”。^⑥由于海田获取方式与之类似,因此前人研究时,常将海田视为涸水谋田的结果,这是有待商榷的。首先,政府修建水利多在滇池涨溢并造成破坏之后,具有被动性,其最根本目的是降低水患灾害的影响,因此在清代14次疏浚海口河记录里,仅有2次提到有涸出田亩;其次,虽然水位下降会有田亩涸出,但并非全是新的田亩,明代陈金疏浚海口后,将开垦土地分为主而入赋者和主与赋俱无者,可见新田亩只是涸出土地的一部分,而且,地方官员向朝廷上报新涸田亩数额常有夸大成分,倪蜕就曾提到,清代虽有人提出“尽泄滇池,可以得田三百万顷”^⑦,但疏浚工程多是让“淹者自出”,至于上报海田的数字,往往是侵之石者“大张

① (清)王以宽:《海堤碑记》,(清)朱若功原本,李明续修,李蔚文等续纂:光绪《呈贡县志》卷6《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3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② 叶春、李春华:《太湖湖滨带现状与生态修复》,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③ 方国瑜:《滇池水域的变迁》,《思想战线》1979年第1期,第37页。

④ 叶春、李春华:《太湖湖滨带现状与生态修复》,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⑤ (清)钱沅:《钱南园先生遗集》卷2《诗》,清光绪十九年(1893)浙江书局刻本,第25页。

⑥ 于希谦、于希贤:《滇池地区水利发展简史》,《经济问题探索》1981年第2期,第49页。

⑦ (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1页。

其辞”^①而已。

结合清代滇池水位来看，政府通过降低滇池水位来获取田亩的性价比并不高，康、雍两朝经鄂尔泰、张允随等人数次大修，乾隆时水位稳定降低了 1 米，涸出土地面积不超过 2 万亩，至道光时，伊里布等人大修海口后涸出田地数万亩，但相较乾隆年间水位已经上涨了 1 米，未大修前只会高出更多，显然不到百年时间，鄂尔泰等人疏浚海口所得的海田皆已化海，可见通过“涸水谋田”获取田亩并不稳定。较早提出“涸水谋田”这一概念的是陈秉仁先生，后来被于希贤、于希谦等人沿用，近些年有学者也使用了这一概念。陈秉仁、于希贤等人提出“涸水谋田”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陈秉仁历数历代涸水谋田的罪状，指出如果人类一意倒行逆施，必将造成不可收拾的灾难，归根结底是对现实滇池沿岸“围海造田”行为的批判。^②结合本文研究海田的相关状况，可以判断以往认为通过“涸水谋田”获得的海田，实际与 20 世纪中后期围海造田获取田亩的原理截然不同。“围海造田”指通过修建围堤建立起水陆间新的分界线，并将分界线内的水体抽干，用土石等材料逐渐填充成可用于生产生活的陆地；“涸水谋田”则是调整湖泊的出水量、降低湖泊水位后附带产生的结果，涸出的沿湖低地没有防护措施，更容易受到破坏，但它在滇池沿岸形成了“向水索地”的传统。两种方式皆是所处历史条件下，当地人民在湖滨区域获取土地的方式，皆涉及人与滇池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对滇池沿岸的社会与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下我们正确认识人水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海田是人类开发滇池湖区的一种方式，人类通过利用湖泊水位变化规律开垦沿湖低地，使自然环境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向滇池索取土地的做法，或许能使人类在短时间内获得一定利益，但并不能持续，而且人类终究会为之付出更大代价。海田开垦破坏了湖区原本的生态系统，削弱了湖泊对气候和水环境的调节功能，损坏了人水之间的天然屏障，致使人类社会抵抗灾害的能力严重下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强调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不是不要发展了，而是要避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摒弃过去那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做法”，^③人类社会的发展绝不能以自然环境作为牺牲，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这至今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清）倪蜕辑，李挺校点：《滇云历年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20 页。

② 于希谦、于希贤：《滇池地区水利发展简史》，《经济问题探索》1981 年第 2 期，第 49 页。

③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1 页。

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刊物高质量发展： 研究述评与启示

傅 宁

摘 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刊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载体。通过文献梳理可发现，各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刊物在当前办刊过程中面临专业化发展困境、数字化转型艰难和传播效果不佳等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建议通过推进期刊专业化转型、编辑学者化、提高编辑人员职业认同和实现编辑出版数字化等对策和路径优化社院统战理论刊物发展建设，同时强调管理部门的支持对提升办刊质量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学院应推动教学科研办刊一体化发展，实现社院统战理论刊物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刊物；统一战线；高质量发展；编辑学者化；数字化出版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4-0112-07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这一规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学院的多重性质和任务。同时，《条例》还规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具备条件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应当办好学报等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中华文化，展示交流理论研究成果，为教学科研服务。”^②这也是各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刊物办刊宗旨的共同部分。社院理论刊物所刊载论文应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提供学理阐释和思想支撑，增强其说服力，拓宽其传播渠道，促进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入脑入心。

《条例》明确了社会主义学院在统一战线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政策宣传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乃至社会主义学院的作用愈发凸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统一战线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要求社会主义学院充分发挥其“三个基地”重要作用，协同其他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在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宣传阐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社院理论刊物作为统一战线学术交流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平台，需不断提升质量和影响力，更好宣传和阐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更好服务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工作，助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统一战线战略目标服务。笔者在回顾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社院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尝试提出适用于社院理论刊物建设的可行性建议，以促进

作者简介：傅宁，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编审，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学。

①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②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第11页。

其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文献述评

（一）社院理论刊物办刊人之所见

有学者将社院理论刊物归入“专业性小众学术期刊”一类，认为其在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其数字化出版有重要意义。该学者将“专业性小众学术期刊”定义为人文社科领域以刊发特定专业或学科优秀研究成果、特定学科发展热点难点问题及最新前沿动态，推动特定学科建设和学科理论发展为宗旨的学术性期刊。^①有学者认为，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应实现编辑流程数字化，应在情感上和技术上接受数字化的编辑工作和出版方式。^②实际上，完全实现编辑流程数字化还存在一些难点。有学者认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厚的统战理论功底是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必须具备的条件。^③这实际也是在倡导编辑学者化。有学者于2015年提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在我国学术期刊、哲学社会科学报体系和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还比较小，并认为这是主办单位科研水平较低、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滞后、编辑队伍专业化程度较低和办刊理念模糊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时至今日，上述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有学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在哲学社会科学学报阵营中影响力较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传播效果差。^⑤实际上，导致传播效果差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学者大胆地预测，随着学术期刊专业化建设的推进，社院学术期刊稿件的学理性、系统性和厚重性会逐步提高，编辑将更加关注稿件的质量而非数量。^⑥有学者指出，部分社院理论刊物存在如下现象：有的偏重工作指导，理论学术性不强；有的偏重政治引导，忽视学术品位；有的则偏重纯学理性，忽视实践性和应用性。^⑦有学者强调应注重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引领社院理论刊物建设发展，按统一战线学科架构的特殊性逻辑理路安排设置栏目和内容。^⑧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作为政治学院的官方刊物，不仅需要在方向上不出现偏差，而且有更为具体和严格的要求，即有明确的宣传边界。^⑨有学者对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建设情况做了精确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含副省级及以上）社会主义学院所办理论刊物中，具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有22本，其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1本，省级社会主义学院20本，副省级社会主义学院1本；另外，还有8家省级社会主义学院办有内部期刊，2家省级社会主义学院以“三校合一”方式共同办刊，14家副省级社会主义

① 李静：《数字出版环境下专业性小众学术期刊发展探究——以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为例》，《中国出版》2013年第15期，第59—62页。

② 杨绪强：《媒体融合背景下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传播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85—89页。

③ 胡小燕：《关于办好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几点思考——以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为例》，《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56—58页。

④ 林华山、罗振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改革》，《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51—55页。

⑤ 吴红博：《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05—109页。

⑥ 林华山：《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专业化》，《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98—103页。

⑦ 李静：《大统战格局下关于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定位与特色的思考》，《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59—64页。

⑧ 罗雷：《以五大发展理念观照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发展》，《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69—78页。

⑨ 朱虹：《论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的综合素养》，《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70—73页。

学院尚未开办期刊。^①这一情况目前未有明显变化。有学者提出,办刊工作是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期刊管理对推动学科建设、促进教学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②这一观点符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相关领导在2024年全国社会主义学院期刊工作会上强调的,推动教学科研办刊一体化发展的思路。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重点研究统一战线理论,是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与其他政治类学术期刊的最大区别,也是其最大特色。^③这一观点与“用学术讲政治”和“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要求一致。

梳理相关文献时发现,社院理论刊物办刊人以自身办刊工作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较高质量论文,但党校学报办刊人以自身办刊工作为主题发表论文的相对较少。另一个事实是,全国党校学报中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众多,但全国社院理论刊物中仅有一家为CSSCI来源期刊,且进入扩展版,而CSSCI几乎是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唯一认可的哲学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总体来看,社院理论刊物与党校学报在整体质量上尚有不小差距。但如此众多较高质量探讨自身办刊工作论文的发表,也体现出社院理论刊物办刊人爱岗敬业、爱刊为刊和求好思变的高尚情怀,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以吸收借鉴。

(二) 高校学报办刊人之所见

将视野扩大到高校学报办刊相关主题文献,可发现其讨论集中于某几个问题,其中有些观点与本文关注的问题相契合,即是否应推进编辑学者化和编辑专业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朱剑编审提出,编辑化身学者已屡见不鲜,但其主要目的不是更好地当编辑,而恰恰是对编辑身份的逃离。其因盖出于编辑们无力改变就职的刊物,只好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以求更好的发展,结果只能是使期刊变得更弱。^④朱剑编审还提出,各大知名高校“学术榜”排行前列的期刊几乎都是专业期刊,鲜有高校学报的身影。^⑤《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仲伟民编审认为,尽管产生了职业编辑队伍,但编研分离和综合性学报的编辑必须面对一个甚至几个一级学科的现象,使编辑人员的素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降。^⑥朱剑编审还提到,王学典、吴承学和原祖杰三位主编在担任主编前,都已是知名学者,在学术圈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即使在担任主编之后,他们的学者生涯也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处于一种体制虽不认可,事实上却就是的“编研一体”状态。^⑦

持应推进编辑学者化观点的学者反对编辑专业化,反之亦然。两派学者的争论跨度长达几十年,未有定论。但梳理文献可见,大体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支持推进编辑学者化,而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支持推进编辑专业化。在未来的发展中,或许期刊的办刊模式会更加

① 康家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研究》,《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80—83页。

② 周述杰:《创新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工作管理的几点思考》,《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第65—67页。

③ 刘树升:《党性、人民性、个性:打造高品质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三个维度》,《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61—64页。

④ 朱剑:《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70—89页。

⑤ 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5—27、158页。

⑥ 仲伟民、朱剑:《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兼论高校学报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20—34、159页。

⑦ 朱剑:《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35、192页。

多元化，兼顾编辑学者化与编辑专业化，以应对不同学科领域的需求。

二、现实启示与高质量发展对策

回顾上述文献，再分析当前，可发现，大多数问题依旧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编辑所提问题大多属于体制机制问题，所提对策涉及多个部门、层级和法规制度，协调难度大，难以有效落地；另一方面，一些对策建议不对症、不具体或不具可操作性，难以被采纳。

（一）变论文为对策建议

办刊人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面向同行或学者，虽能够在学术圈中引发讨论，并促进对相关课题作进一步探索，但这些讨论对学报实际管理和政策变革的推动力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学界的讨论往往聚焦于理论层面的深入分析，而实际的学报管理和政策变革则依赖于管理部门的政策法规制定与执行。同行之间的讨论虽然能带来学术视野的拓展，却往往无法转化为直接的行动方案，对日常期刊管理的影响甚微。因此，编辑人员若希望提出的对策建议能够得到重视并付诸实践，关键在于通过有效渠道获得适当的决策层面的关注与重视。

编辑人员应意识到，只有将对策建议直接送达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动期刊改革。这些对策建议应具有针对性，明确指出期刊在实际运作中面临的困难与亟须解决的问题，帮助管理部门更清楚地了解期刊运行中的痛点。不仅要推动管理层关注了解期刊发展的瓶颈，还应为决策者提供切实可行的改革方向。通过与管理部的沟通，编辑人员的建议有可能在政策层面得到落实，推动期刊在资源配置、制度设计和长期发展规划上做出调整，进而实现期刊质量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这种从学术讨论到实际层面的转向，既能提升对策建议的实操性，也能促使管理层更加关注期刊办刊工作的核心问题，最终通过互动合作的模式，助力编辑人员与管理部门在期刊发展的方向上达成共识，共同推动期刊的改革与长远发展，使其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推进专业化转型

统一战线学目前作为一门小众专业，虽然在范围上较为狭窄，但其中包含的学科专业却具有相当广泛的覆盖面，包括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非常大众的领域。这些专业无论在学术内涵、研究规模还是研究人员数量上，都远超统一战线学本身的框架。若将统一战线学视为一个联盟，将这些专业视作联盟成员，显然这个联盟很难建立或维持。这种学科结构的不均衡和“头轻脚重”，是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一种更具可操作性的路径。可行的做法是在这些专业内部进行进一步细分，寻找那些与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的领域。例如，在宗教学这一专业中，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研究领域就可作为社院理论刊物专业化发展的一个方向。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为宗教学与统一战线学之间的交汇点，兼具政治理论与宗教研究的双重属性，既符合统一战线学的政治导向，也具有较强的学术深度和研究价值。因此，将这些细分专业作为未来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突破口，不仅能够促进其专业化发展，还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

这种思路不仅可帮助统一战线学找到更加明晰的学科发展路径，还能增强其在学界的认同感和影响力。通过选取与统一战线相关的细分领域作为核心研究方向，社院理论刊物有望逐步提高其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为学科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这种细分和专业化的路径，也能为社会主义学院在新时代下推动学科创新和理论突破，提供一条清晰而务实的发展道路。

（三）实现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统一

实现学报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是社院理论刊物办刊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面对当前意识形

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应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做到守土尽责。学报政治性是保刊之要，学术性则是立刊之基，应推动二者协同提升。社院理论刊物作为具有强烈政治属性的刊物，其内容需紧密围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然而，单纯强调政治性可能导致学术性被弱化，致使学报无法产生足够的学术影响力。学术性是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刊物的生命力所在，只有所刊论文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期刊才能在学界和社会上获得广泛认可。因此，实现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既是社院理论刊物办刊的必然要求，也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为了实现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统一，需要在选题和稿件质量把控上下功夫。在编辑过程中，既要确保文章的研究内容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又要鼓励作者在学术研究中进行思维创新，深入探讨实际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学术见解。编辑人员应充分发挥学者化的作用，既具备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又能从学术的角度对论文的学理性进行评判。这种双重要求不仅有助于保障学报的政治性不偏离主线，同时也能提升其学术品位和专业影响力。

（四）推进编辑学者化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刊用论文时，不仅要考虑论文的学术性，更要考虑其政治性。责任编辑作为主要的审稿人员，必须牢固树立意识形态责任意识。如果编辑人员在所负责的学科领域没有足够的理论功底，仅依赖外部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可能会造成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

因此，推动编辑学者化即要求编辑在某一或多个学科领域具备相当的学术造诣，这不仅可以提高学术判断力，也可以帮助编辑更敏锐地察觉文章中的意识形态错误。这种编辑学者化的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为必要，因为相关学科与社会现实、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可见，推动编辑学者化对于社院理论刊物等具有强烈政治属性的期刊意义重大。相比之下，自然科学领域的期刊编辑更倾向于编辑专业化。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相对不易直接触及敏感选题，其审稿过程更依赖于实验数据、理论推导和同行评审。

未来，期刊办刊模式可能会更加多元化，需针对不同的学科需求，采取灵活的编辑策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编辑学者化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而在自然科学领域，编辑专业化将保持其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学科的交叉融合，编辑人员可能需要在学者化与专业化之间找到更为平衡的方式，以适应不同学科的需求。

（五）提高编辑人员的职业认同

由于社会主义学院较普遍存在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因而社院理论刊物的编辑人员通常要兼顾教学、科研等多项任务。社会主义学院编辑人员的相关待遇的科学化、合理化已成为“老生常谈”，应给予相应的关注，推动其切实深化改革。编辑人才的培养机制也亟待优化，应以编辑学者化为思路制定方案，如推动学报编辑部向教研职能转型，增加对编辑人员的教研技能培训，向编辑人员开放各类研究平台和交流机会等，其实质就是推动教学科研办刊一体化发展。

优化编辑系列职称评定体系也是关键一环。当前，编辑系列职称评定的主要问题在于评价体系较不利于非出版专业背景的编辑人员，其要求编辑人员在职称评定申报时仅能提交出版专业相关论文，这与编辑学者化的理念存在一定区隔藩篱。社院理论刊物的编辑人员，如果从事统一战线研究并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却在职称评定时无法作为有效成果提交，这不仅使学术期刊编辑提升自身学术修养遭遇困难，且一定程度上会对编辑人员的工作动力造成一定影响。

（六）推进编辑流程数字化

微软 Office Word 和 LibreOffice Writer 等软件作为文字处理软件已被人所熟知并广为使用，这些软件也可用于排版和印刷，但据了解，多数排版和印刷机构都采用方正书版、方正飞翔和 Adobe InDesign 等专业排版软件。笔者调研成都市几家规模较大的印刷和排版机构，获悉这些机构也只使用专业排版软件，原因是如将文字处理软件用于排版，会出现无法实现复杂排版、兼容性不佳、

行距调整不便、无法批处理和不同软件环境下一致性差等诸多问题。然而，专业排版软件购置成本、学习成本和使用门槛高，不易向普通编辑人员推广；同时，这些软件生成的大样文件用文字处理软件无法打开。大多数情况下，排版人员和编辑人员能够共同接受的校样文档格式和形式只有 PDF 文件和纸质稿。严格意义上，PDF 文件难以编辑，现有各种 PDF 编辑软件实质上都是逆向分析还原软件，无法完美重现 PDF 文件制作时原始的数据和操作状态，仅能用于细部简单改动；同时，多数 PDF 软件的注释功能易用性、兼容性也不佳。这就造成了目前多数编辑人员都采用交换纸质稿的方式与排版人员沟通。然而，采用纸质稿沟通的方式也有较多缺点，如实物的流动转移有丢失的风险；如几个校次重复劳动较多，既疲劳又低效；如签字付印时没有逐页签字，存在内页被恶意调换的风险。

为解决编辑和排版之间的沟通难题，特别是在编辑流程数字化背景下，可以考虑引入一种基于统一工作平台的综合解决方案，以实现高效、便捷且安全的编辑与排版交互。该方案可以通过引入数字化校样工具和智能化排版系统来优化现有流程。首先，数字化校样工具如 Adobe Acrobat Pro、Foxit PDF Editor 等，可支持 PDF 文件的精细化标注，允许编辑人员直接在校样文件上添加修改意见。这些工具不仅具备强大的标注功能，还能够记录每次修改痕迹，从而确保每一轮校样都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减少纸质校样丢失和被篡改的风险。

此外，智能化排版系统如 Adobe InDesign 和方正飞翔可通过插件或 API 实现与编辑工作的无缝对接，使编辑人员在稿件修改完成后，能够快速生成符合排版标准的大样文件，减少手动调整和重新排版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基于云端的协同编辑平台（如 OneDrive）能够实现多人在线同步编辑和即时沟通，避免文件版本混乱和多次重复劳动。为了增强稿件传递和校样签署的安全性，还可以引入电子签名和区块链技术，保证每个校次的签字确认都有数字证据留存，从而杜绝人为干预和被篡改。这一方案不仅能提升编辑流程的效率，还能确保稿件在传输和校对过程中保持完整和安全，适合推广到期刊编辑与排版工作中。

（七）推进数字化出版

目前，中国知网等文献数据库平台所下载的论文文件多为 PDF 格式，这导致在复制其文本时会出现多余的空格和换行符。这不仅使得文献摘录变得繁琐，还影响了论文写作的流畅性。相比之下，XML 格式就能很好地避免这些问题，因为它是一种结构化的数据格式，可完美保存文本结构，便于数据的提取和分析。因此，在文献出版过程中，如何发挥 PDF 和 XML 两者的优点，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引入双轨制编辑与出版模式，即在编辑和排版的不同阶段，分别使用 XML 和 PDF 格式。首先，在终审稿提交后，可以将稿件从 Word 格式转换为 XML 格式进行结构化处理。XML 格式能精准保存稿件中的标题、段落、图表等内容，确保其在编辑过程中保持良好的语义结构。这种结构化的方式，方便编辑人员对文献进行管理和提取。在排版和印刷阶段，XML 文档可通过自动排版工具生成 PDF 大样文件，用于最终的校对和印刷。这种方式确保了内容在 PDF 格式下的稳定性，同时又避免了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兼容性问题。PDF 的注释功能虽然有限，但仍然是电子审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可通过 PDF 文件中的注释功能来标记修改，随后通过技术手段将这些修改同步回 XML 文档。这种双向同步的方式不仅提高了修改的效率，还确保了稿件版本的统一。

通过这种双轨制编辑模式，编辑人员既能享受 XML 格式带来的编辑便捷性，又能保留 PDF 在排版和印刷过程中的保真优势。如此一来，文献的数字化出版得以实现全流程的优化，减少了格式问题带来的不便，也进一步提高了编辑出版流程的效率。

（八）提高论文知晓率、点击率、下载率和引用率

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会通过中国知网等文献数据库来下载和阅读论文。首先，知晓率是基础，要确保论文能够被广泛检索到。为此，编辑人员应帮助作者在论文的标题和关键词设计上下功夫。标题应清晰简练，同时具备吸引力，能够迅速传达文章的核心观点，吸引潜在读者的注意。关键词的选择则要覆盖论文主题的关键领域和关联学科，这样才能确保论文在文献数据库中更易被检索到，提升知晓率。其次，是点击率，论文在检索结果列表中被查询到，如何让读者点击至关重要，只有引人入胜的标题和有学术价值的主题才能激发读者的点击意愿。再次，下载率则是影响论文传播效果的另一个关键。摘要的写作质量直接影响读者是否会进一步点击下载全文。摘要应明确展示论文的研究价值、创新点以及研究结论，让读者感受到下载这篇论文的必要性。最后，引用率是评判学术论文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要提高引用率，论文必须导向正确、新意明显、论点明确、结构完整、论证深刻和逻辑严密，须采用客观、准确、简洁和流畅的学术语言，并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或实践参考。因此，编辑人员应鼓励作者从当前学术热点出发，提供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结语

社院理论刊物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高质量发展对于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政策宣传和人才培养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调查可知，目前各社院理论刊物在办刊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专业化发展困境、数字化转型艰难和传播效果不佳等。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寄望于通过推动期刊的专业化转型、编辑学者化、增进编辑人员职业认同、推动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数字化等，助力社院理论刊物更好地服务于统一战线事业。

社院理论刊物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积极探索新的办刊思路，不断增强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同时，应通过深化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扩大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推动教学科研办刊一体化，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唯有如此，社院理论刊物才能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责任编辑：李亚强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年 1—4 期

(总第 101—104 期) 总目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 从“两个结合”中探赜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
叙事 刘 江 (1.5)
- 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和实践伟力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观点综述
..... 刘林华, 念兴昌 (1.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 内涵诠释、生成路径与时代意蕴
..... 刘化军, 王酉霖 (2.5)

纪念邓小平诞辰 120 周年

-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和当
代启示 刘雪璟 (3.5)
- 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 王晓青, 陆 森 (3.13)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四重维度
——政治保证、根本遵循、发展进路、价值依归
..... 祝小茗 (4.5)
- 新时代继续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
..... 周朗生, 王佳佳 (4.12)

统战理论与实践

- 数字时代统一战线的机遇、挑战与进路
..... 宁小苏 (1.22)
- 毛泽东关于中间势力统战工作重要思想的山西实践
经验研究 加 敏 (1.29)
-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又团结又斗争策略的生成逻
辑及当代启示 唐 欢 (1.38)
- 新时代加强国有企业统战工作的理念和路径探析
..... 蒋 晶 (1.44)
- 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实践经验、问题和策略
——基于广东省 A、B、C 三市的调查分析
..... 郑 维, 肖海艳 (2.15)

歌谣与统战: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视角下党的工农民

- 主统一战线研究 刘 鹏 (2.24)
- 数字技术牵引下统战组织变革研究
——以浙江为例 李 腾 (3.20)
-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境遇、核心要
义及当代启示
——基于《论联合政府》的文本解读
..... 颜苗苗 (3.29)
-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探究
——以“三三制”为视角
..... 许奕锋, 曹 璐 (3.39)
-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时代贡献 何晓岳 (4.19)
- 论大数据时代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构建
..... 孟安琪, 崔晓敏 (4.31)

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与参政党建设新使命
——民盟中央参政党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 徐 敏 (1.50)
-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和实践路径
..... 彭石军 (1.56)
- 积分制治理: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
——基于浙江省 P 市的考察 吴 昌 (2.32)
-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侧重点和优化路径
——基于 L 省和 N 市各民主党派的实证研究
..... 崔晓彤, 王 君 (3.49)
- 新时代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路径创新研究
..... 史世奎, 李浩然 (3.5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交往交流交融: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民族动力
——云南鹤庆新华银匠村个案
..... 谷家荣, 王志鹏 (1.65)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就、

经验和启示	王新红, 李泉瑾 (1.72)		赵世林, 蒋正珊 (2.72)
文艺赋能: 民族地区文艺节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有“血”有“肉”的文艺: 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文	
体意识的理路与进路	蒲恩灿 (1.79)	艺观	金永梦 (2.81)
系统推进云南少数民族视觉形象工程建设的实施路		文化发展	
径研究	郭俊华, 刘 杰, 陆继山 (1.86)	新中国诗词成就与旧体诗的现代适应性 (主持人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基础、功能定位与运			陈友康 (4.56)
作逻辑		20 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体式整体观照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新中国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作品卷》总序	
.....	钱再见, 史诗悦 (2.42)		莫真宝 (4.58)
中国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拉开理想之维, 促进诗词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	
——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新中国诗史”丛书总序	宋湘绮 (4.64)
.....	杨松禄 (2.50)	书写新中国教育辉煌 展现当代诗词华彩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向度		——《新中国诗史·教育卷》前言	
.....	彭舸璩, 陈 真 (2.59)		陈友康 (4.73)
“共同体”的书写: 滇缅公路文学与“中华民族意识”		洪炉铸成新天地, 豪情写就壮丽诗	
觉醒	彭春瑞, 李心澜 (2.65)	——《新中国诗史·冶金卷》前言	
新时代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的探索			李东昀 (4.89)
与实践	张志远 (3.66)	学习与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古滇文明价值探析		左右江革命老区“数智化”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	薛 昊, 陶佳娜, 贾莉莉 (3.76)		吴 韬, 钟启超 (1.110)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贫困文化的消解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	
研究	陆姝彤 (3.83)	模式发展现状及其路径优化	刘华清 (2.89)
茶旅融合视域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效机		洱海保护治理从“抢救模式”向常态化的转型	
制研究			夏志贤 (2.97)
——以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新时代文化宣传在融媒体环境下的创新实践研究	
为例	付永丽 (3.91)		马 雯 (2.107)
中越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的思考	
——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以云南省为例	谭舒匀 (2.115)
.....	张凤祥, 陆平胜, 胡学茆 (4.38)	地方党内法规发布与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民族地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建议	罗洪启 (3.97)
识路径研究		耕读文化与乡村振兴的三维耦合性探究	
——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为例			余昊东, 余俊李 (3.106)
.....	孔 婷 (4.49)	“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建设, 推动期刊高质量	
历史与文化		发展”专家论证会观点综述	
泽被南滇: 西南联大对云南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李亚强, 罗 雷 (3.116)
.....	王浩禹, 陈吉松 (1.92)	依赖与脆弱: 1711—1871 年滇池海田开垦及	
云南文庙的历史、现状与当代价值		相关问题研究	杜京京, 陈业新 (4.101)
.....	庞伟伟, 任仕暄 (1.102)	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刊物高质量发展: 研究述评	
云南各民族礼俗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阐释		与启示	傅 宁 (4.112)